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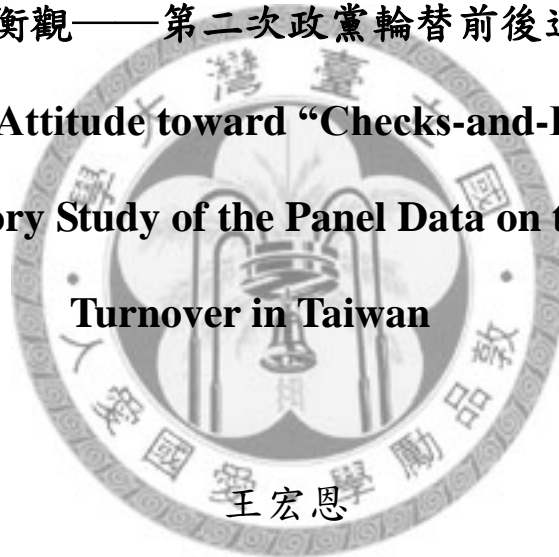
Master Thesis

臺灣民眾的制衡觀——第二次政黨輪替前後追蹤資料的觀察

Citizen's Attitude toward "Checks-and-Balances":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Panel Data on the Second

Turnover in Taiwan



Austin Horng-En Wang

指導教授：王鼎銘 博士

俞振華 博士

Advisors: Ding-Ming Wang, Ph. D.

Eric Chen-Hua Yu, Ph. D.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June 2012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臺灣民眾的制衡觀：第二次政黨輪替前後
追蹤資料的觀察

Citizen's Attitude toward "Checks-and-Balances":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Panel Data on the Second
Turnover in Taiwan

本論文係王宏恩君（學號：R98322015）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1 年 6 月 5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簽名)

(指導教授)



謝 辭

從人人稱羨的電機領域，毅然地轉向政治科學這條長路，我試著傾聽，然後跟隨自己任性妄為的靈魂。這個碩士學位與學位論文，要獻給父母與家人。感謝父母這一路上對我的鼓勵與包容，無論在實質或精神上的全力支持，讓我可以潛心向學，試著在這個已構築數千年的政治科學高塔上，多鋪上一塊路磚，然後踏實。

學位論文得以完成，要感謝王鼎銘教授、俞振華教授兩位指導老師，對學生在論文、學術、乃至於生涯規劃上的困惑與不足之處，多所提攜，讓學生掌握更多政治科學研究的應然與實然。兩位口試委員，也是學生論文領域的先進，吳重禮教授與游清鑫教授，對於學生在論文架構、文獻、學術本土化等多方提點，讓這本論文更為完整充實。學生在四位教授的協助下學習甚多，並在學位論文上、與希望在未來的學術研究中，得以盡力展現，並繼續傳承下去。

在台大政治所碩士班修業的六個學期，許多教授對於學生在課程、工作、學術上的幫忙，學生感激於心：拉拔學生擔任統計教學助理的李鳳玉教授；讓學生在統計學有長足進步的洪永泰教授、王宏文教授；讓學生進入形式理論世界的林繼文教授、林澤民教授、謝復生教授；讓學生協助研究、有機會接觸政治實存與計畫運作的廖達琪教授、李建模教授；以及讓學生學術視野大開的牛銘實教授、陳陸輝教授。有幸接受各學術先進的指點，協助這個半路出家的學子更深入探索廣闊的政治科學，學生銘記不忘。

畢業典禮同時過了二十五歲生日。這段後青春期最終樂章，珍惜的，就是與同儕在學術與生活上譜出的切磋砥礪——沒有你們，碩士班就真的是修道院了。一起踏入政治所的公行 R98 同學們，喻璿、德翰、莉葯、家正、芮君、逸中、宜娟、玫蓓、宛儒、長毅、雅萱，那些年我們一起在社科統煎熬、在行政專題恍神、在宜蘭鄉間大笑、在熱炒店舉杯、在椰林大道揮汗、在綠島淋雨的故事，改日重聚再拿出來下酒吧；不小心轉組到政論後，很感謝宜芳、友彥、為之、嘉璘、冠和等同學的收留與學術交流；在政治

所這個大家庭裡，我也很幸運的可以遇到方隅、夢荷、必忠、天申學長、尉淳學長、富堯學長、信宏學長、晏甄學姐、俊穎學長、智偉學長、慧如學姐、與其它所上的學長姐、學弟妹，謝謝你們的照顧與學術上的討論。

在學術巨殿之外，各奔西東但向心依舊的台大學代會桌委會，以及在應統實習、系排而結緣的政治系學弟妹，你們是我繼續奮鬥的最大動力。一起走過選舉與自治風雨、一起為了浪漫而高尚的理想奮鬥的桌委會，于彤、俊翔、明霈、介庭、裕仁、孟鴻、凱傑、彥儒、千燁、宗岳、詠萱、明恭、永豪、若涵、翊軒、偉倫、厚誼、良賢、淳皓、佩儒、政緯，因不常見面，更珍惜每一次團聚，但我們都確信，每個委員，都還在某處繼續努力著——這次，又該換誰抽牌了呢？在政治系兩年讓我新增綽號的應統助教、以及老兵不死的政治系排，不敢說自己曾貢獻或留下什麼，但感激每一個陪我燃燒最後一段青春的學弟妹，乙棋、孟鴻、元瑜、凱皓、允中、秉謙、暉勝、彥瑜、得育、采瑩，以及所有系上、球場上的學弟妹，世界的舞台已為你們搭起，好好把握，你們將更為耀眼，同時扛起更多責任。而在台大七年來的好朋友，無論電機系、政治系、外文系、學代會、中友會、畢聯會、新生書院、NTU 板等，你們都構成了我生命重要的一部份，謝謝緣分，謝謝每一個你跟妳。

最後，我要謝謝玉萍，這六年來一路陪伴的牽手。在這兩千個日子裡，謝謝她對我種種不成熟的包容、體諒與溫柔。正是因為一次次溫暖的互相依靠，讓我們緊握著，無論坦途或風雨都可以笑著前進——然後，攜手承擔未來。

Commencement，在英文裡是指畢業典禮，但在字典中另一個解釋，是『一切的開始』。人總是鑲嵌在社會網絡中的，是這樣的互相扶持、然後共同成長。無論在世界什麼地方，我，我們，都將繼續前進。

王宏恩 謹誌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七月五日

夜半筆於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

國立臺灣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學位論文提要

論文題目：臺灣民眾的制衡觀——第二次政黨輪替前後追蹤資料的觀察

論文頁數：88

所 組 別：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學號：R98322015〕

研 究 生：王 宏 恩 指 導 教 授：王鼎銘博士、俞振華博士

關 鍵 字：情境制衡、機關制衡、政黨制衡、政黨輪替、麥迪遜主義、定群資料

論文提要內容：

制衡觀，是政治文化中發展與鞏固自由民主的重要價值，一種相信妥協是必要且可欲的信念。台灣民眾心中有制衡觀嗎？欲研究制衡觀，應然面與實然面為何？問卷測到的制衡觀，是原本欲測的民主價值嗎？假如我國民眾間具有不同程度的制衡觀，哪些原因可以解釋這些差異？在 2004 年與 2008 年的總統與立委選舉中，泛藍與泛綠陣營分別提倡「分權制衡」或是「貫徹政策」的對立民主價值，並在兩次大選間立場互換，提供一個良好的研究機會研究台灣民眾制衡觀的穩定與變遷。

透過文獻檢閱，本研究區分機關制衡與政黨制衡的差異：憲法將權力分立並互相制衡的機關制衡，在當代政黨政治高度發展下，需透過政黨掌握不同憲政機關的政黨制衡方能落實。接著，本文將現有制衡觀調查題目區分為機關制衡、政黨制衡、以及現況制衡三類，並說明政黨制衡型的題組在概念與邏輯上最接近理論上的制衡觀。

本研究進一步藉由心理學中民眾議題態度強弱之分，區分出「政黨制衡觀」、「情境制衡觀」(Conditional Balancing)、「其他類」三種次類型，建立偏好排序，說明 2004 至 2008 年第二次政黨輪替的特殊事件，導致三種選民在態度與行為上的差異，顯示過往制衡觀測量的偏差、及定群資料的必要性。本研究提出三種民眾政黨制衡觀來源，包括民眾經驗主動支持、統獨立場相對趨中、以及具雙重族群認同，建立七個研究假設。

本研究以 TEDS2008L 與 TEDS2008P 兩波定群資料進行分析。列聯表與折線圖顯示，民眾的制衡觀並不穩定，但非無態度：民眾的政黨認同越強，越會隨著支持政黨的興替而改變立場。ANOVA 分析與迴歸模型(MNL)分析顯示，政黨制衡、情境制衡、其他類選民分別約佔 20%、30%、50%。年紀較輕、教育程度較高、女性、具有一定的政治政黨認同與政治知識的選民，較有可能有政黨制衡觀。情境制衡觀者，則是政黨認同強烈、政治知識高。研究結果指出了過往分裂投票研究未考量的內生性問題，也預示未來我國政黨制衡觀選民增加的趨勢。本研究最後也針對制衡觀調查題目給予修正建議。



ABSTRACT

Citizen's Attitude toward "Checks-and-Balances":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Panel Data on
the Second Turnover in Taiwan

by

Austin Horng-En Wang

June,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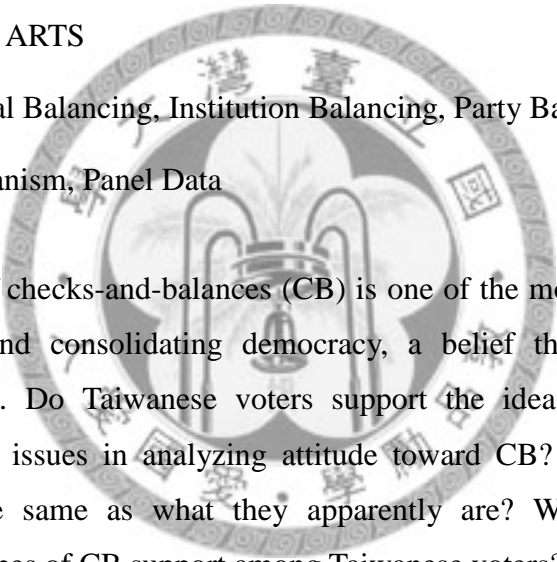
ADVISORS: Ding-Ming Wang, Ph. D., Chen-Hua Yu, Ph. D.

DEPARTMENT: POLITICAL SCIENCE

MAJ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DEGREE: MASTER OF ARTS

KEY WORD: Conditional Balancing, Institution Balancing, Party Balancing, Turnover,
Madisonianism, Panel Data



Citizen's support of checks-and-balances (CB)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mocratic values in developing and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a belief that compromise is both necessary and desirable. Do Taiwanese voters support the idea of CB? What ar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in analyzing attitude toward CB? Are those CB attitudes measured nowadays the same as what they apparently are? What are the origin and explanation of diverse types of CB support among Taiwanese voters?

Taiwan had just experienced the first split-government during 2000-2008. In 2004 congressional election, the incumbent pan-green camp attracted voters by the slogan of "unified and then efficient government", while the opposite pan-blue camp appealed to voters for the value of constitutional balances. Yet, once the pan-blue camp won back both of the congress and president seats in 2008, the two camps opted for the government structure to which they previously opposed. The dramatic position switch is a rare and valuable case for analyzing Taiwanese people's stability or change in attitudes toward CB.

In the beginning of literature review, this thesis distinguishes the "party balancing" from the "institution balancing:" institution balancing is the constitutional separation of powers, but it cannot be realized without the split party control of power, the so-called party balancing or cognitive-Madisonianism, under today's fierce partisan competition.

Second, this article categorizes current survey questions about CB into three groups: institution balancing, party balancing, and reality balancing, the middle one surpasses the other two in focusing on the topic of researching CB in Taiwan. Thanks to the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attitude strength, three types of CB attitudes and their preferences for party control of government are established, including “party balancing attitude,” “conditional balancing attitude,” and “others”.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hypothesizes three possible and empirically testable origins of strong CB attitudes: citizen’s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relatively mild cross-strait issue position, and dual nationality.

Two panel data are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EDS2008L and TEDS2008P, both of which are conducted during the second turnover period. Analysis of contingency tables and line charts reveal that Taiwanese people attitudes toward CB are not stable, but not non-attitude neither; the stronger one’s party identification is, the more possible he or she changed his or her CB attitude along with the party leader or candidate. Moreover, ANOVA and Multinomial logit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 of party balancing, conditional balancing, and others are about 20%, 30%, and 50%. Moreover, Taiwanese people those who are young, female, highly educated, identified with party, and knowledgeable about politics, are more likely to hold the real party balancing. In contrast, people with the strongest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the highest political knowledge tend to hold conditional balancing attitude. The results pinpoint the statistical problem of endogeneity that had been neglected by previous studies, and forecast the trend that the number of Taiwanese people with party balancing attitude would gradually increase in the future.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the improvements of current survey question about CB are also suggested.

目 錄

第壹章、緒論.....	1
第貳章、文獻整理.....	6
第一節、制衡的起源及分化.....	6
第二節、制衡觀的重要性及其來源.....	9
第三節、機關制衡、政黨制衡及其測量方式.....	16
第四節、制衡觀與分裂投票.....	19
第五節、態度強度、意識型態、與概念化程度.....	21
第六節、制衡觀為依變數的相關文獻.....	26
第七節、討論與小結.....	29
第參章、研究架構與分析方法.....	30
第肆章、制衡觀選民類型與研究假設.....	35
第一節、政黨制衡者之政黨認同者偏好排序.....	35
第二節、情境制衡觀之政黨認同者偏好排序.....	37
第三節、討論與假設.....	38
第伍章、資料處理方式.....	44
第一節、制衡觀.....	44
第二節、政黨認同與政黨認同強度.....	44
第三節、政黨制衡觀與情境制衡觀.....	45

第四節、政治知識.....	46
第五節、教育程度、年齡、性別.....	46
第六節、受訪者統獨立場與認知兩大黨統獨立場.....	47
第七節、受訪者雙重族群認同.....	50
第陸章、資料分析.....	51
第一節、初探我國民眾的制衡觀.....	51
第二節、政黨認同強度與制衡觀.....	58
第三節、制衡觀強度及其影響因素：個別分析.....	61
第四節、制衡觀強度及其影響因素：迴歸模型分析與討論.....	65
第柒章、結論.....	74
參考文獻.....	79
壹、中文部分.....	79
貳、西文部分.....	82

圖表目次

圖目錄：

圖 3-1 研究架構圖.....	34
圖 5-2 整體民眾制衡觀變化圖.....	52
圖 5-3 臺灣泛藍民眾制衡觀變化圖	54
圖 5-4 臺灣泛綠民眾制衡觀變化圖	55
圖 5-5 臺灣非藍綠民眾制衡觀變化圖	57
圖 5-6 藍綠認同強度與支持制衡百分比變化圖 2004-2008.....	60
圖 5-7 選民年齡與制衡觀強度機率變化	68
圖 5-8 選民政黨認同強度與制衡觀強度機率變化	70
圖 5-9 臺灣人/中國人 族群認同趨勢圖 1992-2011(資料來源：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71

表目錄：

表 2-1 制衡觀問卷題目類型比較.....	17
表 5-2 整體民眾制衡觀變化列聯表分析	53
表 5-3 泛藍民眾制衡觀變化列聯表分析	54
表 5-4 泛綠民眾制衡觀變化列聯表分析	56
表 5-5 非藍綠民眾制衡觀變化列聯表分析	57

表 5-6 民眾政黨認同強度分類表.....	58
表 5-7 政黨認同強度與支持制衡遞移性檢測.....	60
表 5-8 制衡觀類型及其影響因素：個別變數分析	62
表 5-9 制衡觀類型及其影響因素：MNL 迴歸模型分析(統獨趨中 FB)	66
表 5-10 制衡觀類型及其影響因素：MNL 迴歸模型分析(統獨趨 中 CL).....	67



第壹章、緒論

2008 年 1 月的立委選舉與 3 月的總統選舉，結束了 8 年的分立政府時期，使我國執政權兩次輪替（Two Turnover Test），達到了 Huntington（1991: 266-267）所云民主鞏固（democracy consolidation）的標準。在 1 月的立委選舉中，以中國國民黨為主的泛藍陣營共獲得了 113 席中的 86 席立委，佔總席次的 76.1%；泛藍陣營為了緊接而來的第七屆總統選舉，也順勢喊出了「完全執政、完全負責」、「避免政治僵局」諸類注重行政效率的立場；相對地，泛綠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則強力攻擊「一黨獨大」、大聲呼籲「制衡型總統」、「兩黨共治救民主」的制衡（checks-and-balances）主張（聯合報，2008 年 1 月 17 日，版 A4¹；聯合報，2008 年 2 月 13 日，版 A6²；聯合晚報，2008 年 3 月 13 日，版 A2³），甚至前總統李登輝也出面呼籲，希望避免行政與立法掌握在同一個政黨手中（楊泰順，2008）。

然而，假如把時間點拉回 4 年前，則可發現藍綠兩陣營對於效率與制衡態度的選擇截然不同。2004 年 3 月總統選舉，民進黨籍的現任者陳水扁總統順利連任後，面對同年 12 月的立委選舉打出了「立委過半數，安定大進步」、「立委過半，讓法案不耽誤、政府好做事」等追求行政效率的立場；泛藍，則在總統選舉失利後，開始強力主打「制衡型國會」、「要制衡、反獨裁」的民主制衡目標（中央日報，2004 年 9 月 23 日，版 A1⁴；聯合報，2004 年 7 月 4 日，版 A11⁵）。

除了在兩次選舉過程中，兩大陣營互換立場與訴求外，從 2000 年我國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是我國自戒嚴時期國民黨長期一黨領政以來，民眾第一次接觸到藍綠分別掌握不同憲政機關的「分立政府」運作實況。隨之而來的，包括是否需任命國會最大黨擔任行政院長、是否違憲、是否倒閣，也是憲法中分權制衡的實

¹ 李明賢、李祖舜，2008，〈吳：藍若做不好 願再被輪替〉，《聯合報》，1 月 17 日，版 A4。

² 李明賢、吳文良，2008，〈馬吳定調：完全執政，負完全責任〉，《聯合報》，2 月 13 日，版 A6。

³ 李濠仲、林修全，2008，〈綠打一黨獨大 吸中間選民〉，《聯合晚報》，3 月 13 日，版 A2。

⁴ 劉潛如，2004，〈中國國民黨立委選舉訴求：泛藍過半 臺灣不會亂〉，《中央日報》，9 月 23 日，版 1。

⁵ 羅曉荷，2004，〈立委選舉 民進黨打安定牌〉，《聯合報》，7 月 4 日，版 A11。

際運作。

本研究探討的是：在經歷了八年分立政府時期、加上兩次全國性大選中藍綠兩陣營對於制衡態度互換的氛圍下，臺灣民眾的心中的「制衡」是什麼？制衡觀這個概念，在我國的應然面與實然面應為何？民眾說他支持制衡，就真的是支持制衡觀嗎？民眾假如真的有制衡觀，其制衡觀又從何而來？哪些民眾比較會有制衡觀？這些民眾的特徵，是否可讓吾人預測未來臺灣整體民意對制衡觀態度的發展及改變？

制衡觀是政治文化中發展與鞏固自由民主的重要價值，一種相信妥協是必要且可欲的信念 (Diamond, 1999: 161-217)。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 (James Madison) 在 *Federalist 51* 指出，為了處理人的自利、黨派與易錯天性，政府的權力最好分立，並且互相制衡，才能避免更多錯誤或濫權，後人稱之為麥迪遜主義 (Madisonianism) (Marcus, 1988)。同樣地，我國憲法與大法官解釋中存在行政、立法相互制衡的機制與目的：權力分立的憲政機關間互相制衡的「**機關制衡**」，實際存在我國憲政制度中。另一方面，由於民主國家的政黨之間、或是陣營之間重大意識型態或政策差異，加上各政黨黨紀約束力形成高度政黨政治，使得行政、立法間的「**機關制衡**」制度，實際落實後因而形成行政權、立法權是否應由不同政黨主導的「**政黨制衡**」議題。在高度政黨政治之下，假如民眾為了重視權力的分權制衡，有意識地選擇不同政黨掌握不同權力的分立政府，稱為認知麥迪遜主義 (cognitive-Madisonianism) (Ladd, 1990)。機關制衡與政黨制衡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制衡觀，本研究認為在理論上與實務上皆應有所區分。

臺灣社會存在著統獨問題，使臺灣形成一明顯的分歧社會 (Hsieh and Niou, 1996; Lin et al., 1996; 謝復生, 2011)，臺灣政治藍綠兩大陣營也沿著統獨議題的區塊間隙 (segmental cleavage) 而生。我國民眾對於制衡的思考方式，對臺灣這個分歧社會的憲政運作至關重要：因為我國半總統制的憲政制度設計，並不排除行政權、立法權由不同政黨主導的分立政府出現之可能性，端賴民眾如何投票作出決

定（蘇子喬，2011）。在我國選制改革憲政門檻過高下，社會分歧難以透過選舉工程（Reilly, 2001）的制度設計減低；兩陣營對抗的運作模式，也不太可能由各陣營菁英合作、出現聯合民主（Lijphart, 1977）。假如臺灣選民在經歷八年分立政府時期後，不只是呼應特定政黨的制衡呼籲，而是實存支持憲法上賦予機關相互制衡的分權、或是追求避免政策產出太過極端的制衡態度，意謂著臺灣選民可能因為追求憲法賦予的制衡，進而透過合併選舉的分裂投票、或在單一選舉中支持在野黨的方式，來促成分立政府出現、主動避免一黨獨大（黃秀端，2006），在政黨政治之下透過政黨制衡，回復原憲法賦予機關制衡的效果，追求得以鞏固與發展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Diamond, 1999）。

那麼，臺灣民眾有制衡觀嗎？

當詢問民眾是否支持制衡、或任何關於態度的議題時，民眾通常可以輕易給出一個答案。然而，民眾在選項上選擇「支持」，並不一定與學界所界定的「支持制衡觀」相符。Krosnick 與 Petty（1995: 1-24）指出，人們對於各個議題的態度皆有強（strong）或弱（weak）的差異。當民眾認為議題「重要」、對於議題的態度有明確的好惡時，是長久穩定、抵抗改變、並影響民眾的資訊處理以及外顯行為的（如投票行為等）。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對議題的「強態度」，也是議題投票理論（issue voting）的基本假定。更進一步地，民眾的數個議題態度會構成態度結構（attitude structures）並形成意識型態（ideology），進而影響民眾對於其他議題的處理與思考方式（Campbell et al., 1960: 189; Converse, 1964）。

相對地，假如民眾認為政黨制衡「不重要」、對於議題的態度較弱時，民眾受訪回答的態度就並不穩定，無法以此態度去解釋或預測民眾的外顯行為（Krosnick and Petty, 1995: 1-24）；更甚者，此時民眾對於議題的態度，可能只是民眾為了符合自己政黨認同而產生的自我合理化（rationalizing）：當認同的政黨對特定議題之態度改變時，透過政黨主動說服以及民眾主動的投射，使得民眾對特定議題的態度也隨之改變（Achen and Bartels, 2011; Campbell et al., 1960: 133）。當民眾的政黨

認同引導其他議題之立場，代表民眾對於這些受影響之議題的概念化程度（level of conceptualization）不高，意謂著民眾無法抽象思考議題背後的民主價值、並依據個人建構的意識型態進行判斷，而更可能只是迎合認同之政黨或政黨領袖的選擇（Campbell et al., 1960: 258; Nie et al., 1979: 23）。在這種情況下，傳統議題投票理論中認為議題影響投票的因果關係建構（制衡觀導致分裂投票）即產生錯置。

在一般的情況下，各政黨領導人與候選人為了選票極大化，會選擇特定的議題立場，且不會也沒有需要交換議題位置，因此使民眾的政黨認同與議題態度在測量上不易區分開來，無法推論民眾對議題的態度選擇是強態度的抽象價值思考，或只是弱態度的政黨認同合理化。但我國在 2004 年至 2008 年間，由於選舉情勢改變以及執政權轉移，使得兩大黨對於政黨制衡的立場百分之百互換。這種立場轉換的特殊事件，成為一適合觀察的環境（Nicholson, 2005）⁶：在實際經歷過八年分立政府、以及藍綠兩大陣營對於分權制衡的立場交換後，我國民眾是否真的重視政黨制衡、是否已達抽象思考、高度概念化的強態度，真的支持民主價值中的「**政黨制衡**」？抑或是其實民眾並不重視，其回答只是符合政黨認同、隨政黨的興替而改變議題立場，視情況改變結果的「**情境制衡**」（conditional balancing）？又或者臺灣民眾根本不清楚這個議題，民眾在接受調查時，對這一議題偏好是「**無態度**」（non-attitude）的隨機作答（Converse, 1970; Sigelman et al., 1997）？假如不同民眾的擁有不同的制衡觀強度，是哪些因素，導致民眾的制衡觀之間有所差異？

在目標上，本研究一共分成三大部分：第一，探討臺灣民眾的制衡觀在「概念上」所指的是什麼：包括了國內外對於制衡的文獻探討、區分出機關制衡與政黨制衡的次類型、我國民眾擁有制衡觀的重要性、以及推論我國民眾如欲制衡其標的可能為何。第二，探討臺灣民眾的制衡觀在「操作上」所指為何：理論上建

⁶ 另一方面，在 2012 年我國總統、立委合併選舉，在合併選舉的情形下，由於資訊較不確定，不會有一次只選一個憲政機關的情形，因此相較於分開選舉來說，合併選舉的資訊是更不確定的。詳細討論可見第肆章。

構的臺灣民眾制衡觀，其背後假定為民眾對於制衡是強態度，但心理學上態度本身有強弱之分。本研究希望探討當民眾為弱態度時，對於制衡測量的回答可能受到的影響因素及結果，並試著建立強弱不同偏好排序的類型，定義出政黨制衡者與情境制衡者的差異。第三，探討臺灣民眾的制衡觀在「實際上」所指為何及其來源：本研究使用臺灣民主化調查 2005 年 1 至 3 月至 2008 年 1 至 3 月、以及 2008 年 1 至 3 月至 2008 年 6 至 8 月兩波定群資料 (panel data)⁷，來觀察臺灣民眾制衡觀的態度選擇及變遷，並使用列聯表、變異數分析與迴歸分析，試圖驗證臺灣民眾制衡觀的有無及轉變之來源、是否符合本研究推論、民眾的個人社會變數如何影響民眾自身的制衡觀。

在緒論之後，本研究結構如下：第二章為文獻整理，除了探討制衡觀作為一個民主政治概念的發展脈絡外，還試圖從應然面及實然面剖析制衡觀，並檢視其與選舉行為的聯接；第三章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與分析方法，說明本研究的分析架構、資料來源、以及總體資料、個體資料分析方法與討論；第四章為政黨制衡與情境制衡選民類型建構，將制衡觀強度與政黨認同間的關係釐清、建立選民類型、形成本研究制衡觀的操作型定義，以及提出實證資料可能觀察到的現象，並由文獻回顧與類型建立而提出七個研究假設；第五章說明本章對於檢驗假設與問卷的各個變數處理方式；第六章為資料分析，觀察臺灣民眾的制衡觀變化，並以實證資料驗證假設與解釋；最後一章則為結論、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⁷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全部係採自 2005 年至 2008 年「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 (III)：民國九十七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 (簡稱 TEDS2008L) (NSC 96-2420-H-002-025) 以及 2005 年至 2008 年「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 (IV)：民國九十七年總統選舉面訪案 (簡稱 TEDS2008P) (NSC 96-2420-H-004-017)。「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 多年期計畫總召集人為國立政治大學黃紀教授，TEDS2008L 與 TEDS2008P 為針對 2008 年總統選舉與立委選舉執行之年度計畫，計畫主持人為朱雲漢教授及游清鑫研究員；詳細資料請參閱 TEDS 網頁：<http://www.tedsnet.org>。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研究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第貳章、文獻整理

本章將探討制衡觀作為一個民主政治概念的發展脈絡，試圖從應然面及實然面剖析制衡觀，並檢視其與選舉行為的聯結。本章一共分為七個小節，首先討論麥迪遜主義與制衡觀的發展、我國民眾制衡觀存在與否的重要性、以及民眾欲制衡之來源為何，並接著討論現有制衡觀的調查研究方法與缺失與本研究的選擇；在定義制衡觀之後，本研究將探討現有制衡觀與投票行間連結的相關文獻，而最後是態度強弱、意識型態與概念化程度的定義與探討。

第一節、制衡的起源及分化

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 *Federalist 51* 中推論，美國人皆有利己（self-interest）的傾向，而並無特殊的公民德性（virtue）。人們不同的需求會形成黨派（factions）競逐，但個人本身同時也容易犯錯（fallibility），這構成了社會異質的多元性。因此，為了處理人的自利、黨派與易錯天性，政府的權力最好分立，並且互相制衡，才能避免更多錯誤或權力被濫用（Marcus, 1988）。Dahl（1956: 31-36）認為，分權制衡、符合共和原則（republic principle）的政府，同時具有貫徹多數意見與保障少數的特質，因此相較於多數完全掌握政府權力的政府來說，是更優良的民主概念，稱之為麥迪遜主義式民主（Madisonian democracy）。謝復生（2011）指出，制衡的意義，一方面要將政治權力（行政、立法、司法）打散，分屬不同部門，另一方面要授予各部門牽制其他部門的權力，此時政治權力才會趨於平衡，謂之制衡。

以我國來說，國父孫中山先生認為西方之三權分立易造成亂象與僵局，指出當時美國國會的調查權會綁架行政權，因而提出之五權分立架構，原本所強調的重點在於「分工合作」，而非「分權制衡」（陳文政，2001；周陽山，2010）。但在

我國憲法制度設計上，憲法第五十七條、以及之後取而代之的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皆存在行政權與立法權相互制衡、否決的機制⁸。在大法官解釋中，我國大法官也多次闡明我國行政與立法相互制衡的必要性⁹。因此，我國行政權與立法權的關係，在本質上仍是相互制衡的，也就是存在「機關制衡」的必要條件。

然而，Levinson 與 Pildes (2006)、以及 Straw (2008) 指出，麥迪遜對於分權制衡的想像，是建構在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皆擁有各自獨立的意志 (will) 之上，進而產生憲法機關之間的競爭與制衡。但麥迪遜沒有想到的是，要讓國家層次的憲政機關得以運作，需要仰賴國家化 (nationalized) 的政黨掌握憲政機關、以及彼此之間的競爭。Schattschneider (1942) 指出，美國政治的三個主要參與者：全國型政黨 (national party)、地方型政治人物 (local party bosses)、與壓力團體 (pressure group)，只有全國型的政黨會真正考慮到整個國家發展的利益，地方政治人物與壓力團體並沒有全國大位的追求欲望及能力。Schattschneider 認為全國型政黨的組織型態具有動員多數人的能力，並且在執政課責上，民眾透過選舉對於執政的全國型政黨課責，也比針對單一總統的課責來得更全面、更能達成憲法中分權制衡的效果¹⁰。美國制憲者在制憲討論之初，並沒有想像到當今的政黨興起、動員、與競

⁸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院負責，憲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停止適用：一、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二、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立法院應於七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三、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不信任案提出七十二小時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院院長應於十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一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項法律，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

⁹ 如釋字 391 號、419 號、498 號、520 號、613 號、645 號。

¹⁰ Aldrich (1995) 則指出，Schattschneider 在 40 年代認為支撐美國的全國性政黨的分贓制度 (spoils system) 在 20 世紀尾聲已經越來越消失，使得選舉越來越從以黨為中心轉變為以候選人為中心，政黨轉為服務性質，但有意參選的候選人仍仰賴政黨提供的選舉與政策資源、以及品牌，尤其是在今日選舉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同時，選民在清楚美國兩大黨分歧之下，考量投票意向時仍大量參考政黨標籤。這兩個原因綜合起來，使得今日美國憲政機關運作仍是合理的近似 (reasonable approximation) 政黨政治。

爭的能力。當政黨之間的競爭與極化加劇時，例如今日美國的政黨政治運作之下，憲政機關間是否會發揮制衡的功能、或是會毫無制衡效果，取決於各憲政機關是否掌握在不同且對立的政黨手中。Levinson 與 Pildes (2006) 因而建議，對於憲政機關制衡的觀察與研究，應該從憲法層次的「機關制衡」，轉而研究不同政黨掌握權力與競爭間的「政黨制衡」，方具有實證上的意義。

同時，Ladd (1990) 指出，因為美國民眾一邊追求社會福利、一邊也擔憂政府規模太過龐大，這兩個目標存在潛在矛盾，且美國兩大黨對於政府規模的態度又大相徑庭，共和黨支持縮減政府規模、民主黨則主張提升社會福利。因此，民眾有意地希望兩大黨的政治權力處於對立，也就是「透過選票讓兩大黨分別擁有行政與立法權，以期達到分權制衡的效果」，避免一致政府的出現導致政策太過偏頗。即使麥迪遜對於政黨的評價並非正面 (Marcus, 1988)，但當政黨政治形成常軌時，不同政黨分別掌握行政與立法權，才能使得麥迪遜所追求的共和原則政府得以實現。當民眾把憲法機關之間的制衡，轉化為不同政黨間透過分別掌握不同憲法權力來相互制衡，這種政黨制衡的態度稱為「認知麥迪遜主義」(cognitive-Madisonianism)。因此，即使美國選舉一再地選出分立政府、即使民眾對於國會或總統的表現經常不滿意，但在多次的民意調查中，美國多數民眾仍支持分立政府這一概念的價值，也就是支持不同政黨分別掌握行政權與立法權，而並不會認為分立政府的存在本身是個麻煩 (Ladd, 1990; Stewart III, 1991: 203)。

對於我國來說，我國經歷了戒嚴時期國民黨的長期一黨領政，在此一元架構下，缺乏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的制衡互動 (楊泰順，2008)。在解嚴之後，憲法重新開始運作，隨著民主進步黨興起，同時造成臺灣主要社會分歧的國家認同問題與統獨議題逐漸浮上檯面 (Hsieh and Niou, 1996; Lin et al., 1996; 謝復生，2011)。統獨進而成為臺灣藍綠兩大陣營的最大差異所在，而且是對原則的相互反對，較不具妥協空間 (Sartori, 1976: 132; 楊泰順，2008)。政黨間的重大差異，加上各政黨黨紀約束力形成政黨競爭模式，使得我國憲法上的行政、立法間是否存在機關

制衡，同樣取決於行政權與立法權是否被不同陣營為擁有：當分立政府成形時，較可能相互制衡，其負面的形容方式為「產生憲政僵局」；而當兩權皆為同一陣營所持，則機關間的制衡恐不存在。西元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我國民眾第一次接觸到憲法層級的行政、立法權由不同政黨掌握的分立政府情形，而分立政府的成因及造成的影響才逐漸獲得重視（吳重禮，2000；吳重禮、王宏忠，2003），此時政府的分權制衡，即為政黨制衡之下產生的機關制衡效果。而前言所提及 2004、2008 年幾次大選中的政黨訴求，包括「完全執政、完全負責」、「制衡型總統」、「立委過半，讓法案不耽誤、政府好做事」、「要制衡、反獨裁」等主張，基本上也並非憲政機關間相互制衡效果的討論，而是建立在不同政黨掌握憲政權力與否下產生的政黨制衡效果訴求。

因此，對於臺灣民眾心中制衡觀的討論，在如今修憲門檻過高、短期之內憲政制度難以改變、藍綠兩陣營高度政黨競爭的情形下，本研究認為應該由原本的憲政層次之「機關制衡」問題，轉化成探討認知麥迪遜主義的「政黨制衡」議題，這是我國民眾制衡觀討論的應然面。

第二節、制衡觀的重要性及其來源

本研究選擇探討我國民眾心中制衡觀的強弱與成因，是因為我國民眾對於制衡的思考方式，對臺灣這個分歧社會的憲政運作及民主鞏固有非常大的影響。

Diamond (1999) 指出，政治文化中使自由民主得以成長與鞏固的重要信念，在於追求共識並彌補裂痕與衝突。我國民眾心中以國家認同為主的二元社會分歧，與國外以宗教、種族或語言為主的分歧不同，但亦是社會上區塊間隙的一種 (Lijphart, 1977)，而臺灣政治藍綠兩大陣營也沿著統獨議題的區塊間隙而生。面對分裂社會上的區塊間隙，Reilly (2001) 與 Lijphart (1977) 分別希望透過選舉工程改革或聯合民主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的方式，來降低分裂社會可能產生的衝突。

Reilly 指出，空間理論的中位選民造成政黨趨中的推論，是建立在社會並無重大分裂、且選民屬性相近的假設上；當社會存在明顯的分裂時，候選人不一定有動機趨向中位選民，而可能是僅抓住自己同種族或同語言選民的票，而使菁英或政治領袖的立場趨向極端。Reilly 研究北愛爾蘭、斐濟、斯里蘭卡等分裂社會的選舉，發現可透過選舉制度的改革，來促成分裂社會中各區塊政治領袖間的合作與妥協，例如將選制改為選擇投票制 (preferential voting)。他稱這種降低分裂社會中衝突的過程為向心主義 (centripetalism)，為避免民主制度在分裂社會的國家中瓦解所進行選舉工程。然而，選舉工程有機會處理我國的分裂社會嗎？在民國 94 年我國任務型國大完成的第七次修憲之後，因為未來修憲門檻極高¹¹，無論是憲政制度或是選舉制度短期內皆難以變動，因此社會分歧恐怕難以透過選舉工程的制度設計減低。

Lijphart (1977) 透過對奧地利、比利時、荷蘭、瑞士等四個多元社會的民主發展經驗，提出以聯合民主的方式來降低間隙產生的衝突。聯合民主是指透過各區塊的菁英共同組成大聯合政府 (grand coalition)，組成的各黨間具有相互否決權，並在資源配置上有比例性、以及各區塊擁有高度自治權。然而，Lijphart 的建議僅適用於國內有一定個數區塊以上的多元社會，例如國家內同時有語言、種族、宗教等不同間隙交錯產生數個區塊；在面對如英國或我國的兩大陣營間對抗模式中，聯合民主提倡的大聯合政府概念恐怕是不適用的。

另一方面，Riker (1982) 在其著作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中指出，各種民意匯聚的集體決定方式由社會選擇理論的形式推論來看皆有所缺失，尤其是選舉結果會受到議程設定與選舉制度的操弄 (manipulation)，因此民主制度的作用是自由主義式的防止民意機關濫權，而非民粹主義式的彰顯民意、贏者全拿，兩者甚至在憲法層次上並不相容 (incompatible)。因此，Riker 支持麥迪遜主義的分權

11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不適用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定。」

制衡，而在本研究前段的討論中，這意謂著在政黨政治之下的政黨制衡。我國半總統制的憲政制度設計，並不排除行政權、立法權由不同政黨主導的分立政府出現之可能性，也使得分立政府成為我國憲政體制必然存在的基因。選擇要將行政、立法權給同一個政黨或是給不同陣營，是端賴我國全體選民投票作出決定的（蘇子喬，2011）。

因此，除了選舉制度面的改革、或是政治菁英間妥協達成大聯合政府外，假如臺灣選民在經歷八年分立政府時期後，心中確實自發地出現了追求憲政機關相互制衡的強態度制衡觀，意謂著臺灣選民可以透過合併選舉的分裂投票、或在單一選舉中支持在野黨的方式，來促成分立政府出現、主動避免一黨獨大（黃秀端，2006），在政黨政治之下透過「政黨制衡」回復原憲法賦予機關制衡的效果，使憲法中的分權制衡得以運作。

憲政機關的制衡與否，是較政黨認同與競爭更為上位的概念，畢竟憲法設計時考慮的行動者時，是並不包含特定政黨，而是相對中立的。因此，我國憲政機關產生的方式是分別選舉，提供了人們選擇政黨制衡與否的空間，當人們可在實存政黨競爭之上，抽象思考機關互相制衡與否對於我國社會是否有利而進行憲政制度選擇時，就猶如 Rawls（1971）所云在無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後面進行憲政制度選擇。無知之幕是一種假定，假設一種狀況，當人們在各種社會制度中進行選擇時，沒有人知道他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不知道階級身份或社會地位、不知道自己的經濟或社會狀況、也不知道自己屬於社會的哪一世代。但大家共同知道的，是當下整個社會的運作情況，而自己如同旁觀者一般，稱之為在無知之幕後面。Rawls 指出，此時社會制度選擇的立約者（contracte）不會為損失而退讓，因為可能當揭開無知之幕後發現自己是受損的一方，因此每個人都不得不為所有人而進行選擇與考量。而這樣抽象思考後的制度選擇，會使所有人選擇一樣的制度，而該種社會制度即是作為公平的正義的、不會讓任何人受損。是故，當民眾得以在政黨認同之上，抽象思考憲政制衡與否時，即像是在無知之幕後面

對整個台灣社會進行考量。

民眾強態度的制衡觀，導致的外顯行為，將可能讓各區塊的菁英分別擁有憲法賦予相互制衡的權力機關，進而導致各區塊菁英之間具有相互否決、制衡的權力，促成區塊菁英間的對話與可能的妥協，最後達到促成降低區塊間隙衝突的效果，形成有利民主鞏固的政治文化。這種途徑並非透過制度改革或菁英主動妥協，而是透過選民親身經歷的政治經驗來影響民眾心中的民主價值。因此我國民眾對於制衡觀的思考方式，對於臺灣這個分歧社會的憲政運作及民主鞏固有非常大的影響。

然而，Diamond (1999) 在過去對於我國與韓國的政治文化研究指出，這兩個亞洲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治文化中，在十年前仍富有重視團結、尊重威權、希望被強人領導等元素。而 Reilly (2007) 對於東亞八國選舉改革的研究、以及 Lin (2012) 對於我國選制改革的研究，皆指出臺灣選民相較於追求選舉中的等比例性 (proportionality)，更在意的是政治穩定 (political stability) 或可詮釋為效率 (efficiency)。這些價值，基本上是與強態度制衡觀是相互衝突的，卻可能因為民眾的弱態度的制衡觀，稱之為「情境制衡」，而導致「在傳統制衡觀的測量上測出制衡的態度，實際上卻只是其政黨認同的合理化」，並非真的希望產生機關制衡的效果。換句話說，民眾對於制衡觀的支持與否，可能是來自於政黨動員所致，受到政黨操作而擁有暫時的態度，而政黨的立場即是當下政治情境是否對自己有利而已。因此，我國民眾到底有沒有高度概念化的制衡觀，此乃值得研究的課題。

那麼，就算民眾心中確實有認知麥迪遜主義的「政黨制衡」的話，為何我國民眾會有這個態度？是希望憲政機關間制衡些什麼呢？

民眾心中存在政黨制衡的可能緣由，以往文獻探討的並不多，但可大致區分成民主價值以及政策中和兩大類，而我國特殊的族群認同與演變，本研究認為亦可能成為制衡觀的來源之一。

Marcus (1988) 指出，美國民眾心中會存在著麥迪遜主義，是因為這是美國

國父與制憲者的思想，而這個思想透過歷史、教育、文化，深刻地存續在美國人民的心中。因此，美國民眾會認為制衡觀重要，珍惜「機關間相互制衡」本身的民主價值，而非特定的立場或是私利的考量；對於我國來說，我國憲法中也存在著機關制衡的功能，但我國民眾心中本身是否自發的珍惜政府機關分權制衡？現階段相關研究討論甚少¹²，但這同樣可能是民眾支持制衡的原因，尤其是在近年來公民教育普及、資訊科技高度發展之下，民眾的教育程度與政治資訊接觸機會皆有所上升，理論上更容易接觸到制衡等民主價值的討論，因此可能會選擇支持制衡本身存在的價值。另一方面，我國近年來的民主化發展進程，使不同年齡層的國民對於民主制衡有不同的體會與意識型態，導致經歷過戒嚴時期的民眾，相較於新興世代在經歷第一次分立政府後，更可能反對分權制衡、追求一致政府（徐永明，2004；游清鑫、蕭怡靖，2007）。除了教育與年齡外，民眾的性別導致生活經驗的不同，同樣可能影響民眾對於民主價值與制衡觀的支持與否（黃秀端，1998；盛治仁，2003）。然而，這一類型對於制衡觀有無的解釋方式，其缺點在於，這種意識型態的支持本身並不容易驗證或否認，僅能透過民眾教育程度、性別、年齡、政治知識（political knowledge）對於民眾制衡觀有無的正負傾向，來間接推論制衡觀存在的原因。

Fiorina（1990）在研究與解釋美國存在分立政府的原因時，曾提出政策中和模型（policy moderation model）來解釋美國民眾希望制衡的原因。在 Fiorina 的空間模型中，民眾心目中的兩大黨分別是傾向左派與右派的，而民眾本身大多數是傾向中間，即使有左右派也並不強烈。然而，當有任一政黨同時掌握了行政與立法權時，可能會促使政策產出極端偏左或是極端偏右，導致政策產出的空間位置與民眾的理想點差距過遠；相較之下，假如兩政黨分別掌握不同憲政機關，在相互制衡之下，整體的政策產出就不會極端，而是會政策中和而產出空間位置較中間

¹² 國內大部分提及制衡觀的研究，即使視為依變數，大多都是將制衡觀視為民主價值的一部分，與其他民主價值題目進行加權運算（張佑宗，2011；陳光輝，2010；黃秀端，1998），因此無法直接解釋民眾制衡觀有無的原因。

的政策，這樣的產出會與多數民眾自身的理想點較為接近。Fiorina 使用美國選舉研究調查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ANES) 中 1984 年與 1988 年的民調資料，發現政策傾向較為溫和 (moderate)、以及政黨認同較弱的選民較傾向分裂投票。

相較於左派與右派是美國主要的社會分歧，我國最大的社會分歧主要來自於統獨議題的爭論，甚至我國國小學生的政治態度上即對於統獨選擇有所差異 (吳宜芳，2004)。藍綠兩大陣營也沿著統獨差異而各據一方，民眾的政黨認同即使有所改變，也大多沿著藍綠的界線改變，就藍綠界線來說是長期穩定的 (盛杏媛，2010)。不過，臺灣民眾對於統獨的調查上，除了部分的急統與急獨論者外，大部分的民眾選擇的是現階段先維持現狀，而將統獨的改變放在較遠的未來、甚至希望永遠維持現狀 (陳陸輝、周應龍，2004；劉嘉薇等，2009)。在此邏輯之下，假如臺灣民眾大多數希望維持現狀的話，一旦民眾發現兩大黨的政策位置是遠離自己且走向極端的競爭型態，則民眾心中即可能存在政黨制衡、及政黨制衡背後的機關制衡，並進一步希望透過合併選舉中分裂投票或是單一選舉支持弱勢黨的方式，來促成分立政府，使政策產出較接近自己的理想點，也就是維持現況的多數民意。

在分裂投票的研究中，常常作為與 Fiorina 政策中和理論互相比較的文獻，為 Petrocik (1996) 與 Jacobson (1990) 提出的議題所有權理論 (issue ownership)。Jacobson 與 Petrocik 認為，美國民眾之所以會投票造成分立政府，並不是因為希望兩個憲政權力機關互相制衡，而是認為共和黨較擅長外交、而民主黨較擅長內政，所以希望負責外交較多的總統職位由共和黨擔任、負責內政較多的國會由民主黨為多數，使得選民自身的利益極大化。然而，本研究認為，議題所有權理論與本研究欲研究的台灣民眾制衡觀之間是較難以對話的，其理由有四：第一，議題所有權理論強調的是不同憲政機關間因功能不同 (外交或內政)，而不同政黨提出的候選人擅長的領域亦不相同，因此進行分配，其討論刻意的忽略了憲政機關間對

政策產出的牽制效果；而 Lacy 與 Paolino (1998) 針對德州選民的實證資料顯示，民眾在投票選擇時，確實會考慮到不同總統與國會多數搭配下對於政策產出的影響，也就是會考慮到分權制衡，故對 Jacobson 的理論提出了挑戰；第二，以我國統獨立場的爭議來看，要像外交或內政來定義所謂的「好」或「壞」，其爭議性是更大的，因為我國統獨立場造成爭議的原因，即在於對於評判標準或終極目標沒有共識，因此不同選民心中，對所謂的「統獨議題處理較好」恐怕有完全不同的解釋方式；第三，如何定義議題所有權？Petrocik 等人 (2003) 對於美國選舉議題所有權的研究，是針對兩大黨於選舉中的所有競選廣告進行內容分析，發現不同政黨會刻意在時間上提前、或是在內容上不斷強調某些議題，而兩大黨著重的議題亦不同，視為是選舉中議題所有權的實證資料。而對於我國來說，張卿卿 (2010) 研究 1996 年至 2008 年選舉中的競選廣告議題，發現兩大黨在競選廣告上已有議題聚合 (issue convergence) 的現象，皆不約而同強調兩岸關係與經濟議題的重要，因此由政黨或廣告來看，可能正是因為民眾對於統獨立場的目標不同，所以兩大黨皆強調不同方向的兩岸關係，使得議題擁有權討論與定義變得更為複雜。因此綜合以上的理由，本研究認為議題擁有權理論對於我國民眾的制衡觀產生的有無來說並沒有直接的影響。

另一種我國民眾可能產生制衡觀的來源，在於我國國情特殊的族群認同歧異降低與轉變。Reilly (2001) 對於北歐各國社會區塊間隙的研究，主要來自於族群以及宗教的區塊間隙。Lutz (1998) 曾指出政治系統持久存在的條件，就在於人民彼此認知為同一族群。我國民眾存在著臺灣人、中國人的族群認同問題，在 2004 年總統選舉時，泛綠更是大量透過區分「中國人與臺灣人」的選舉動員來建立對立的選舉環境 (徐火炎, 2005)。但游清鑫與蕭怡靖 (2007) 指出，新世代的臺灣選民，並未呼應民進黨刻意營造的臺灣意識與台獨主張，而是傾向同時具臺灣、中國人認同的雙重認同，而這樣特屬於我國國情的雙重認同使社會分歧減弱，有助政治系統的持續。在此邏輯之下，假如民眾在族群認同上，同時具有臺灣人、

中國人的雙重認同，可能代表著相較於強調臺灣人或強調中國人的認同方式，心中的族群歧異較低，或者反對政黨提出極端的族群認同主張，故支持機關制衡的方式來消弭族群歧異。

因此，本研究認為，我國民眾心中主觀存在分權制衡觀的可能因素有三，第一是民眾本身經驗、教育而產生對制衡這一民主價值的支持；第二則是由於民眾希望暫時維持現狀，與兩陣營極化的統獨立場相比，民眾發現讓兩大黨彼此制衡，其政策產出才會趨近中位，更接近自己的理想點，這種策略性思考使民眾心中可能存在制衡觀、以希望政策產出不要太過極端；第三則是來自於民眾在於族群認同上，傾向融合的臺灣人、中國人雙重認同。然而，這三者都是建立在民眾的制衡觀是強態度的假設上所提出的解釋，而民眾制衡觀態度強度本身亦是需要探討的標的，且需要實證資料進一步驗證。

第三節、機關制衡、政黨制衡及其測量方式

現有研究對於民眾制衡觀的調查，本研究已區出機關制衡與政黨制衡的定義差異後，即可將現有調查題目共區分為三大類，分別為調查政府與議會間制衡的「機關制衡」題目、調查不同政黨掌握不同機關與否的「政黨制衡」題目、以及詢問民眾對於特定候選人與政黨搭配支持與否的「現況制衡」題目。以下將逐一討論各類題目的優缺點，以及本研究的選擇，三種類型題目的優缺點，列於表 3-1。

詢問民眾對於「機關制衡」類型的題目，主要來自於胡佛（1998）發展出的民主基本價值指標，題目為「政府如果經常受到議會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為了」或是「如果議會常過問政府的事，政府就不好辦事」，並詢問民眾贊成與否。此類題目在我國的調查使用已經超過二十年，自解嚴前的中研院社會變遷 1985 年第一次調查¹³就開始以此題目來訪查民眾的制衡觀有無。題目敘述中，僅有政府與議會兩個憲政機關行動者，而無政黨參與，本研究歸類為機關制衡的題目。這類題目

¹³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之「臺灣社會基本調查」第 1 期第 1 次計畫，該計畫係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楊國樞教授執行。

在我國相關研究中被視為是民主價值（黃秀端，1998）、間接民主支持（張佑宗，2011）、對議會制衡的支持程度（盛杏媛、黃仕豪，2006）等。然而，本研究認為，這一類的題目在敘述上存在一個重大的問題，在於無法測到民眾對於「機關制衡」的支持與否。盛治仁（2005）以焦點團體法研究民眾對於「政府如果經常受到議會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為了」的認知，發現民眾對此題的否定態度除了代表否定制衡觀外，亦有民眾是因為不瞭解「大作為」的定義、或是主觀認為我國議會牽制對政府不具效果。

表 2-1 制衡觀問卷題目類型比較

題目類型	研究標的	問題問法	問卷使用	特色或潛在問題
機關制衡	政府 議會	「政府如果經常受到議會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為了」 「如果議會常過問政府的事，政府就 不好辦事」	胡佛(1998) 社會變遷	1. 未見政黨角色 2. 民眾對於大作為、辦事的認知不一致 3. 支持反對邏輯不嚴謹
政黨制衡	支持同一政黨掌握憲政機關與否	1. 「行政權、立法權為同一政黨所有之一致政府」或「行政權、立法權為不同政黨擁有的分立政府」 2. 「總統與立法院的多數立委最好是不同黨，才能互相制衡」或「總統與立法院多數立委最好是同一政黨，才能貫徹政策」 3. 「為了有效監督政府，我們需要有很強的反對黨」	蓋洛普民調 ANES TEDS	1. 相較於第一類題目，行動者由憲政機關轉成政黨，但並非特定政黨，提供抽象思考的空間 2. 第 1 種與第 2 種問法相較，前者重狀態後者重功能 3. 第 3 種問法同樣有反面邏輯不嚴謹的問題
現況制衡	特定政治人物與特定政黨搭配	「是否支持特定候選人離開原有黨團加入另一黨，使一致政府的政治情勢轉變為分立政府」 「是否會因為特定總統候選人當選，而導致民眾在國會選舉時選擇不同政黨來造成一致或分立政府」	Nicholson (2005) Lacy and Paolino(1998) Smith et al., (1999)	1. 行動者由政黨轉為特定政黨人物，方便思考卻缺乏抽象思考空間 2. 可能受到民眾對政治人物評價的干擾

本研究進一步認為，此題的敘述方式並無法顯示民眾對於機關制衡的支持與否：當民眾在此題之下回答「同意」時，他認為政府受到議會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為或不好辦事，但研究人員並不知道受訪者到底支不支持「政府沒有大作為」或「政府不好辦事」這件事，只知道民眾主觀認為議會牽制對行政權具有壓制效果而已。也許民眾支持政府大有為，厭惡議會強力監督制衡，他會在這題回答同

意；但也許有民眾偏好政府小而美，支持議會強力監督制衡，他在這題也會回答同意。在此邏輯之下，這組題目只能測到民眾對議會制衡有效與否的觀察，並無法測到民眾對於機關制衡的支持或反對態度。加上前部分論述我國機關制衡轉換為政黨制衡的過程，本研究認為現階段研究我國民眾制衡觀的有無，使用這類題型效度不足且恐失時效，故不採用、也不建議此類題目與資料進行分析。

詢問民眾對於「政黨制衡」類型的題目，主要有三個問法：第一個是詢問民眾較偏好「行政權、立法權為同一政黨所有之一致政府」或是偏好「行政權、立法權為不同政黨擁有的分立政府」；第二個問法為詢問民眾較偏好「總統與立法院的多數立委最好是不同黨，才能互相制衡」或「總統與立法院多數立委最好是同一政黨，才能貫徹政策」；第三個是詢問民眾是否贊成「為了有效監督政府，我們需要有很強的反對黨」（陳陸輝、游清鑫，2002）。即使制衡關係仍存在於行政與立法間，但此類型的題目敘述者已經由憲政機關轉變為政黨，因此本研究歸類為政黨制衡的題目。這類題目在國外已經使用超過半世紀，包括蓋洛普民調（Feigert, 1979）、ANES 中，皆使用此類題目調查民眾之制衡觀，而相關研究許多是使用第一個的一致或分立政府偏好（Sigelman et al., 1997; Lewis-Beck and Nadeau, 2005）；我國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則是第二個題目，重點由一致或分立政府變為制衡或貫徹政策，與第一種有所差別¹⁴。此類題目包含了由機關認同轉變為政黨認同的測量，並且題目並不包含實際政治場域運作的人事物，因此提供民眾抽象思考與判斷的空間。政黨制衡類型題目中，第一個與第二種的差異，在於以分立政府或以制衡觀為詢問對象，前者重現象而後者重功能，第二個問法與本研究欲探討民眾之制衡觀較為相符。

相較於前述兩端點固定的問法，政黨制衡型題目的第三個「需要強的反對黨」同意與否的問題，本研究認為這個僅有一端點固定的問法同樣存在著問題：當民

¹⁴ 值得注意的事，我國使用此一題目的相關文獻中，將此種制衡觀視為「控制政府權力」（陳陸輝、游清鑫，2002；游清鑫，2004；吳重禮，2008），惟此命名方式無法區分出機關制衡與政黨制衡的差異，而就本研究之討論來看，這些文獻中所言之控制政府權力的定義與政黨制衡接近，而非機關制衡。

眾對於此題回答不同意時，可能代表數種意思，包括民眾並不贊同制衡、或是民眾贊同制衡但不需要強的反對黨。因此，使用這個問題詢問民眾，其實並無法探求民眾對於制衡觀的贊同與否。三者相較之下，故本研究將以民眾對第二個「政黨制衡」題目之回答為探討民眾之制衡觀有無，因為其題目直接問到了民眾對於制衡與否的支持，並使用 TEDS 的資料進行分析。

最後一類制衡觀的題目，則是詢問民眾對於現狀改變與否的「現狀制衡」類型態度，例如詢問民眾是否支持特定候選人離開原有黨團加入另一黨，使得原有一致政府的政治情勢轉變為分立政府 (Nicholson, 2005)、或是詢問民眾是否會因為特定總統候選人當選，而導致民眾在國會選舉時選擇不同政黨來造成一致或分立政府 (Lacy and Paolino, 1998; Smith et al., 1999)。這類題目以實際政治現況為情境詢問民眾，優點在於使受訪者更容易判斷，但缺點在於並無法真實測量民眾是否抽象思考制衡觀，而可能僅測到民眾對特定政黨或候選人的偏好與否，題目參入政治實際運作將納入太多干擾變數。故此類題目也並不符合本研究欲探討我國民眾制衡觀的需求，故本研究並不採用相關題目作為研究對象。

因此，現有研究中三大類的制衡觀題目中，本研究認為「政黨制衡」類中的第二個題型，也就是詢問民眾「總統與立法院的多數立委最好是不同黨，才能互相制衡」或「總統與立法院多數立委最好是同一政黨，才能貫徹政策」的題目，相較於其他類或同類其他選擇來說，是更適宜研究我國民眾的制衡觀，因為他符合我國實務運作中的「政黨制衡」，以及不帶政治實況地提供民眾抽象思考的空間，因此得以透過資料分析民眾政黨制衡觀的有無。

第四節、制衡觀與分裂投票

美國 1950 年代以來長期的分立政府，引發學界對於分立政府成因的分裂投票 (split-ticket voting) 有所重視，而認知麥迪遜主義被視為是分裂投票的重要解釋變數之一。對於分裂投票的解釋，主要分為非蓄意說與蓄意說兩種。非蓄意說者

認為民眾會分裂投票的原因包括了現任者優勢、挑戰者素質不佳、共和黨擅外交而民主黨擅內政的議題所有權影響，而並非故意地分裂投票（Jacobson, 1990; Petrocik, 1991: 15）。

蓄意說以 Fiorina（1990）的政策中和模型為主，認為民眾選擇分裂投票造成分立政府，是避免政策太過極端，透過投票讓不同政黨掌握不同政治權力，相互制衡而使政策產出趨近中位，此時政黨制衡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然而，Brady（1993）指政策中和模型中預測的選民行為與政黨認同相違背，因為在空間理論（Downs, 1957）中，選民會支持與自己利益最接近的政黨以極大化利益，但政策中和模型則預測選民有時會投給與自己利益相違的政黨。不過，Lacy 與 Paolino（1998）設計了一個問卷實驗，要求民眾排出民主黨、共和黨的一致政府或分立政府的政策位置，以及民眾自己的政策立場，發現民眾在投票時確實不只會觀察該次選舉候選人的議題位置，並會考量到分權制衡下整體的政策產出，使用制衡下的產出對投票的解釋力也大於對個別候選人的議題立場解釋力，故其資料證實了 Fiorina 的理論。但另一方面，以不同的計算方式來定義政策中和的話，Alvarez 與 Schousen（1993）與 Born（1994）的實證資料都不支持 Fiorina 的論點。

從個體資料來看，許多針對美國選舉的研究將受訪者傾向政黨制衡的認知麥迪遜主義視為解釋變數，企圖解釋民眾分裂投票的行為，部分美國之研究指出麥迪遜主義顯著地影響民眾選擇分裂投票（Smith et al., 1999; Born, 2000; Carsey and Layman, 2004; Lewis-Beck and Nadeau, 2004; 許增如, 1999），但也有研究認為政黨制衡的觀念對於分裂投票並無顯著影響（Alvarez and Schousen, 1993; Born, 1994; Petrocik and Doherty, 1996; Sigelman et al., 1997）。Sigelman 等人（1997）更質疑，美國選民對於政黨制衡的麥迪遜主義其實是 Converse（1970）所指的無態度（non-attitude），因為 1992 至 1993 年同一群受訪者只有一半回答了與前一年相同的答案，如同受訪者隨機作答一般。而 Garand 與 Lichtl（2000）的研究指出，民眾的認知麥迪遜主義要在民眾政治知識較高的情況下，才會導致民眾的分裂投

票。Geer 等人 (2004) 則是以大學生為實驗對象，測試在不同的民調數字前提下，大學生的分權制衡觀是否影響到他們的投票選擇，結果並沒有顯著影響。

以國內的相關研究來說，民眾的政黨制衡觀對於分裂投票的影響，同樣是有爭論的。許多不同選舉層級的研究指出，認知麥迪遜主義顯著地促使民眾分裂投票 (吳重禮、王宏忠，2003；游清鑫，2004)，但亦有研究認為政黨制衡對於分裂投票沒有影響 (許勝懋，2000；吳重禮，2008；許勝懋，2009)。其中，游清鑫 (2004) 討論到分權制衡觀點在我國應用時，以 2002 年高雄市長與市議員選舉來說，使用藍、綠兩大陣營作為分類方式，較政黨有更高的適用性，該篇文章得出了泛綠選民的制衡觀對於分立投票較有影響力的觀察。

然而，過往研究麥迪遜主義對分裂投票的影響，存在著幾項缺失：第一，文獻並未區分機關制衡與政黨制衡間的差異，而問法的差異如前文所提確實會影響民眾作答與思考的方式，連帶影響到推論與估計；第二，大部分的文獻只關注單一選舉，因此難以觀察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下、當政黨輪替時，不同政黨支持者對於制衡的態度是否會有所不同；第三，過往文獻大多隱含著假設「制衡認知已經是一個穩定的抽象價值議題」之外生 (exogenous) 假設，忽略了面對不同選舉時，不同政黨候選人的議題態度會隨之改變的政治現實、也忽略了民眾的政黨制衡認知是否可能與政黨認同相關的內生性問題 (endogeneity)。換言之，民眾在接受訪問而回答對於政黨制衡的好惡時，對於分權制衡的想像，可能僅參考當時選舉的政治現實，以及認同之政黨候選人在當下的自利呼籲，而非在抽象的真空中，針對分權制衡的民主價值進行想像與判斷。這些因素都使得直接將民眾的制衡觀視為分裂投票的解釋變數，在方法論上產生疑問，需要對於制衡觀有進一步的討論與釐清。

第五節、態度強度、意識型態、與概念化程度

對於議題態度的研究，半世紀以前心理學的研究文獻認為人們對於議題的態

度是穩定不變的，並且會影響民眾的外顯行為(Cantril, 1934; Allport, 1935; Hovland, 1959)。較近期的研究則顯示，民眾的態度在許多議題上並非穩固，而是經常變動(Eagly and Chaiken, 1993)。Krosnick 與 Petty (1995: 1-24) 指出，與以往研究結果產生衝突的原因，是因為人們對於不同議題的態度強度 (attitude strength) 有強 (strong) 與弱 (weak) 之差別。當民眾認為議題是重要的，而對於議題的態度有明確的好惡時，該態度將會是長久穩定 (persistence)、抵抗改變 (resistance)、並影響民眾的資訊處理 (information processing) 以及外顯行為 (guiding behavior)。本研究認為，強態度與其對外顯行為影響的因果關係，是議題投票 (issue voting) 的基本假定。相對地，假如民眾認為議題不重要，對於議題的態度較弱時，民眾受訪回答的態度就可能常常改變、並不穩定，無法以此態度去預測民眾的行為 (Krosnick and Petty, 1995: 1-24)；更甚者，假如民眾根本不了解問題的意義為何、聽不懂題目、或是選項並未提供無意見，此時民眾在受訪時仍可以給出一個答案，只是這個態度是隨機的、每次重訪答案皆可能不同、完全不具代表意義的，是 Converse (1970) 所指的無態度 (non-attitude)。

Campbell 等人在 *The American Voter* 中 (1960, ch. 9) 指出，民眾心中的價值觀，來自於民眾對於不同議題態度的組成結構以及方式。當各種議題態度間是縝密的、在邏輯上互相依賴、並且有較高層次的抽象化時，則形成個人清楚的意識型態。*The American Voter* 使用的資料為 1948 年至 1956 年三次美國總統選舉的全國抽樣面訪資料，其中 1956 年的資料中，受訪者先被詢問對 16 題政策的看法，作者並統計、觀察民眾是否具有清楚的左右派意識型態；其後受訪者被詢問開放式問題，要求他們說明為何會支持或反對特定議題，作者群再將民眾的回答進行概念化程度的分級：民眾是否有使用意識型態（如左右派）來進行判斷，或是只是團體利益、當時政經環境、政黨認同、候選人取向等。然而，儘管 Campbell 等人 (1960, ch. 10) 發現概念化程度與教育程度有正相關，但整體來說，美國民眾對於議題評價的概念化程度並不高，擁有清楚一致的意識型態，並將意識型態與

政黨認同脫勾的「政治人」(political man)很少。相反的，大多數人對於議題的評價，還是與政黨認同、以及當時的政經環境有關，而非抽象層次的思考。

Converse (1964) 並不使用意識型態一詞，而是使用信仰系統 (belief system) 來描述民眾對於不同議題評價間的結合。Converse 認為，假如民眾對於不同政策的偏好是收斂 (constraint)，也就是各評價的邏輯間並無抵觸的話，則是有穩固的信仰系統，作者並提出了心理學與社會學中對於收斂應存在的支持性理論。作者使用 *The American Voter* 的 1956 年的資料，以及在 1960 年訪問同一群受訪者並進行分析，卻並未找到一致的、具邏輯性的信仰系統，得以普遍適用於美國民眾的回答。

在 Campbell 之後，Nie 等人 (1979, ch. 2) 在其著作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中同樣分析了 1956 年的資料，但將民眾評價的議題分成對政黨、候選人、綜合評價三類，也同樣得出民眾的議題評價未概念化、議題間無法互相依賴的結論。相較之下，Nie 等人反而發現 1958 年眾議院候選人們所回答同樣議題的評價中，候選人 (政治菁英) 的議題概念化程度高於一般民眾，原因來自於政治菁英在教育、資訊程度上較一般民眾為高。Nie 並推論，當美國民眾心中並沒有清楚的意識型態作為判斷標準時，政黨也因此不必選擇清楚一致的意識型態來進行價值判斷。

上述對於民眾議題概念化程度的分類方式，為針對受訪者詢問開放式問題後進行編碼與評價，徐火炎 (1995) 指出議題概念化的高低也就是民眾政治練達度的一種測量方式。但這種研究方式的信度與效度皆受到不少批評 (Smith, 1980; Cassel, 1982; Wyckoff, 1987)。Smith (1980) 重新分析了 Nie 等人 (1979) 的資料，發現民眾的議題概念化高低在定群資料中多變化，亦存在部分民眾的議題概念化程度下降的情形。而 Nie 等人 (1979, ch. 2) 發現民眾對於政黨與候選人的議題概念化程度並不相同；更進一步而言，使用原本的編碼方式，會發現民眾對於不同議題的抽象化思考程度也會不同 (Nie et al., 1979: 38)，尤其當候選人或政黨有特別著重宣傳一些特定的政策或是意識型態時。

議題概念化程度與議題態度強弱間是具有邏輯一致性的。假如民眾認為議題是重要的，則對於該議題的態度是強態度，而不會輕易改變、也不會受到支持政黨的影嚮，符合議題投票的空間模型假定，依據民眾對議題的態度來決定支持的政黨與候選人，也就是議題的高度概念化，也是原本問卷測量欲測到之標的；同時，民眾的數個強態度之間如果具有一致的邏輯、可互相依賴，則形成人心中固有的意識型態，用來判斷其他新出現的、需要評價的議題。但假如民眾認為議題並非重要的、對於議題態度是弱態度的話，則可能會接受政黨的說服與立場，而改變自己的議題態度以避免潛在衝突，視當下情況與情境改變態度，對於議題的評價取決於政黨，形成議題低度概念化的情形，也就是橫斷資料在測量時可能的偏誤，需透過定群資料才得以發現這樣的問題。

如何得知議題對於民眾的強弱，或是議題概念化的高低與否？本研究認為，使用以往對於民眾議題概念化程度的測量方式，即使已加入了訪談與開放性問答，但分析民眾回答內容的方式可能也並不有效。在一般的情況下，各政黨領導人為了選票極大化，會選擇特定的議題立場，且不會交換位置，因此使民眾的政黨認同與議題態度在測量上不易區分開來，無法推論民眾對議題的態度選擇是強態度的抽象價值思考，或只是弱態度的政黨認同合理化。即使使用開放性問題，民眾的回答內容亦可能只是反射性的答出政黨的宣傳文字用語，而不一定是自己抽象的價值判斷。假如僅觀察單一選舉或橫切面資料，更會形成因果推論上的限制。舉例來說，Achen 與 Bartels (2011) 以貝式模型分析 1992 年、1994 年、1996 年的 ANES 的三筆定群資料，發現具有政黨認同的民眾，對於國家財政狀況是否改善的事實問題，以及對於合法墮胎的議題態度等，皆會隨著支持的政黨不同而朝不同方向改變。此時民眾對於議題的態度，可能只是民眾為了符合自己政黨認同而產生的自我合理化的結果：當認同的政黨對議題的態度改變時，透過說服以及民眾的主觀投射，使得民眾對議題的態度也隨之改變 (Campbell et al., 1960, ch. 6: 133; Achen and Bartels, 2011)。民眾對這些議題的判斷只是好像有深思熟慮過 (as

though they are thinking)，但其實只是隨政黨逐流罷了。在這種情況下，傳統議題投票理論中認為議題影響投票的因果關係建構即可能產生錯置，無法拿民眾的議題態度去解釋投票行為或是政黨偏好。

假如民眾的政黨認同有可能影響到民眾對於其他議題的判斷的話，民眾政黨認同的強度越強，對於議題的影響可能也會越大。在 *The American Voter* (1960) 中，提出了以「民主黨—共和黨」為單一座標的「單一面向七分量表」作為測量方式，但曾受到 Petrocik (1974) 質疑其測量出的政黨認同強度在對應到其他政治行為變數時，產生不具遞移性 (intransitivities) 的問題，也就是在實證資料上，政黨認同不強的選民反而比強的選民在某些政治行為或態度上強度更強。考量到我國民眾對於泛藍、泛綠的政黨認同強度，蕭怡靖 (2009) 曾以 TEDS2004L 的資料為例，修正原有的量表，並以資料建立九分類的單一面向「藍綠政黨喜好差異指標」，且發現我國民眾的政黨認同強度與選民的政治態度、政治行為間符合遞移性假設，也就是我國選民的政黨認同強度越強時，選民對選舉的關心程度、投票率、投票給所屬政黨的比率越高，並且藍綠認同強度也與民眾的統獨立場、族群認同也會極端。因此，假如民眾的政黨認同強度會影響到民眾對於制衡觀的判斷，使得政黨認同越強越會隨的政黨而反映出情境制衡觀的話，應該同樣可從民眾的政黨認同強度與民眾對於制衡觀的態度維持與轉變，來看出相關性以及遞移性。

Yu (2004) 曾以 TEDS2001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資料進行分析，將民眾的政黨認同區分為強 (strong)、一般 (moderate)、中立 (neutral) 三類，並發現受訪者的認同強度與制衡觀有負相關，政黨認同越強的民眾，支持制衡觀的比例越低。然而，這篇研究的研究範圍僅限於一次選舉，因此並無從得知民眾心中反對制衡觀是穩定不變的強態度，或是呼應當時政黨菁英的需求來反對制衡觀。換言之，在 2004 至 2008 年這段時間，兩大黨輪流提倡制衡觀的價值，此時具有高度政黨認同的選民，可能亦會基於政黨認同而在受訪時支持制衡觀，又隨著政黨改變態度而跟著改變回答，而反映出情境制衡觀的情形。

以本篇資料的研究範圍來說，我國在 2004 年至 2008 年這段期間，經歷了分立政府時期，且兩大黨對於政黨制衡的議題立場有百分之百的轉變—國民黨為代表的泛藍從支持制衡觀轉而支持完全執政完全負責、泛綠從訴求一致政府轉而追求制衡型民主。這種情勢轉換的特殊事件，使研究者得以觀察民眾對於政黨制衡這一民主價值的態度強弱、思考抽象化程度：假如臺灣民眾在經歷了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時期後，對於政黨制衡的態度是強的、抽象化的，就不會因為選舉結果的變動、政權轉移而在短時間內對政黨制衡的態度有太大的轉變；而從長期來看，臺灣民眾共同經歷了 8 年的分立政府時期，假如這共同經驗普遍性的影響民眾對於政府角色的評價，那民眾應該無分藍綠，而對於政黨制衡的態度有同一方向的變化（Diamond, 1999: 162; Gerber and Green, 1999）¹⁵；相較之下，假如民眾對於政府角色並未能概念化思考，而是弱態度的受政黨認同左右，那並非代表詢問民眾制衡觀沒有意義，而是民眾對於政黨制衡的態度將隨著選舉結果而有對應的改變、以符合認同的政黨立場、合理化自己的投票行為，測到的是視情況決定的情境制衡觀，且民眾的政黨認同強度會影響民眾對於制衡觀堅持或改變的多寡；假如民眾在這段時間內對於政府制衡觀的態度是隨機分配、沒有特殊脈絡存在，即可以透過定群資料觀察得知，而這意謂著民眾對於制不制衡根本不瞭解，而是無態度的隨機作答。

第六節、制衡觀為依變數的相關文獻

如前文所述，現階段對於民眾制衡觀研究的文章並不多，筆者從現有文獻中僅找到三篇，分別是 Nicholson（2005）研究美國民眾對於參議員 Jeffords 於 2001 年脫離共和黨後導致分立政府的支持程度、盛治仁（2003）研究我國第一次政黨輪替的 1998 與 2001 年時民眾民主價值解釋變數、以及 Yu 等人（2010）研究我國

¹⁵ Gerber 與 Green（1999）分析了民主黨、共和黨政黨認同者以及獨立選民對於總統滿意度的總體資料，並指出三種選民對於總統滿意度的變化方向是相同的，意謂著民眾在處理新進資訊時，認知架構上是沒有偏差（unbiased）的。

2008 年總統選舉前後，以 TEDS 資料分析民眾制衡觀改變的情形。

Nicholson (2005) 研究 2001 年 5 月 24 日，美國國會參議員 James M. Jeffords 離開共和黨，使得在兩次選舉中間由共和黨布希總統領政的一致政府轉換為分立政府的特殊事件。研究此一特殊事件的優點，在於因與選舉投票無關，所以可以確實調查民眾的態度而非行為。該研究使用 CBS News Vermont State Poll 以及 CBS News Monthly Poll 的資料，以是否支持 Jeffords 改變政黨作為依變數，並將這個變數作為是否支持分立政府制衡的替代變數，以多項機率單元模型 (Multinomial Probit Model, MNP) 進行迴歸分析。Nicholson 發現當 Jeffords 改變政黨，使得由一致政府轉變為分立政府時，傾向共和黨的支持者與偏好現任總統的支持者，皆反對 Jeffords 的行為，而傾向民主黨的支持者與獨立選民則贊成 Jeffords 的改變。除政黨認同外，選民的年齡越大、選民的左右意識型態越趨向中間，也越傾向不支持 Jeffords。其餘解釋變數如選民的性別、教育程度、種族則無顯著影響力。然而，本研究認為，以是否支持 Jeffords 改變政黨作為是否支持分立政府或制衡觀的替代變數 (proxy variable)，是有疑問的——畢竟選民的不支持，可能僅代表對於「同陣營叛變的厭惡」或「敵對陣營倒戈的歡迎」，民眾不一定會將此行為連結至政黨制衡或機關制衡。另一方面，以個人行為測量對制衡的支持與否，民眾可能受到該政治人物的個人形象分數干擾判斷。且由問題方式來看，由於這是屬於對當下狀況的詢問，屬於本研究分類第三類的現況制衡型題目，民眾對於此一問題沒有抽象思考的空間，因此不知道民眾是否是處於高度或低度概念化的制衡觀來回答此一問題的，除非下次發生同樣事件，但發生於不同政黨時，針對同樣的樣本再行調查。

盛治仁 (2003) 企圖透過民眾社會變數，解釋第一次政黨輪替的 1998 與 2001 年，臺灣民眾制衡觀的由來，並發現教育程度越高者越具制衡觀。然而，其餘的解釋變數在兩筆不同的資料下卻出現不同的結果，包括年齡、性別、國民黨認同、民進黨認同在迴歸模型下的估計值方向皆有所不同。之所以會有不同結果的原

因，第一個可能來自於兩筆皆是橫斷資料，因此無法區分民眾制衡觀是強態度或是弱態度的制衡，亦無法區別出政黨認同對於民眾制衡觀回答的影響；第二是來自於該研究使用對於制衡測量的題目為「政府如果經常受到議會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為了」，此機關制衡的單一端點題目會引發民眾理解的問題，盛治仁（2005）與本研究皆已討論。

Yu 等人（2010）使用 TEDS 定群資料研究我國民眾於 2008 年 1 月立委選舉後及 3 月總統選舉後，民眾對於政黨制衡的態度改變。這篇文章使用的制衡觀的調查題目，與本研究欲使用的政黨制衡題目相同，為詢問民眾是否支持總統與國會多數黨是不同政黨已達到制衡、或是總統與國會多數黨同一政黨以執行政策。Yu 等人以民眾在總統選舉前後是否持續支持政黨制衡、由制衡轉到其他、持續其他、由其他轉到制衡而區分成四類作為依變數，並使用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進行分析，發現選民的政黨認同、在兩次訪問中政黨認同改變與否皆會顯著地影響民眾的制衡觀。而選民的教育程度與政治知識亦對民眾的制衡觀有顯著地影響。

這篇研究與本研究研究方向相近，但仍存在幾項缺失：第一，這篇文章點出了民眾制衡觀與政黨認同間的內生性問題，也對以往分裂投票的外生假設提出質疑，但並未進一步的區分政黨制衡觀、情境制衡觀與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因此僅能概略的說明兩變數間具內生性，而無更細部的討論。第二，這篇文章所包含的解釋變數僅有政黨認同、教育程度與政治知識，而缺乏性別、年齡、統獨等其他解釋變數，因此作為探作解釋民眾制衡觀的成因仍有所不足。第三，這篇文章使用的 MNL 模型，是建立在「選項間彼此互相獨立（Independent from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IIA）」的簡化假定上，此假定未觀察到相同變數反應不一之異質性而未必成立，而該篇文章也說明了其迴歸模型並未通過 Hausman Test，使得該模型對資料的分析並不適合（黃紀、王德育，2009）。第四，這篇文章研究的範圍並未包括 2008 年立委選舉之前，而是僅就選後進行討論，這對於當時的政經情況來說可

能存在著推論上的問題—畢竟在 2008 年立委選舉之前的 2004 立委選舉，泛綠普遍來說支持泛綠立委過半的一致政府，而在立委選舉大敗後方出現支持制衡觀的態度。因此僅分析立委選舉過後總統選舉之前的資料，可能在推論上會有所限制。

現有文獻對於民眾制衡觀的研究並不充份，對於民眾制衡觀強度與政黨認同間也未充份探討，在統計方法論上也並不詳盡，因此本研究將以更全面的分析方式與解釋變數，來探討我國民眾有怎麼樣的制衡觀、又為何會有制衡觀。

第七節、討論與小結

分權制衡的民主價值，不只存在美國的歷史中，亦存在我國的憲法與解釋中。在政黨政治的興起下，憲法分權後機關制衡的運作與否，取決於不同政黨是否掌握不同政治權力的政黨制衡，而民眾對於政黨制衡的態度也將影響到我國憲政運作。我國民眾的制衡觀，可能來自於本身對於制衡的重視、來自於對於兩黨極化統獨議題的中和盼望、或可能來自於民眾雙重的族群認同。以往對於政黨制衡的研究，大多觀察民眾認知麥迪遜主義對於分裂投票的影響，並未考慮民眾此態度本身是否為強態度、是否為抽象化思考。本研究好奇的是，我國民眾對於政黨制衡的判斷，是否真的足以抽離真空抽象思考，達到高度概念化的層次，如同 Rawls (1971) 所云在無知之幕後面進行憲政制度選擇？或是無法脫離現實，使得民眾的政黨認同合理化了民眾的價值判斷，使得民眾會隨著支持政黨的掌權與否，改變對於政黨制衡的態度以合理化自己的政治參與？

假如我國民眾對於政黨制衡的態度僅是對支持政黨執政與否的合理化，測到的只是情境制衡觀，那過往指出政黨制衡導致分裂投票之研究即可能有因果謬誤，需要進一步釐清，也需要針對我國分裂投票的研究尋找其他解釋變數；而各候選人或政黨在選舉時對於一致或分立政府的分權制衡相關呼籲，對選票的影響較高程度上是固票效果，真的追求實現憲法上的機關制衡的比例或影響恐怕較低。

第參章、研究架構與分析方法

在文獻探討中，討論到了民眾對於政黨制衡觀態度的強弱、概念化高度，以及與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在解釋臺灣民眾強態度制衡觀出現的原因上，本研究也提出了民眾自發性或透過教育珍惜民主制衡價值、或者是因為民眾統獨立場趨中、或民眾具有雙重族群認同，導致民眾支持制衡觀的三種可能成因。

為了進一步釐清與說明具政黨認同的選民，在經歷我國 2004 至 2008 年的第二次政黨輪替的過程中，其制衡觀為強態度或弱態度的情形之下，對於制衡觀回答的反應差異，本研究將建立政黨制衡與情境制衡兩種不同的選民類型，形成後文進行實證資料分析時對於制衡觀強度的操作型定義。透過不同類型選民之偏好排序的設定，來推衍 2004 年立委選舉、2008 立委選舉與 2008 年總統選舉的過程中，政黨制衡觀與情境制衡觀的選民，對於制衡觀回答的差異，形成研究假設以供實證資料驗證，並以此說明過往經驗研究中可能的推論謬誤與估計偏誤。

需特別注意的是，本研究此處所云的政黨認同，是指以藍綠作為版塊的認同，游清鑫（2004）曾指出在我國分裂投票的研究上，使用藍綠較政黨有更高的適用性；而盛杏媛（2010）研究 2004 至 2008 年民眾的政黨認同，發現民眾的政黨認同大約有六成是穩定的，剩下的變動者也大多沿著藍綠邊線內改變，整體來說藍綠版塊穩定，因此本研究也將以藍綠作為分界來進行研究。

接著，本研究將使用 TEDS2005 年 1 至 3 月至 2008 年 1 至 3 月、以及 2008 年 1 至 3 月至 2008 年 6 至 8 月兩波定群資料，來針對我國選民的制衡觀態度變化進行觀察，並試圖解釋為何不同民眾心中的制衡觀有所不同、以及藉由結果推測未來我國民眾整體制衡觀的走向。如前文所述，在 2005 年 1 至 3 月時，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陳水扁成功連任，而第六屆立委選舉也剛於 12 月結束，維持了三黨不過半的局面。在選舉過程中，泛綠打出了「立委過半數，安定大進步」、「立委過半，讓法案不耽誤、政府好做事」的施政效率訴求，而泛藍則在總統選舉失利後

強力主打「制衡型國會」、「要制衡、反獨裁」的制衡目標。而 2008 年 1 月的立委選舉中泛藍大勝，而泛藍陣營在其後 2008 年 3 月的總統選舉也順勢喊出了「完全執政、完全負責」、「避免政治僵局」的效率立場；相對地，泛綠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則強力攻擊「一黨獨大」、大聲呼籲「制衡型總統」、「兩黨共治救民主」的制衡主張。在 2008 年 3 月總統選舉結束後，總統馬英九順利擊敗代表泛綠的候選人謝長廷，使得總統與行政院多數黨為同一政黨，也結束了八年的分立政府時期。兩波定群資料所包含的時間，分別為 2005 年第六屆立委選舉後、2008 年第七屆立委選舉後總統選舉前、以及 2008 年第十二屆總統選舉後，包括了兩個重要的選舉以及第二次政黨輪替，適合觀察民眾的制衡觀在這段時間內的變化，進而瞭解民眾制衡觀態度的強弱。由於使用定群資料，進行估計時可避免因抽樣產生不同樣本的隨機誤差，而更能推論不同時期同一批樣本的改變，同時也可避免只關注一次選舉，而無法觀察到政黨立場與民眾議題立場間並無相對應變化的情形。

在分析方法上，本研究將先以總體資料層次來進行初步的分析，使用敘述統計、列聯表（contingency table）與折線圖等方式，觀察 2004 年至 2008 年三個時間點的定群資料中，全體樣本、以及具泛藍、泛綠、無政黨認同者的樣本，對於制衡觀的態度分布及其變異情形。列聯表中的數字為個數，分類方式是類別，此種分析較適合使用卡方檢定（Chi-Squared Test）來觀察兩變數間的相關性（Everitt, 1992），本研究將用來觀察政黨認同與制衡觀之間分布是否為隨機、或有顯著特定的分布。而欲觀察民眾的態度在不同時間點是否有顯著改變、或是變化是隨機的，同樣可以使用卡方檢定來觀察受訪前後的態度關連性，而這種相同題目、相同樣本於不同時間的重覆施測，可以使用一致性檢驗（Cohen, 1960; Landis and Koch, 1977）來計算出 kappa 係數，計算出民眾之前與之後的態度是否一致、或者具有顯著差異。本部分使用的軟體為 SPSS 12.0。

下一部分，本研究將民眾區分成政黨制衡者、情境制衡者、與其他類，並觀察民眾的統獨態度與兩陣營的差異、民眾的臺灣或中國或雙重族群認同、民眾的

政黨認同、以及其他社會變數在不同制衡類型民眾間的差異，進行初步的觀察。在文獻探討中，除了統獨立場、雙重族群認同與政黨認同強度外，民眾的政治知識、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同樣可能影響民眾的制衡觀強度，需要進一步分析。考量到我國民眾對於泛藍、泛綠的政黨認同強度差異，本研究也將使用蕭怡靖（2009）提出的九分類「藍綠政黨喜好差異指標」來區別出政黨認同強度不同的選民，對於制衡觀態度的變化。不同的政黨強度可視為是順序尺度或連續變數，但支持制衡與否則是二分類別變數。假如要檢定是否具遞移性，Everitt（1992: 117-120）提出的方式，是先給予順序尺度變數對應的數值，二分變數給予 0 與 1，並以單迴歸來進行分析。Everitt 的方式相較於蕭怡靖（2009）使用 Pearson's r 或是 Cramer's V 來檢定的差異在於，Everitt 的方法可以檢驗遞移性的正向或負向關係，並且可針對殘差進行檢定，觀察是否有曲線（curvilinear）關係；迴歸檢驗與 Pearson's r 是類似的，但 Pearson's r 無法檢驗殘差，而 Cramer's V 將無法觀察到遞移的正向或負向關係，因此本研究檢驗遞移性將使用 Everitt（1992）提出的方法。

要驗證制衡觀累型與民眾其他變數間的關係時，因為民眾制衡觀的類型為三個，超過兩種，較適合使用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來觀察不同制衡類型選民間的態度與社會變數的差異與否。因為研究涉及不同類型選民的比較，因此除了 ANOVA 外，亦需進行事後兩兩比較（post hoc analysis），本研究選擇使用 Scheffé 事後比較法進行分析。本部分使用的統計軟體為 SPSS 12.0。

最後，本研究將透過多元迴歸分析，來瞭解選民不同的社會變數或政黨認同變數，對於民眾不同制衡觀強度的影響力。因為本研究使用的依變數為制衡觀有無與轉變，包括了兩種以上的情形，較常使用的模型為 MNL 或者是多項機率單元模型（Multinomial Probit Model, MNP），透過最大模擬概似估計（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來估計結果。黃紀與王德育（2009）指出，在分析兩個以上選項之研究時，早期多以 MNL 為主，但 MNL 建立在選項間彼此互相獨立的簡化假定上（independence of irrelative alternatives, IIA），此假定未觀察到相同變

數反應不一之異質性而未必成立。簡單來說，就是 MNL 的各類別依變數中，當抽去任一類別時，選取其他類別的勝算比並不會因而改變。Hausman 與 McFadden (1984) 曾提出 IIA 假設的檢定方法，被後人稱之為 Hausman Test，之後經過 Small 與 Hsiao (1985) 的改良與修正，稱之為 Small-Hsiao Test，在 IIA 的檢定上經常受到使用 (Freese and Long, 2006)。

相較之下，MNP 允許選項間的相關，又無需強行預設哪幾者間有相關，在分析多候選人及多黨選舉之文獻中運用甚廣 (Dow and Endersby, 2004; 黃紀、王德育, 2009)。然而，Long 與 Freese (2006: 313-315) 與 Dow 與 Endersby (2004) 指出，MNP 可以處理誤差相關 (correlated error) 的原因，在於迴歸模型中必需放入替選方案特定變數 (alternative-specific variable)，否則就無法處理誤差。換言之，在 MNP 中，以個案為基礎的變數僅改變了個案選擇特定類別依變數的效用 (utility)，卻未解釋依變數各類別本身的變異。Dow 與 Endersby (2004) 因而建議，假如缺乏適當的替選方案特定變數，而 IIA 檢定又未拒絕虛無假設的話，使用 MNL 是較 MNP 更為適合的。另一方面，王鼎銘 (2012: 85-131) 指出，MNP 對誤差項的積分並非封閉型態，無法使用 MLE 進行估算，而是要採參數模擬的方式進行，稱之為最大模擬概似法 (Maximum Stimulated Likelihood, MSL)。MSL 的缺點在於，假如一開始設定的參數或種子不同，MNP 估計出來的結果即可能不同，需透過較多的樣本來支持模擬次數，使結果趨一致性。

因此，在迴歸模型的選擇上，本研究將先以 MNL 進行 MLE 分析，並對該迴歸模型進行 Hausman Test 以及 Small-Hsiao Test 的 IIA 檢定；假如拒絕 IIA 的虛無假設，意謂著依變數選項間並非獨立，則需要再尋找適當的替選方案特定變數來進行 MNP 分析；假如未拒絕 IIA 假設，則以 MNL 進行迴歸分析，避免 MSL 分析估計參數不同的情形。另一方面，在迴歸模型的選擇上，因為在本研究後文的假設中，並非所有自變數與依變數的共變關係都是朝同一方向移動的¹⁶，而是不同制

¹⁶ 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7，為弱政黨制衡者政黨認同強度最高。

衡觀強度與變數間有不同方向的變化，因此使用有序勝算對數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並不適合。本部分使用的軟體是 STATA 10.0。

在文獻回顧討論以及提出研究方法之後，整理出本研究的整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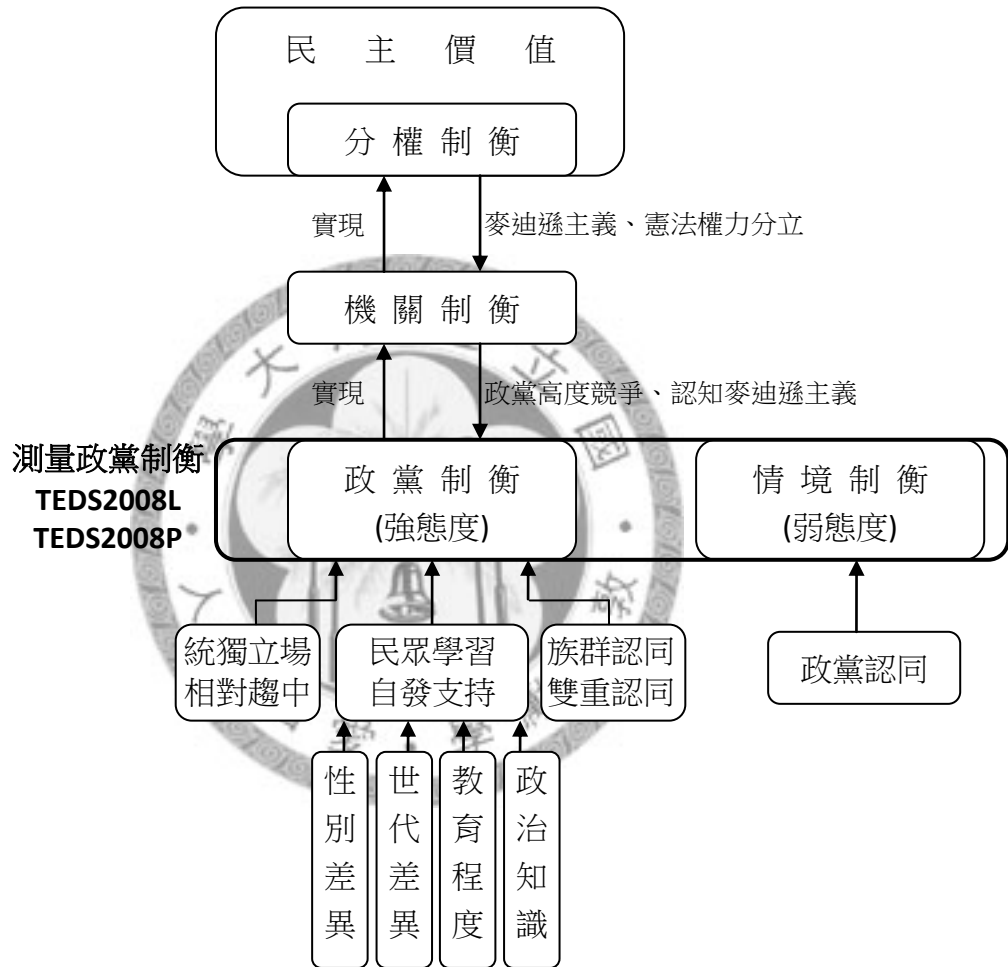


圖 3-1 研究架構圖

第肆章、制衡觀選民類型與研究假設

在文獻回顧中，心理學對於民眾的態度作出了強弱之分，而使得一些民眾對於制衡觀的支持與否可能受到民眾政黨認同影響。然而，現有文獻中對於民眾制衡觀類型與政黨認同間的關係未有清楚的說明，缺乏定義與可否證的假設。因此，在進入實證資料分析之前，本章將先建立制衡觀操作的邏輯，並歸納出不同制衡觀支持的選民次類型，以及可驗證的研究假設。

假設我國民眾的政黨認同，大致可分成泛藍（以 **B** 表示）以及泛綠（以 **G** 表示）。此時民眾可能接觸到的「總統—立法院多數黨」的類型，包括了 **BB**、**GG**、**BG**、**GB** 共四種，其中前兩者的狀況下為一致政府，後兩者的狀況為分立政府。考慮到我國制度設計，總統的權力較立法院為大的情況下（陳宏銘、梁元棟，2007），本研究假設具政黨認同者支持的政黨只能選擇總統或立法院多數，會傾向選擇總統。

第一節、政黨制衡者之政黨認同者偏好排序

假如有一位政黨制衡觀的民眾 S_B ，其政黨認同為泛藍，則 S_B 對於政府組成的偏好排序應如下：

Preference (S_B): $BG > GB > BB > GG$

這種偏好排序的解釋，是指對政黨制衡有強態度的選民 S_B ，最偏好的選舉結果是泛藍掌握較具實權的行政權，泛綠掌握立法權以制衡（**BG**）；次之的選擇仍是相互制衡，只是泛綠掌握行政權，政黨認同的泛藍則是掌握立法權（**GB**）；假如並無兩黨掌握不同憲政機關，則偏好政黨認同的泛藍同時擁有行政與立法權（**BB**）；最不偏好的情況則是既無制衡，兩種憲政機關又都被泛綠掌握（**GG**）。

此種類型之中，無論是總統或立委的單一選舉、或是合併選舉的情況下， S_B 對於兩黨形成分立政府互相制衡的偏好永遠是大於同一政黨掌握兩權的，並不會因為自己支持政黨掌權的多寡，而改變對於政黨制衡的態度。此模型中最特別的預測是，假設今天是泛藍已經在國會取得多數，而總統選舉即將來臨，那對於選民 S_B 來說，因為對 GB 的偏好大於 BB ，因此民眾此時會選擇支持泛綠，以達成政黨制衡的目標。假如今天是總統、立委合併選舉時，民眾 S_B 則會將兩票投給不同的政黨，以符合自己的偏好順序。這種政黨制衡強態度的選民，本研究認為是概念化程度高、具有制衡觀抽象思考能力的選民，也是以往分裂投票研究中假設的選民。

同理可推，一位具政黨制衡觀的民眾 S_G ，其政黨認同為泛綠，則 S_G 對於政府組成的偏好排序如下：

Preference (S_G): $GB > BG > GG > BB$

以 2008 年的情況來看，在 1 月立委選舉之前，泛藍掌握立法院多數、泛綠則擁有行政權 (GB)，此時擁有政黨制衡觀的泛藍支持者 S_B 與泛綠支持者 S_G ，同樣會在立委選舉投給泛藍以追求政黨制衡 ($GB > GG$)， S_B 的投票行為與政黨認同一致，而 S_G 則違反政黨認同，但兩者受訪時同樣會傾向支持政黨制衡；當立委選舉泛藍大勝後，政黨制衡觀的泛藍支持者 S_B 與泛綠支持者 S_G 將會在總統選舉投給泛綠候選人 ($GB > BB$)，以追求分權制衡理想，同時也達到民進黨立委謝長廷的呼籲，此時 S_G 的投票行為與政黨認同一致，而 S_B 則違反政黨認同，但兩者受訪時不變的仍會傾向支持政黨制衡。在 2008 選舉結果出來由泛藍獲得多數 (BB) 後，兩種強態度的泛藍、泛綠選民在受訪時仍會支持制衡觀，也就是行政權、立法權由不同政黨擁有，並不會因為選舉結果有所改變。

在對政黨制衡者來說，民眾對政黨制衡的偏好並不會因為自己支持政黨的執

政與否而有所改變，而此強態度亦會影響到民眾的投票選擇，使民眾在合併選舉中進行分裂投票、或是在單一選舉中可能投下與政黨認同相違背的選票，以追求政黨制衡的可能。換言之，政黨制衡者對於政黨制衡與否的思考是可以超脫當下的政治實況，而在不同時間點受訪時，維持相同的態度。

第二節、情境制衡觀之政黨認同者偏好排序

當民眾的政黨制衡觀為弱態度時，民眾本身的政黨認同將會壓過制衡觀，使得民眾的制衡觀成為合理化自己政黨認同的理由，而在不同選舉結果下受訪時造成制衡觀的改變，故在研究上有區分之必要，本文稱之為情境制衡觀者。

假如一位支持泛藍的民眾 W_B ，對於政黨制衡觀並非抽象思考、而是取決於自己政黨的在位與否的情境制衡觀，則對於「總統—立法院多數黨」之偏好應如下排列：

Preference (W_B): $BB > BG > GB > GG$

同理，支持泛綠的情境制衡觀民眾 W_G 的偏好排列如下：

Preference (W_G): $GG > GB > BG > BB$

以 2008 年的情況來看，在 1 月立委選舉之前，泛藍掌握立法院、泛綠掌握行政院 (GB)。在 1 月立委選舉中， W_B 將會在立委選舉符合自己政黨認同的投給泛藍 ($GB > GG$)，並由偏好排序來看宣稱自己支持政黨制衡；泛綠支持者 W_G 將會符合自己政黨認同的支持泛綠立委候選人 ($GB < GG$)，並由偏好排序來看宣稱自己支持完全執政；當立委選舉泛藍大勝後， W_B 在 3 月的總統選舉將會繼續投給泛藍，以擴大泛藍權力 ($GB < BB$)，並轉而反對政黨制衡，而泛綠支持者 W_G 將會

繼續投綠 (GB > BB)，避免支持的政黨繼續失去更多權力，並開始宣稱支持政黨制衡。在 2008 年選舉結果出來後 (BB)，因為當時未有合併選舉的考量，因此選民認知上下次選舉仍是先以立委選舉為主的單一選舉，故 W_B 類的泛藍支持者將會認為完全執政的現況大於制衡 (BB > BG)，並因此反對制衡觀，而 W_G 類的泛綠支持者認為泛綠取得行政或立法任一權皆較現況為佳，故在受訪時將會支持制衡觀 (BB < BG)。

因此，情境制衡觀的選民，對於政黨制衡的態度是會隨著支持政黨的掌權與否而有所改變，一致不變的是「投票意向符合政黨認同」。這意謂著此類民眾對於這一議題未達抽象化思考的層次，而是與現實狀況緊密結合。

從兩種不同選民的類型建立，可以發現在不同政治環境下可能會有不同的態度認知、進而有投票行為產生，故類型建立區分出了政黨制衡者與情境制衡者的差異，並且進一步說明這樣的差異必需透過如 2004 至 2008 年第二次政黨認同的情境轉換、再搭配上連續訪問同一個選民後得到的定群資料才得以發現在政黨態度轉換下民眾態度是否跟著轉換。故本文選用的研究時機與研究資料，皆是最為適合研究臺灣政黨制衡觀或情境制衡觀的。

但要補充的是，這樣的政治環境是發生於總統、立委分開選的 2008 年以前的選舉。在 2012 年總統、立委合併選舉後，由於相關的資訊更為不確定，選民並不會知道總統或立法院的贏家為何。合併選舉之後，選民不知道贏家為何的情況下，制衡在投票解釋上即會更為複雜。

第三節、討論與假設

即使民眾在受訪時，對於行政權與立法權間的政黨制衡與否皆可給出一個答案，但假如不以政治環境有所改變跨時資料分析，則無法得知民眾對於政黨制衡的偏好是超脫政黨認同的政黨制衡，或是合理化政黨認同的弱態度情境制衡。故類型建構與推衍指出了橫斷面資料分析的局限，以及可能推論上的因果謬誤。

以此觀點來看，以往將民眾對政黨制衡視為自變數，企圖解釋制衡觀對於分裂投票的影響之相關研究（吳重禮、王宏忠，2003；游清鑫，2004；吳重禮，2008；許勝懋，2000；許勝懋，2009），除了因果推論的問題外，更可能會低估了真正強態度政黨制衡觀民眾其制衡觀對分裂投票的影響力。因為從橫切面的訪問資料中，無法區別出民眾回答他支持制衡時究竟是穩定的政黨制衡，或是隨政黨改變的情境制衡，因此可能稀釋了強態度制衡觀的解釋力，導致統計上的偏誤。

本節的討論可以得知，由於 2008 年兩次選舉，使得政經環境改變，會使情境制衡的民眾對於制衡觀的態度改變，而強態度的政黨制衡者的態度不變。在本研究所使用 TEDS 的兩波定群資料中，皆詢問民眾一題有關於制衡觀的題目：「下列兩種說法，你比較同意哪一個？一、總統與立法院的多數立委最好是不同政黨，才能互相制衡。二、總統與立法院的多數立委最好是同一政黨，才能貫徹政策。」在本節推演之下，本研究對於我國民眾制衡觀的態度操作型定義，作出以下區分：

第一，具政黨制衡觀的民眾，在定群資料中將持續保持對於制衡觀的偏好，不會隨選舉結果或政黨輪替而有所改變。

第二，具情境制衡觀的民眾，其制衡觀的偏好與否會隨著支持政黨對選舉的態度而變。以泛藍民眾來說，泛藍情境者是指在 2008 年立委選舉前支持制衡觀、2008 年立委選舉後與總統選舉後反對制衡觀者；以泛綠民眾來說，泛綠情境制衡觀者是指在 2008 年立委選舉前反對制衡觀，2008 年立委選舉後支持制衡觀。然而，考慮到 TEDS 在 2008 年立委選舉後、總統選舉前的訪問時程，與政黨宣傳制衡觀與否可能並非重疊，因此民眾的情境制衡觀不一定會在立委選舉後就立刻改變，而是到總統選舉後才隨政黨改變立場，因此假如泛藍選民在總統選舉後才改為反對制衡觀、泛綠選民在總統選舉後才改為支持制衡觀，同樣是屬於政黨情境制衡觀者。

第三，其他不合理的預期者、制衡觀支持與認同之政黨態度不一致者，則

歸類為其他類。

這種分類方式的主要研究限制，在於缺乏民眾對於制衡觀的開放性回答或質性訪談，因此對於民眾制衡觀的觀察與操作型定義僅來自於民眾對兩波問卷的選項選擇與轉變。儘管在文獻回顧中有討論到開放性回答也不代表高度抽象思考的問題，但僅依靠民眾的問卷作答來分類，無法區分民眾是否是認真選擇、或者是隨機挑選項而產生的答案，兩者外顯行為會相同，這形成推論與解釋上的研究限制。然而，假如確實如本研究所預期的，民眾對於制衡觀的態度有高下之分，那各類型選民依照理論與文獻，在理論預期的解釋變項上、以及其他社會特徵上平均而言應會有所差異，此差異將意謂著分類是有意義與理論價值的。

在定義之後，先就我國民眾制衡觀的總體分布來觀察。下列四種可能的分布與改變情形，吾人僅會觀察到其中一種：

第一，假如臺灣民眾的制衡觀較多人是強態度、高度概念化的政黨制衡觀者，那麼在 2008 年兩次選舉前後的短期的政權轉換時，民眾的制衡觀分佈不應有太大的改變，也不會在不同政黨認同強度的選民之間對於這一已認定的民主價值有所動搖。

第二，假如臺灣民眾的制衡觀是會受到政經環境影響、因為共同感受了八年的分立政府時期而有共同經驗與共同態度轉變，那即使一開始不同政黨認同的民眾對於政府角色的認定可能不同，但長期來說，應該如 Gerber 與 Green (1999) 所推論的，泛藍、泛綠與獨立選民將都會朝向政黨制衡觀者有更高比例的分佈。

第三，假如臺灣民眾的制衡觀較多人是情境制衡觀，是弱態度且並未高度概念化，而是受政黨認同的影響，那麼不只 2005 年資料收集開始不同政黨認同的民眾對於制衡觀的態度會不一樣，並且隨著支持政黨的興替，民眾對於制衡觀的態度分布也會隨之快速轉變，以符合政黨立場，反映出當下政黨的情境。當在區分

出民眾政黨認同強弱時，民眾的政黨認同越強，隨著支持政黨改變立場的比率應該也會越高。在此情況之下，意謂著臺灣多數民眾對於制衡觀是情境制衡觀，並非理論預期的在無知之幕後進行抽象憲政運作思考。

第四，假如臺灣民眾對於制衡觀的支持態度，是 Converse (1970) 所指的無態度，那麼在兩波定群資料中，民眾的立場應該是任意變化，沒有特別顯著地分布改變情形存在。

此外，本研究試圖解釋民眾制衡觀的來源。在文獻檢閱中，本研究提出「民眾自發支持制衡」、「民眾支持接近中位的統獨立場」、「民眾具有雙重族群認同」三個可能的原因。對於「民眾自發支持制衡」的驗證上，本研究使用民眾的政治知識、性別、教育程度、年齡作為間接支持的證據。政治知識較高的民眾、或是教育程度較高的民眾，可能透過學習而更明白分權制衡的民主價值，因此比較可能有強態度的制衡觀。年齡的部分，過往我國研究發現經歷過戒嚴時期的民眾，存在著威權懷舊的現象，支持效率的政府，也對於分立政府較沒有信心，比較不可能具有強態度的制衡觀。性別的部分，盛治仁 (2003) 的研究指出女性較反對制衡觀。因此形成四個虛無假設：

H1: 政治知識越高，越可能是政黨制衡觀的選民

H2: 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是政黨制衡觀的選民

H3: 年齡越低，越可能是政黨制衡觀的選民

H4: 女性較可能是政黨制衡觀的選民

而民眾支持接近中位的統獨立場，這牽涉到三個民眾的主觀認知，第一是民眾自己對於統獨立場的位置，第二與第三是民眾對於藍綠兩陣營的統獨立場認知：當民眾發現自己的統獨立場較為趨中，並且兩大黨的統獨立場較為極端時，民眾可能會發現兩大黨的政策中和之後，其中和點更接近民眾的理想點，因此具有政黨制衡觀，工具性地希望透過政黨制衡來極大化自己的利益。假如以實證資料來觀察的話，即形成本研究第五個假設：

H5: 統獨態度認知較接近藍綠兩大陣營統獨態度的中心點，越可能是政黨制衡觀的選民

論者或以為欲測量統獨議題，直接測量民眾是否位在統獨座標軸之中位、或是直接測量民眾認知兩大黨的態度是否極端即可，但這兩種測量方式產出的結果，並無法解釋民眾是否因此產出制衡觀。民眾即使自己位在中位，但假如與民眾心中的特定黨派立場相同或更為接近的話，民眾不一定會因而產生制衡觀，可能更是偏袒特定陣營；同樣的情況亦發生在測量兩大陣營極端程度上，因為民眾就算認知兩大黨態度極端，但民眾假如同樣極端，亦不需考慮制衡。本研究所設計的假設，也就是民眾理想點接近兩大黨陣營的中心點，在這種情況下，民眾比較可能會產生思考制衡觀的動機，因此較另兩者更適合作為有效的理論。

至於民眾的族群認同上，文獻討論到新世代的選民較具有臺灣人、中國人雙重認同，而在政黨選舉區分臺灣人、中國人的極化對立下，具雙重認同者可能產生對於政黨制衡觀的支持，希望透過制衡來降低族群衝突。因此形成本研究第六個研究假設為：

H6: 具臺灣人、中國人雙重認同者，越可能是政黨制衡觀的選民

另一方面，本研究提出會隨著支持政黨改變制衡觀的情境制衡觀選民，並且在分析上引進蕭怡靖（2009）提出的九分類「藍綠政黨喜好差異指標」來區別出政黨認同強度不同的選民。本研究提出第七個待驗證的假設：

H7: 政黨認同強度越高，越可能是情境制衡觀的選民

第七個假設的理由，來自於對於議題概念化程度的討論，以及前文建立選民類型時的討論。假如民眾具有高度抽象思考的能力，可以脫離現況地針對分權制衡概念進行思考，意謂著他並不只是單一面向地思考支持的政黨；相較之下，假如民眾對於制衡觀這一高層次憲政價值的思考同樣是來自於認同的政黨的話，可能意謂著他對於政黨的認同強度較高，覆蓋了他其他面向的思維。因此，從實證資料來看，應該可以觀察到情境制衡觀的選民，平均而言其政黨認同強度較高的情形。



第五章、資料處理方式

建立研究假設之後，本章說明本研究之資料處理方式，包括各研究變數產生方式。TEDS2008L 為研究人員針對 TEDS2004L 中 B 卷的 1258 名獨立樣本進行追蹤，最後成功再訪樣本數為 703 位。TEDS2008P 為研究人員針對 TEDS2008L 中的 1238 名獨立樣本進行追蹤，最後成功再訪樣本數為 755 位。

第一節、制衡觀

在 TEDS2008L、TEDS2008P 兩波資料中，皆詢問民眾一題有關於制衡觀的題目：「下列兩種說法，你比較同意哪一個？一、總統與立法院的多數立委最好是不同政黨，才能互相制衡。二、總統與立法院的多數立委最好是同一政黨，才能貫徹政策。」本研究的處理方式為：假如受訪者回答支持相互制衡，則編碼為支持制衡觀；假如受訪者回答要貫徹政策，則編碼為反對制衡觀；假如受訪者回答其他選項，包括無意見、拒答、看情形，則編碼為其他。

第二節、政黨認同與政黨認同強度

政黨認同與認同強度的分類上，本研究參考蕭怡靖（2009）提出的九分類的單一面向「藍綠政黨喜好差異指標」來進行編碼。在 TEDS2008L、TEDS2008P 兩波資料中，詢問民眾四個政黨認同的問題，包括了「是否偏向哪一政黨」、「相對來說，是否稍微偏向哪一政黨」、「請問是哪一政黨」、「偏向這個政黨的強度是很強、普通、還是有一點」。假如民眾一開始就回答有偏向某一政黨，則政黨認同強度依民眾之後回答的很強、普通、有一點分別編碼 4 分、3 分、2 分，假如民眾是回答相對稍微偏向某政黨，則編碼 1 分，其餘則編碼為 0 分。民眾對於「請問是哪一政黨」的回答，依據我國國情，將民眾的認同區分為泛藍與泛綠兩大塊（游

清鑫，2004；吳重禮，2008），在 2004 至 2008 這段時間內民眾的藍綠變化不大、十分穩定（盛杏媛，2010）：假如民眾自認傾向國民黨、新黨、親民黨、或泛藍，則編碼為泛藍；假如民眾自認傾向民進黨、台聯、建國黨，則編碼為泛綠；其他民眾則編碼為獨立選民。考量到民眾在大選期間較易接收到政治資訊、對於政治較勇於表態、不會因選後敗選而拒絕表態或改變態度，本研究以第一波問卷後測結果、以及第二波問卷前測結果的 2008 年 1 至 3 月民眾回答認同之政黨作為民眾的政黨認同依據，將民眾區分為不同政黨認同強度之泛藍、泛綠、及其他。

第三節、政黨制衡觀與情境制衡觀

在 TEDS2008L、TEDS2008P 兩波資料中，假如受訪者在前後兩次追蹤訪問中皆回答支持互相制衡，則編碼為「政黨制衡觀者」。

情境制衡觀的民眾，則可能來自於兩個來源：泛藍支持者隨著泛藍陣營態度改變，或是泛綠支持者隨著泛綠陣營態度改變，需要分別定義。對於泛藍的支持者來說，假如在 2004 年立委選舉時支持制衡觀、在 2008 年立委選舉或總統選舉後改而反對制衡觀者，則意謂著他的制衡觀是與支持陣營轉變「方向」是一致的（Yu et al., 2010），前次回答的制衡只是當下的政黨情境制衡。同樣的情形，假如泛藍選民在之前回答無態度，在之後轉而反對制衡、或是在之前回答支持制衡，在之後轉而無態度，這樣同樣朝反對制衡「方向」轉變的態度，本研究都同樣編碼成「情境制衡觀」的泛藍選民。對於泛綠的情境制衡觀選民來說，則是反方向的編碼方式，即 2004 年反對制衡觀，在 2008 年後轉而支持制衡觀，則編碼成政黨制衡弱態度的泛綠選民。考慮到 TEDS 在 2008 年立委選舉後、總統選舉前的訪問時程，與政黨宣傳制衡觀與否可能並非重疊，因此民眾的情境制衡觀不一定會在立委選舉後就立刻改變，而是到總統選舉後才隨政黨改變立場，因此假如泛藍選民在總統選舉後才改為反對制衡觀、泛綠選民在總統選舉後才改為支持制衡觀，同樣是屬於情境制衡觀者。

最後，其他不符合本研究建立之類型者、制衡觀支持與認同之政黨態度不一致者，則歸類為「其他」。

第四節、政治知識

在 TEDS2008L、TEDS2008P 兩波資料中，分別都有詢問民眾五題與三題有關於當下時事性或制度性的議題。在研究上，通常是計算受訪者在該次受訪時答對的題目總數，加總後可讓研究者了解受訪者的一般政治知識程度（傅恆德，2005）。然而，以較長期的政治知識研究來看，因為每次測量題目並不同，時事也有其時效性，不同的題目組合，會使民眾的政治知識題目正確率改變，並不穩定（Boudreau and Lupia, 2011; 林聰吉、王淑華，2007）。

因此，本研究對於受訪者政治知識的測量方式，是將 TEDS2008L 受訪者在前後兩次問卷中回答各五題政治知識相關問題的正確題數相加除以 10^{17} ，將 TEDS2008P 前測的五題與後測的三題正確題數相加除以 8^{18} ，形成一個 0 至 1 的政治知識正確率的指標。因為這分別是民眾在不同時間點的回答，相加後進行比較，較可以消去極端值與短期波動，而代表民眾在定群資料此段時間內大致的政治知識高低為何。

第五節、教育程度、年齡、性別

在 TEDS2008L、TEDS2008P 兩波資料中，詢問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分組與編碼方式為「小學及以下」為 1、「國、初中」為 2、「高中、職」為 3、「專科」為 4、

¹⁷ 在 TEDS2008L 中 2005 年的題組，政治知識的題目為「現在的副總統是哪一位」、「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是誰」、「現任的美國總統是誰」、「立法委員的任期為幾年」、「哪一個機關有權解釋憲法」；而 2008 年的題目為「現在的副總統是哪一位」、「現任的美國總統是誰」、「現在的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是誰」、「哪一個機關有權解釋憲法」、「這一屆選舉的立法委員一任幾年」。

¹⁸ 在 TEDS2008P 中，總統選舉前的題組為「現在的副總統是哪一位」、「現任的美國總統是誰」、「現在的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是誰」、「哪一個機關有權解釋憲法」、「這一屆選舉的立法委員一任幾年」；而總統選舉後的題組為「現任的美國總統是誰」、「現在的行政院長是誰」、「哪一個機關有權解釋憲法」。

「大專及以上」為 5，其餘未回答則視為遺漏值。

而在同筆資料中，詢問受訪者的年齡，在問卷中是詢問受訪者為民國幾年出生，所以將問卷調查日期的民國 97 年減去出生年，作為受訪者的年齡，此變數為一連續變數。

在同筆資料中，詢問受訪者的性別，分組與編碼方式為「女性」為 1、「男性」為 0，其餘未回答則視為遺漏值。

第六節、受訪者統獨立場與認知兩大黨統獨立場

在 TEDS2008L、TEDS2008P 兩波資料中，本研究使用代表受訪者統獨立場的題目如下：「如果主張臺灣應該儘快宣佈獨立的看法在一邊，用 0 表示；認為兩岸應該儘快統一的想法在另一邊，用 10 表示，那麼，請問你覺得你比較靠哪裡？」，本研究直接使用民眾的回答分數，代表民眾對於統一的支持程度，未回答者則視為遺漏值。本研究使用代表兩大黨統獨立場的題目，是接續上題詢問受訪者的統獨立場後的問題，題目如下：「你看國民黨比較靠哪裡？」、「你看民進黨比較靠哪裡？」。受訪者的回答範圍同樣分別為 0 至 10，代表民眾主觀認知兩大黨對於統獨的議題立場位置。

然而，選民如何推論兩大黨互相制衡下的議題立場位置，以及如何判斷自己的立場較接近兩大黨互相制衡下的政策產出？在 Fiorina (1990:76) 提出政策中和模型的假說時，唯一的透過迴歸模型計算的實證資料，是選民對於左右派的意識型態選擇是否為溫和，是一個二分變數。而在政策中和模型計算兩大黨互相制衡的政策產出結果中，Fiorina 僅透過模型指出，因為美國選民主觀上會認為總統的政策制定權力大於國會，所以在座標軸上當為民主黨為總統的分立政府時，其議題位置左右相比，相較於共和黨主政的分立政府來說，會較接近民主黨主政的一致政府¹⁹。

¹⁹ 即 $q > 0.5$ 之假設 (Fiorina, 1992:76)

在 Fiorina 的書出版之後，許多研究提出了不同政策中和的定義方式：Born (1994; 2000) 提出的計算方式，是把兩大黨的政策立場取平均，作為兩大黨制衡後的政策產出，接著計算民眾自己的立場較接近兩大黨平均值、或是任一大黨，假如較接近兩大黨平均值則編碼為 1，代表較有動機支持制衡，其餘為 0。然而，這背後隱含的假設為兩大黨制衡後的結果為兩大黨平均值，這樣的假設可能有問題，因此 Born 分別代入 0.5 至 0.9 的數值，模擬不同的總統議題強度，觀察不同情況下民眾支持制衡的動機是否會影響到分裂投票，而 Born 的實證資料在模擬不同變數下皆不支持 Fiorina 的理論。

Born 與 Fiorina 對於模型的爭論，皆隱含著「全體選民一致」的假設，也就是假設全體選民對於制衡後政策產出的計算方式都是一樣的，因此才會有 0.5 至 0.9 的模擬 (Fiorina, 1994)。Lacy 與 Paolino (1998) 企圖放寬此一假設，即直接在電話訪問中，要求民眾排出民主黨或共和黨主政、配合一致政府或分立政府的四種政策產出位置，以及民眾自己的議題位置，直接去驗證 Fiorina 的模型的正確與否。這樣避免掉了全體選民計算制衡公式一致的假設，而對於 1996 年德州選民的電訪實證資料也發現民眾投票時確實不只會考量到候選人的議題立場，更會考量到分權制衡下的搭配後之政策產出，進而決定投票。

但並非每一筆實證資料皆有如此詳盡的立場調查方式，大部份的資料皆僅有調查民眾自己的立場以及對兩大黨的認知。Carsey and Layman (2004) 提出了另一種計算方式，處理了 Born 與 Fiorina 的計算方式隱含的一個問題，即當民眾議題立場與兩大黨差距不大時，民眾此時立場與兩大黨平均值同樣差異不大，此時民眾就算不支持制衡，其政策產出對民眾的損失也不大，故降低了此種計算方式的解釋力。Carsey 與 Layman 提出的計算方式，是將民眾立場與兩大黨平均值的距離，減去民眾立場至任一較近政黨立場的距離。這種計算方式區別出了「兩大黨皆離民眾很遠」以及「兩大黨皆離民眾很近」的差異：依據 Born 與 Fiorina 的算法，這兩種在計算上得到的結果可能相同，即民眾都有支持制衡觀的誘因；但依據 Carsey

與 Layman 的計算方式，前者會得到一離 0 較遠的負值，後者則接近 0，因此兩者的差異即可區分出來。需注意的是，這種計算方式同樣包含了選民認為制衡計算方式一致（兩黨取平均值）的假設，而這種計算方式雖然會產出連續變數，但卻也加上了線性的假設，即距離差異越大則越可能會追求政黨制衡。

本研究所使用的 TEDS2008L、TEDS2008P 中，由於資料限制，並無法如 Lacy 與 Paolino 一樣直接將模型落實以 Fiorina 的理論。因此，本研究對於政策中和模型的計算方式，將分別測試 Born (1994; 2000) 與 Fiorina (1994) 在政策議題維度上分區來區分選民的計算方式，以及 Carsey and Layman (2004) 透過距離來計算民眾追求制衡可能性的計算方式。第一種計算方式，就是把受訪者回答兩大黨的統獨立場取平均數，視為民眾認為兩大黨相互制衡後的政策產出，並將此值與民眾自己的統獨立場位置來進行比較。假如民眾自身的理想點離兩大黨平均值的距離，比民眾理想點到民眾認知兩大黨任一黨的統獨立場皆來得更近的話，代表民眾希望兩大黨互相制衡的偏好，是大於單一政黨掌權的，此時民眾就可能產生政黨制衡的動機，故這種情況下本研究編碼為 1，代表因統獨立場而具有政黨制衡的可能；其餘情況，也就是民眾自己的統獨立場到兩大黨平均的距離，大於民眾統獨立場到任一黨的距離，此時民眾的偏好應該是距離最小的該政黨，而非互相制衡、或另一政黨。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就編碼為 0，意謂著比較不可能出現 Fiorina 定義的政策中和情形出現。第二種計算方式，同樣是先計算出民眾自身的理想點離兩大黨平均值的距離，再計算出民眾自身理想點離兩大黨的距離，並將前者減去後者較近者，得到一個-5 至+5 的連續變數範圍²⁰。以本文提出的第 5 個假設來看，第一種計算方式是當民眾為 1 時，相較於 0 會更有可能成為政黨制衡；第二種計算方式是當民眾的數值越小時，代表民眾越有可能成為政黨制衡觀者。本文將分別以這兩種方式來測試研究假設 5。在命名上，兩種計算方式分別命名為統獨

²⁰ 這種計算方式的最小值-5，是當民眾的理想點 5 與兩大黨平均值重疊，且兩大黨分別在 0 與 10 的位置，此時計算會得到-5 一值，理論上此時民眾最有支持制衡觀的理由。而最大值 5，是當民眾的理想點為 0 或 10，與兩大黨其中一黨重疊，此時兩大黨平均值為 5，此時民眾最沒有支持制衡觀的理由。故此一變數由假設 5 來看，應該是越小越支持制衡觀。

趨中 FB (Fiorina and Born) 與統獨趨中 CL (Carsey and Layman)。

第七節、受訪者雙重族群認同

在 TEDS2008L、TEDS2008P 兩波資料中，本研究使用代表受訪者族群認同的題目如下：「在我們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臺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臺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資料選取的時間點，與政黨認同一致為 2008 年立委選舉之後、總統選舉之前。因為本研究的研究假設僅牽涉到民眾具有雙重族群認同與否，假設六中假設政黨制衡觀者中雙重族群認同者較高，因此資料處理方式為將「都是」編碼為 1，其餘皆編碼為 0。



第陸章、資料分析

文獻回顧討論我國民眾的制衡觀在概念上為何，而後本研究也透過制衡觀類型建立，指出我國民眾制衡觀在操作上應區分政黨制衡觀者與情境制衡觀者，並建立七個待驗證的假設。本章使用 TEDS2008L 與 TEDS2008P 兩波定群資料進行分析，先觀察全體樣本與不同政黨認同的選民，在這段時間內制衡觀的存續或改變，並在之後逐一分別驗證研究假設，最後透過迴歸分析來進行統整性的觀察與解釋。

第一節、初探我國民眾的制衡觀

我國民眾在 2005 至 2008 年這段分立政府時期，對制衡觀的態度分布為何？轉變情形為何？屬於泛藍、泛綠、或獨立選民，在這段時間內制衡觀態度改變方向是否不同？本部分將依序觀察這段時間內全體選民與泛藍、泛綠、獨立選民各自的制衡觀變動情形。

圖 5-2 為 TEDS 兩波定群資料中，全體樣本對於制衡觀支持與否的百分比變化。圖中可以看到，我國民眾在這四年內，我國民眾在 2004 年至 2008 年經歷了分立政府統治時期後，對於制衡觀的支持態度似乎沒有顯著提高，支持制衡觀者在 2004 年的 4 成 5，於 2008 年立委選後忽然降了 1 成至 3 成 5 左右，在 2008 總統選後又升回 4 成 5。相較之下，反對兩黨掌握不同憲政機關的反政黨制衡者比例在這些年不斷上升，並沒有出現「民眾在體會分立政府後更加認同制衡」的情況發生。另一個可以看出的趨勢，是在 2008 年兩次大選附近，選民的表態率明顯提升，從近兩成未表態降至一成，但支持或反對制衡觀的選民相較於立委選後比例皆有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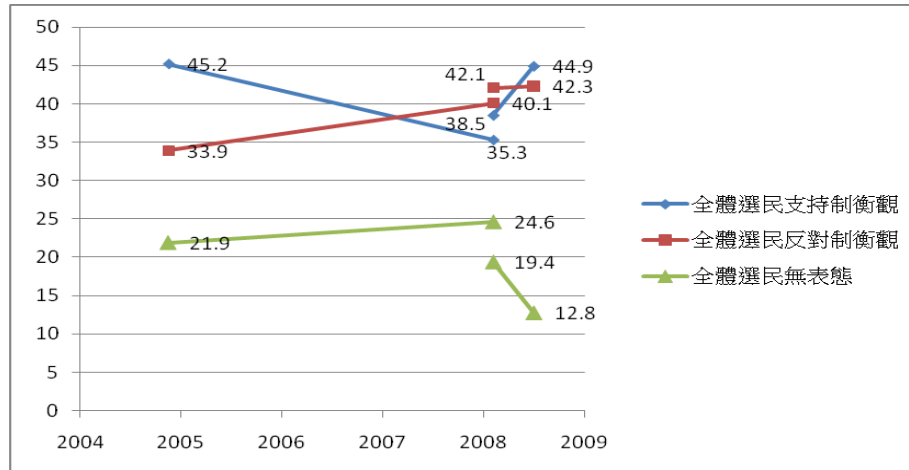


圖 5-2 整體民眾制衡觀變化圖

資料來源：TEDS2008L、TEDS2008P

然而，圖 5-2 僅是橫斷面的總體資料，無法觀察到各類別中民眾態度改變的情形，本資料為定群資料，可以進一步以列聯表觀察中間的變化。表 5-2 為列聯表分析，可以發現我國民眾對於制衡觀的態度，在 2004 至 2008 年、以及 2008 年總統選舉前後，皆有十分顯著地變化。在 2004 年支持制衡的群眾，有超過一半在 2008 年轉至反對制衡或其他意見；而在 2004 年反對制衡的群眾，也有超過一半在 2008 年立委選舉後改變意向。2008 年總統選舉前、後的資料來看，也可以發現在一月仍支持制衡的群眾，有 88 位轉而反對制衡，佔全體選民的 11.7%，佔了在一月支持制衡選民比例的 35.3%；在一月反對制衡者，同樣有 96 位轉而支持制衡，佔一月反對制衡選民比例的 32.4%。兩段時期資料民眾前後回答結果的卡方值顯著，意謂著民眾的前測與後測回答間是有相關性的，並非隨機作答；但有趣的是，兩段時期民眾回答的 kappa 值分別為 0.194 與 0.245，這在 Landis 與 Koch (1977) 提出的標準中是信度不合格的，也就是民眾在兩段時期間，前後的回答皆是顯著地不一致。因此由定群資料與列聯表分析的結果，就可以推翻議題投票中選民大多為強態度的基本假設--我國民眾在政黨制衡這一議題上，即使總體資料看起來變化不大，但由定群資料即可發現民眾的態度在四年的三段選舉間是有非常大的改變。但另一方面，這樣的改變也並非來自於民眾隨意作答，因為卡方檢定顯示了民眾

前後回答具相關性，而信度檢定則說明了前後作答顯著不同。這樣的的不同是否來自於民眾的政黨認同導致？

表 5-2 整體民眾制衡觀變化列聯表分析

2008.01-03 2004.06-10	支持制衡	反對制衡	其他	2008.06-08 2008.01-03	支持制衡	反對制衡	其他
支持制衡	136 (19.3%)	126 (17.9%)	56 (8.0%)	支持制衡	145 (19.2%)	88 (11.7%)	16 (2.1%)
反對制衡	71 (10.1%)	121 (17.2%)	51 (7.3%)	反對制衡	96 (12.7%)	179 (23.7%)	21 (2.8%)
其他	36 (5.1%)	31 (4.4%)	75 (10.7%)	其他	98 (13.0%)	52 (6.9%)	60 (7.9%)
1.n=703 2.Chi-squared=79.86, p<0.001 3.kappa=0.194, p<0.001				1.n=755 2.Chi-squared=117.56, p<0.001 3.kappa=0.245, p<0.001			

資料來源：TEDS2008L、TEDS2008P

圖 5-3 是政黨認同為泛藍的民眾，在這兩波調查中對於制衡觀態度的變化。圖中可以發現的是，泛藍民眾整體對於制衡觀態度的變化，很高比例與國民黨在這段時間的宣傳是一致的：在 2004 年立委選舉時，代表泛綠的陳水扁總統順利連任，因此泛藍呼籲制衡觀，認為行政、立法兩權要由不同政黨擁有，以「保護民主」。由本研究的資料來看，此時泛藍認同者，有 77.5% 的民眾響應了泛藍陣營的主張。然而到了 2008 年，當泛藍在立法院獲得大勝、國民黨取得國會最大黨時，泛藍開始追求一致政府、攻擊謝長廷候選人的「制衡型總統」主張，此時泛藍民眾對於政黨制衡的態度也跟著改變，有 57.7% 的泛藍選民在選後轉而反對制衡觀，仍支持制衡觀者剩 34%。

表 5-3 為泛藍認同的民眾在兩段時期制衡觀的變化。在 2004 年，原有近八成泛藍民眾支持制衡觀，卻在 2008 年立委選舉結束後，有 89 位泛藍選民轉而反對制衡，佔全部泛藍選民的 37.1%，更原泛藍支持制衡觀者的 48.4%，同時支持制衡觀者有 10.4% 轉為其他意見，堅持制衡者僅剩 29.2%；在 2008 年總統選舉後，在

選前支持制衡的 118 位泛藍民眾有 51 位轉而反對制衡、8 位轉為其他，只剩下 20.3% 的泛藍原支持制衡觀的民眾仍堅持其意見。另一方面，可以發現在 2008 年總統選舉前後，泛藍民眾堅持反對制衡的選民百分比為 34.7%，是各類民眾間最多的，但假如比較 2004 至 2008 年，僅有 7.9% 的泛藍支持者是堅持制衡觀，可見 2008 年總統選舉前後泛藍民眾之所以反對制衡觀，也並非強態度的真的反對制衡，而是隨泛藍陣營態度改變而跟著改變，反映了情境制衡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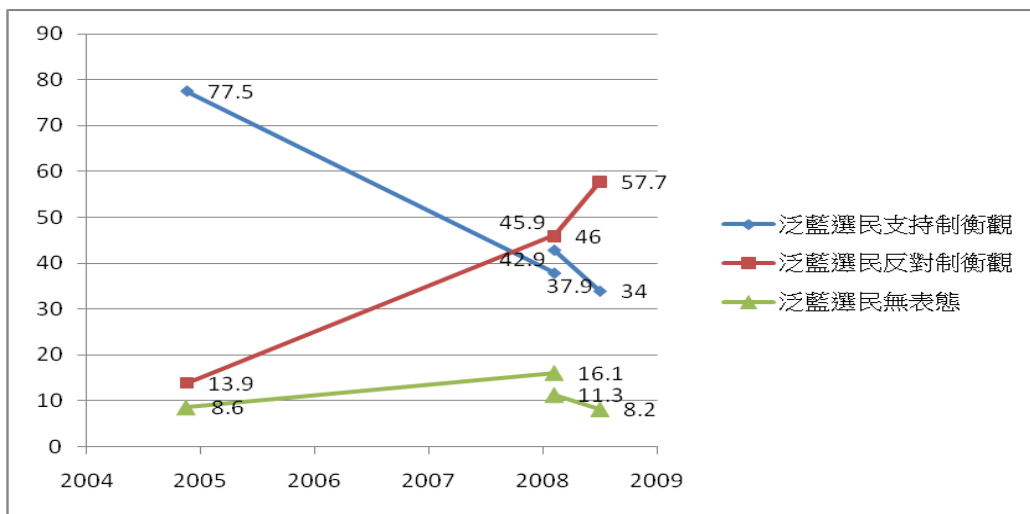


圖 5-3 臺灣泛藍民眾制衡觀變化圖

資料來源：TEDS2008L、TEDS2008P

表 5-3 泛藍民眾制衡觀變化列聯表分析

2008.01-03 2004.06-10	2008.01-03			2008.06-08 2008.01-03	2008.06-08		
	支持制衡	反對制衡	其他		支持制衡	反對制衡	其他
支持制衡	70 (29.2%)	89 (37.1%)	25 (10.4%)	支持制衡	59 (20.3%)	51 (17.5%)	8 (2.7%)
反對制衡	9 (3.8%)	19 (7.9%)	7 (2.9%)	反對制衡	20 (6.9%)	101 (34.7%)	3 (1.0%)
其他	8 (3.3%)	8 (3.3%)	5 (2.1%)	其他	20 (6.9%)	16 (5.5%)	13 (4.5%)
1.n=240 2.Chi-squared=3.803, p=0.433 3.kappa=0.047, p=0.203				1.n=291 2.Chi-squared=68.19, p<0.001 3.kappa=0.327, p<0.001			

資料來源：TEDS2008L、TEDS2008P

圖 5-4 是政黨認同為泛綠的民眾，在這兩波調查中對於制衡觀態度的變化。同樣可以發現的是，泛綠民眾整體對於制衡觀態度的分布與變化，跟民進黨在這段時間的宣傳是一致的：在 2004 年立委選舉時，由於代表泛綠的陳水扁總統順利連任，因此泛綠反對制衡觀，認為行政、立法兩權要同樣為泛綠把握，以「讓政府好做事」。由本研究的資料來看，此時泛綠認同者，有 64.7% 響應了泛綠陣營的主張，支持制衡觀者僅不到四分之一。然而到了 2008 年，當泛藍在立法院獲得大勝、國民黨取得國會最大黨時，綠營總統候選人謝長廷主張支持制衡觀，在總統選舉後更強力攻擊一黨獨大，此時泛綠民眾對於政黨制衡的態度也跟著改變，有高達 59% 的泛綠選民在選後轉而支持制衡觀，反對制衡觀者驟降到 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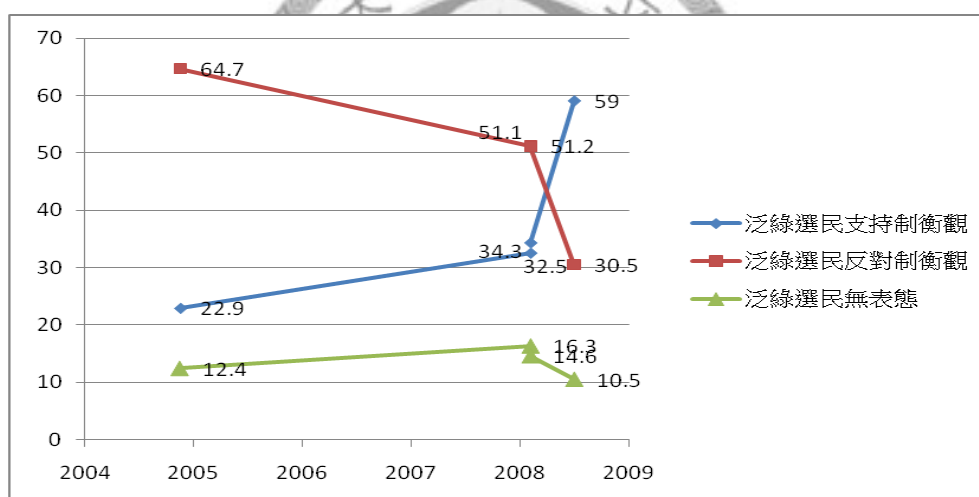


圖 5-4 臺灣泛綠民眾制衡觀變化圖

資料來源：TEDS2008L、TEDS2008P

表 5-4 為泛綠認同的民眾在兩段時期制衡觀的變化。在 2004 年，原有超過六成泛綠民眾反對制衡觀，卻在 2008 年立委選舉結束後，有 18.7% 的泛綠民眾由反對轉而支持制衡觀、一成由反對轉為其他意見，仍反對制衡者僅剩 35.7%；在 2008 年總統選舉後，在泛綠民眾中，也有 23.5% 由反對轉而支持制衡，只剩下 21.5% 的泛綠民眾仍反對制衡觀。另一方面，可以發現在 2008 年總統選舉前後，泛綠民眾保持支持制衡的選民百分比為 22.5%，但假如觀察 2004 年 6 月至 2008 年 1 月，此

段時間內堅持制衡觀的泛綠選民也僅有 11.3%，在 2008 年後有 23.5%的泛綠選民是在半年內由反對制衡轉而支持制衡；可見 2008 年總統選舉前後泛綠民眾的堅持制衡觀，也並非強態度的支持政黨制衡，而是隨泛綠陣營態度改變而跟著改變，反映了情境制衡。

表 5-4 泛綠民眾制衡觀變化列聯表分析

2008.01-03 2004.06-10	支持制衡	反對制衡	其他	2008.06-08 2008.01-03	支持制衡	反對制衡	其他
支持制衡	26 (11.3%)	18 (7.8%)	6 (2.6%)	支持制衡	45 (22.5%)	12 (6.0%)	2 (1.0%)
反對制衡	43 (18.7%)	82 (35.7%)	29 (12.6%)	反對制衡	47 (23.5%)	43 (21.5%)	10 (5.0%)
其他	10 (4.3%)	7 (3.0%)	9 (3.9%)	其他	26 (13.0%)	6 (3.0%)	9 (4.5%)
1.n=230 2.Chi-squared=15.94, p<0.01 3.kappa=0.170, p<0.001				1.n=200 2.Chi-squared=24.26, p<0.001 3.kappa=0.210, p<0.001			

資料來源：TEDS2008L、TEDS2008P

圖 5-5 為未歸類於泛藍或泛綠的民眾，對於制衡觀的分布與變化。因為缺乏特定的政黨偏好，所以整體來說這些獨立選民對於制衡觀的分布整體來看並未有很大的變化，支持制衡觀的獨立選民比不支持制衡觀的獨立選民還要多一成，這可能代表著沒有特定政黨偏好的民眾，對於有制衡的政府組成會比較放心。另外，在 2008 年總統選舉過後，獨立選民中對制衡觀未表態的比例有明顯下降，從四成降到兩成，而支持制衡觀與反對制衡觀的獨立選民比例皆有所上升，這可能是因為在選舉過程中使選民政治知識增加，對於這一題有更多的想法與表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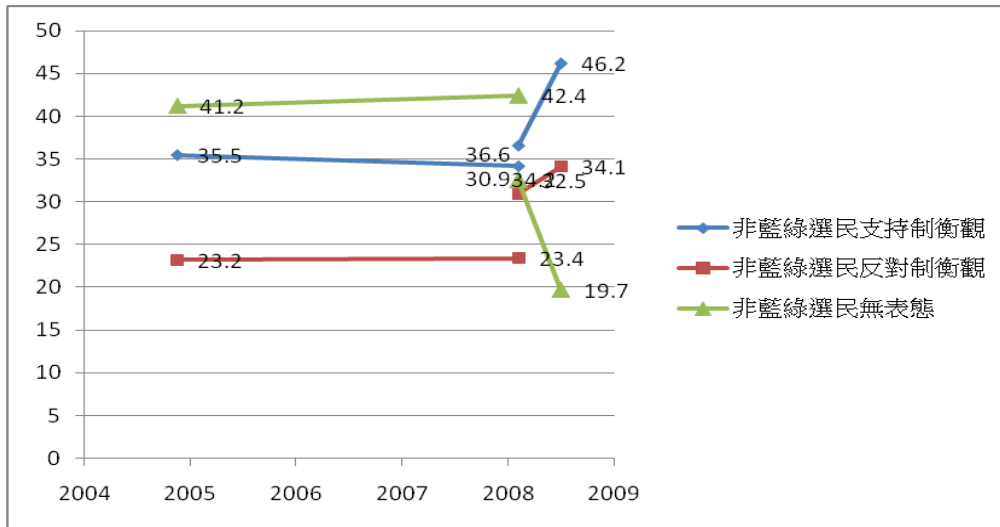


圖 5-5 臺灣非藍綠民眾制衡觀變化圖

資料來源：TEDS2008L、TEDS2008P

表 5-5 為不具政黨認同的民眾，在兩段時期制衡觀的變化。可以發現的是，在兩段時間點的測量中，不具政黨認同的民眾皆有較高比例是支持制衡觀，而在選舉過後改變最大的就是原本不表態的獨立選民轉而支持或反對制衡。

表 5-5 非藍綠民眾制衡觀變化列聯表分析

2004.06-10	2008.01-03			2008.01-03	2008.06-08		
	支持制衡	反對制衡	其他		支持制衡	反對制衡	其他
支持制衡	40 (17.2%)	19 (8.2%)	25 (10.7%)	支持制衡	41 (15.5)	25 (9.5%)	6 (2.3%)
反對制衡	19 (8.2%)	20 (8.6%)	15 (6.4%)	反對制衡	29 (11.0%)	35 (13.3%)	8 (3.0%)
其他	18 (7.7%)	16 (6.9%)	61 (26.2%)	其他	52 (19.7%)	30 (11.4%)	38 (14.4%)
1.n=233 2.Chi-squared=33.325, p<0.001 3.kappa=0.260, p<0.001				1.n=264 2.Chi-squared=26.07, p<0.001 3.kappa=0.178, p<0.001			

資料來源：TEDS2008L、TEDS2008P

對於整體選民、泛藍、泛綠、與非藍綠認同之選民的總體資料分析，吾人可以發現：從整體來看，我國民眾的制衡觀分布並未有很大的改變，但也沒有因為

經歷了八年的分立政府時期而更支持或更反對制衡。然而，透過列聯表分析與區分政黨來分析，可以發現具政黨認同的選民，對於制衡觀的態度是會隨著支持的政黨而改變立場的，在 2008 年總統選舉後，民眾較 2004 年改變立場的情況更為顯著，反映的就是我國民眾的情境制衡觀。相較之下，不具政黨認同的獨立選民，制衡觀變化的趨勢較不明顯。

第二節、政黨認同強度與制衡觀

假如政黨認同確實會影響民眾對於制衡觀的判斷，那麼當民眾政黨認同越強，理論上應該越可能隨著支持的政黨來改變立場。在這種情況下，整體來說，民眾回答支持制衡並非真的喜歡制衡，而是政黨認同導致的自我合理化，反映情境制衡觀。本研究參考蕭怡靖（2009）的九分類的單一面向「藍綠政黨喜好差異指標」區分出受訪者的政黨認同強度高低，並觀察在 2004 至 2008 年這段時間，不同政黨認同強度的選民的制衡觀分布與轉變是否有所不同，並檢驗政黨認同強度與制衡觀間是否具有遞移性。之後，本部分將驗證本研究第四個假設，也就是弱態度政黨制衡的選民在政黨認同強度上，是否較強態度政黨制衡者與其他類皆更高。表 5-6 是 TEDS2008L、TEDS2008P 兩波資料受訪者的政黨認同強度。兩波資料中，都有約 3 成 5 的民眾是中立的，而有約 1 成 5 的民眾是有強烈的政黨認同，兩波資料基本上的分布是類似的。

表 5-6 民眾政黨認同強度分類表

強度	人數	百分比	強度	人數	百分比
4	104	14.8	4	102	13.5
3	185	25.7	3	190	25.2
2	67	9.5	2	51	6.8
1	104	14.8	1	151	20.0
0	243	34.6	0	261	34.6
總和	703	100	總和	755	100

資料來源：TEDS2008L

資料來源：TEDS2008P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採用的分類方式中，1 分的稍微偏向人數比 2 分的有一點偏向來得多，而除了中立外人數最多的是 3 分的普通偏向—同樣的結果也出現在提出本分類方式的文獻中（蕭怡靖，2009）。不同時期的資料顯示了接近的趨勢，意謂著這種調查與資料處理方式具一定效度。

區別出民眾的政黨認同強度之後，假如將民眾的政黨認同強度再依藍綠區分，即形成單一面向「藍綠政黨喜好差異指標」。不同政黨強度的選民，對於制衡觀態度的堅持或改變是否也會不同？假如政黨認同強度會影響民眾對制衡的判斷，形成情境制衡觀的話，那應該會符合遞移性假設。圖 5-6 的四張圖，是觀察不同政黨認同強度的藍綠選民中，在不同時期支持制衡觀的百分比，其中左上為 2004 年立委選舉，右上與左下為 2008 年立委選舉後總統選舉前，右下為 2008 年立委選舉之後。從圖 5-6 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國民眾制衡觀變化是跟政黨認同有顯著相關的—在 2004 年，泛藍認同越強者的選民越支持制衡，泛綠認同越強者越反對制衡；在 2008 兩次大選中間，泛藍與泛綠選民的態度開始調整與轉變；在 2008 總統選舉後，變成越是泛綠認同的選民越支持制衡、越是泛藍認同的選民越反對制衡，追求「完全執政」。從百分比的分布來看，左上角與右下角的兩張圖，在圖形與數字上顯現了具有遞移性。

表 5-7 則是針對不同時期我國民眾政黨認同強度以及支持制衡比例的遞移性檢測。可以發現在 TEDS2008L 的第一波資料、以及 TEDS2008P 的第二波資料，都是通過遞移性檢測的，顯著水準皆小於 0.001，顯示了藍綠認同強度與要求制衡百分比間具有遞移的線性關係，而也可透過殘差百分比不顯著表示這兩者的線性關係具有非常高的解釋力（Everitt, 1992）。更重要的是，2004 年受訪者政黨認同強度對制衡觀支持與否的迴歸係數為顯著的正值，如圖 5-6 左上角斜率為正的斜線，2008 年總統選後卻為顯著的負值，如圖 5-6 右下角斜率為負的斜線，代表遞移性的方向在兩個時期是完全相反的。相對的，在中間的兩筆資料都未過顯著水

準，顯示在 2008 立委選後總統選前的兩次大選中間時期，藍綠政黨認同的民眾對於制衡觀尚在調整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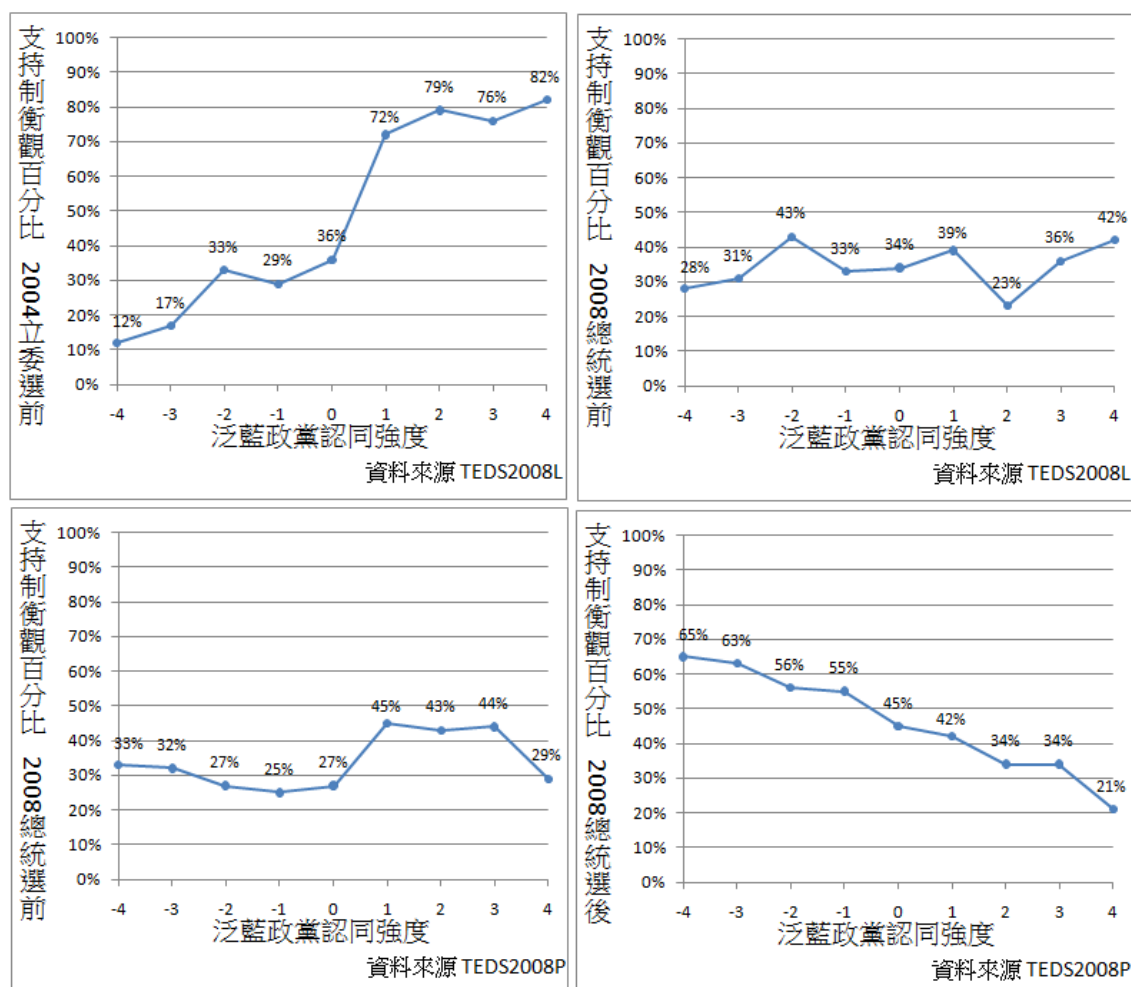


圖 5-6 藍綠認同強度與支持制衡百分比變化圖 2004-2008

資料來源：TEDS2008L、TEDS2008P

表 5-7 政黨認同強度與支持制衡遞移性檢測

資料來源	訪問時間	n	迴歸係數 ¹	迴歸卡方值 ²	殘差卡方值 ³
TEDS2008L	2004.06-10	703	+0.101***	140.390***	21.241
	2008.01-03	703	+0.008	0.953	5.233
TEDS2008P	2008.01-03	755	+0.014	3.148	15.734
	2008.06-08	755	-0.053***	42.163***	1.500

1. * p<0.05 ** p<0.01 ***p<0.001
 2. * p<0.05 ** p<0.01 ***p<0.001
 3. * p<0.05 ** p<0.01 ***p<0.001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兩波資料中，泛藍認同者與泛綠認同者總體而言對於制衡觀變化的時間點是不同的：在圖 5-3、圖 5-4、以及圖 5-6 的上兩張圖中，2004 年立委選舉至 2008 立委選舉後，泛藍選民轉而反對制衡的比例從八成掉到四成，而泛綠選民卻沒有對應的增加；而在 2008 立委選舉後至總統選舉後，泛綠的選民對制衡的支持才從三成升到六成，而泛藍卻維持在三成左右。這樣的結果，本研究認為可能與泛綠的選舉宣傳有關：在 2008 年立委選舉之前的 2004 總統選舉，泛綠的陳水扁總統以過半票數連任、而立委選舉又使泛綠取得國會最大黨，在 2008 立委選舉時，時任總統陳水扁與泛綠總統候選人謝長廷，仍不斷喊著要泛綠「喬過半」，達成一致政府的目標（自由時報，2007 年 4 月 18 日，版 A4²¹；自由時報，2007 年 9 月 14 日，版 A4²²），這個想法直到選後才忽然逆轉成「制衡型總統」，相對的，泛藍則是在 2008 兩次選舉前後，持續主打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目標。這段時間也是兩波問卷訪談選民的時間，可能導致泛綠選民並沒有那麼快隨著政黨轉變態度，而是到總統選舉過後的調查才完全展現出來。

因此，由圖 5-6 的結果、以及上一節的分析可以得知，我國民眾回答的制衡觀的確會受到政黨認同的影響，並且政黨認同越強者越會隨著支持的政黨改變對於制衡觀的態度，民眾也並未因為共同經歷八年的分立政府，而對制衡觀有共同的改變方向，總體而言是屬於情境制衡觀。

第三節、制衡觀強度及其影響因素：個別分析

透過定群資料的總體分析，可以發現我國民眾制衡觀態度並不穩定，有不少民眾的制衡觀會隨著不同時期的政治時空，配合認同的政黨或陣營改變對於制衡觀的態度。因此，哪些民眾會有所謂不變的、強態度的政黨制衡觀？本研究提出的假設中，包括了教育程度、年齡、性別、政治知識、政黨認同強度、統獨立場位置、雙重族群認同等七種可能的來源。

²¹ 邱燕玲、王貝林，2007，〈謝：國會喬過半組聯合政府〉，《自由時報》，4 月 18 日，版 A4。

²² 邱燕玲，2007，〈扁：立委拿 50 席，謝喬過半〉，《自由時報》，9 月 14 日，版 A4。

表 5-8 為兩筆定群資料中的受訪者，在本研究定義的政黨制衡觀、情境制衡觀、其他類的人數分配，以及不同制衡觀強度的選民，在本研究提出的各種解釋變數下的平均數與差異檢定。首先，就我國選民的制衡觀態度類型，在兩段時間都選擇制衡的選民約佔 20%，而在兩段時間內隨著支持政黨改的情境制衡觀選民約佔 30%，其他情形的選民約佔了 50%左右。因此，我國擁有強態度的政黨制衡觀的選民並不多，更多的選民在回答上是呼應政黨立場的情境制衡觀、或是與原問卷欲詢問的「制衡」並不相符的回答。

表 5-8 制衡觀類型及其影響因素：個別變數分析

資料來源	TEDS2008L (2004.06-2008.01, n=703)				TEDS2008P (2008.01-2008.06, n=755)			
	政黨 制衡觀者	情境 制衡觀者	其他	Sig. ¹	政黨 制衡觀者	情境 制衡觀者	其他	Sig. ¹
人數 (%)	136 (19.3%)	238 (33.9%)	329 (46.8%)		145 (19.2%)	207 (27.4%)	403 (53.4%)	
政治知識 (0-1)	0.60	0.63	0.50	** ²	0.58	0.56	0.45	*** ²
教育程度 (1-5)	3.25 ³	3.04	2.55	***	3.37 ³	2.79	3.10	**
年齡 (20-90)	44.84 ⁴	49.07	51.68	***	40.66 ⁴	48.28	47.93	***
性別 (女性=1)	0.50	0.37	0.49	*	0.56	0.49	0.49	
統獨趨中 FB (0 或 1)	0.35	0.26	0.25	*	0.31	0.25	0.27	
統獨趨中 CL (-5-+5)	0.18	0.77	0.29	*	0.67	0.87	0.36	*
雙重認同 (0 或 1)	0.57	0.53	0.36	***	0.43	0.36	0.47	*
政黨認同強度 (0-4)	1.86	2.18 ⁵	1.33	***	1.78	2.23 ⁵	1.48	***
	1. 使用 ANOVA 檢定 2. * p<0.05 ** p<0.01 ***p<0.001 3.經 Scheffe 計算顯著水準皆<0.001 4.經 Scheffe 計算顯著水準皆<0.05 5.經 Scheffe 計算顯著水準皆<0.1				1. 使用 ANOVA 檢定 2. * p<0.05 ** p<0.01 ***p<0.001 3.經 Scheffe 計算顯著水準皆<0.1 4.經 Scheffe 計算顯著水準皆<0.001 5 經 Scheffe 計算顯著水準皆<0.1			

那麼，具有政黨制衡觀的選民、情境制衡觀的選民、與其他本研究理論無法

歸類的選民間是否有所不同？本研究提出的前三個假設，是民眾自發性或透過經驗擁有強態度的制衡觀，透過政治知識、教育程度、以及年齡等來做為觀察並成為假設。就政治知識的部分，政黨制衡觀的民眾，與情境制衡觀的民眾在兩兩相較下並無顯著差異，而三組比較下與其他類的民眾相比明顯為高，答題率差異約為 1 成左右。這樣的結果與本研究第一個假設並不相符，也就是政黨制衡觀者的政治知識並沒有比較高，甚至與情境制衡觀者不分軒輊。會有這樣的結果，本研究認為與政治知識的測量方式有關係：在 TEDS 兩波政治知識的問題中，問的大多是政治現況，包括行政院長、美國總統、中共國家主席等，大多是現況的運作，而非對抽象制度的瞭解，因此測到的並不一定全是政治知識，而同時可能是民眾的政治興趣；換句話說，民眾就算得以掌握 TEDS 題組中的政治知識，也不一定有能力瞭解政黨制衡、機關制衡等抽象價值觀，導致本研究使用此題組來研究可能缺乏效度，這也可能是分布呈現政黨、情境情境都大於其他類的主要原因。

相較之下，政黨制衡觀者的平均教育程度較另兩者為高，且無論是三組比較、或是事後兩兩相較皆具顯著水準，不拒絕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假設，且與盛治仁（2003）的研究結果一致。與政治知識相較，教育程度到 4 或 5，代表著高中職與大學教育，也是更為長期的公民教育，尤其是高中職、大專對於憲法、憲政體制、公民等課程，可能讓接受較高教育的民眾比較有機會接觸到分權制衡的概念，進而擁有強態度的政黨制衡觀。

除了教育程度之外，政黨制衡觀的選民，平均年齡也較顯著的較情境制衡觀者以及其他來得更低，具顯著水準，不拒絕本研究第三個研究假設。在兩波資料中，強態度制衡觀者的平均年齡較另兩類選民年輕 5 歲以上，約在 40 歲左右，而弱態度制衡觀、其他的選民平均落在 40 至 50 歲。以 2004 至 2008 的選舉來看，代表政黨制衡觀選民大約在國中、高中、大學的受教育階段正好碰到解嚴與民主化，而情境制衡觀者與其他的選民則是在出社會工作後開始碰到我國威權轉型。年齡較低的選民，比較沒有經過威權統制時期的教育與社會氛圍，而體會過我國

解嚴後快速的民主化時期，此時報禁、黨禁解除，民眾接觸到分權制衡相關討論與教育機會大增，因此可能較威權時政府運作提倡效率來說，更珍惜民主自由時各黨互相制衡、避免濫權的民主價值。這樣的結果是與政黨制衡觀選民教育程度較高是相互呼應的，但兩者可能具共變導致虛假相關，因為我國民眾教育程度平均而言亦是越新一代教育程度越高，因此需透過迴歸模型進一步控制分析。

在性別上，與盛治仁（2003）的研究相異的是，政黨制衡觀的選民中，女性的比例較其他制衡觀態度的選民來得更高，在第一筆資料中通過顯著水準。為何女性比較可能會有制衡觀？Mueller（1988）指出相較男性參政是基於年齡與社經條件，女性更常是出於公民義務感；而 Chodorow（1978）則指出在性別社會化的過程中，女性較重視人際連結、合作等。這些可能是產生女性受訪者較支持政黨制衡的原因。

民眾自發產生政黨制衡觀以外的另一種可能性，為工具性的 Fiorina 政策均衡模型，也就是民眾主觀認為兩黨制衡後的政策產出較接近自己的理想點。表 5-7 的第五列，即為各類制衡觀類型的民眾中，受訪者對於兩岸關係的議題位置相較於兩大黨更接近兩大黨平均值的人物比例：政黨制衡觀的受訪者中，佔三成多的比例，而情境制衡觀者與無態度的選民中約佔兩成五。相較之下，政黨制衡觀的民眾較有議題趨中的傾向，較另外兩類約高 5%，但兩波資料在統計上皆並不顯著，很難證實或否證本研究的第五個研究假設。而第六列則為 Carsey 與 Layman 提出的指標，為民眾理想點距離兩黨平均值的距離減去民眾理想點至任一較近政黨的距離。同樣的，統計結果並不顯著，雖然在 TEDS2008L 的資料中平均而言政黨制衡觀的選民符合預期的差值較低，但平均值仍為正，與理論不合；而 TEDS2008P 中距離差異最小的則為其他類，同樣與假設不合。政黨制衡觀的選民，對於統獨議題趨中情況並不高，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民眾在意、希望制衡的議題並非統獨議題，或是民眾的政黨制衡觀並非工具性而是自發性的。相較之下，情境制衡者與其他類具有一定比例的議題趨中者，同樣可能是因為有其他更重要的

議題重要性蓋過此議題。

本研究第六個假設，是民眾在族群認同的雙重族群認同傾向，對於民眾政黨制衡觀產生的影響。在第一筆資料中，假設六似乎被證實了一六成的政黨制衡觀者具雙重族群認同，並且具顯著水準。然而，在第二筆資料中，這種現象卻又消失了，甚至其他類裡的雙重認同者比例還大於政黨制衡觀者。因此整體來說，尚無法確認雙重族群認同與選民制衡觀類型之間的關係。

最後，在政黨認同強度上，弱態度的情境制衡觀選民，政黨認同強度是最高的，其次是政黨制衡者，最後才是其他類，兩者在兩兩比較或是三者比較都具顯著差異，符合本研究提出的第七個研究假設。情境政黨制衡者，可能是因為政黨認同强度高，這種心理依附使民眾的認知與訪談的回答皆追求與政黨一致，因此當政黨需要制衡時，政黨認同者就回答制衡、當政黨追求一致政府，政黨認同者就反對制衡，使民眾的回答並非原本測量上希望測到的政黨制衡。相較之下，如同本研究建立的制衡觀選民類型，政黨制衡觀的選民同樣具有政黨認同，比其他類還要更高，但不若情境制衡者的政黨認同者高，所以他們除了有支持的政黨，同樣具有抽象思考、追求憲法上權力相互制衡的目標。

因此，哪些選民具有強態度的政黨制衡觀？從第二次政黨輪替過程中的 TEDS 兩波資料來看，平均而言是具有較高教育程度、具政治知識、年齡較輕、具一定政黨認同、可能統獨立場趨中的選民們。相較之下，情境制衡觀的選民則是有最高的政黨認同強度、一定的政治知識。然而，這些變數間的關係可能是虛假的，因此需要透過整體的分析，始能做客觀的比較評估。為了瞭解影響民眾制衡觀強度的可能因素，本研究將此處的變數放入迴歸模型中進行觀察，設立並檢證分析模型。

第四節、制衡觀強度及其影響因素：迴歸模型分析與討論

表 5-9 以及表 5-10 為 TEDS2008L、TEDS2008P 兩份定群資料的總體分析，兩

個表的差異，在於政策中和理論所使用的變數計算方式差異，也就是區分了統獨趨中 FB 以及統獨趨中 CL，其餘變數均相同，但估計結果就事後來看並無太大差異，也未影響其他變數的估計。格內的數字，第一個是代表迴歸模型的偏迴歸係數，下方括號內的是標準誤，而在隔壁欄的%change，則代表是當自變數增加 1 單位時，依變數由「其他」類改至另兩類的機率改變多少。使用的功能為 STATA10.0 中的 prchange，再透過筆者自行計算而成。

表 5-9 制衡觀類型及其影響因素：MNL 迴歸模型分析(統獨趨中 FB)

資料來源	TEDS2008L (2004.06-2008.01, n=703)				TEDS2008P (2008.01-2008.06, n=755)			
	政黨制衡觀 其他		情境制衡觀 其他		政黨制衡觀 其他		情境制衡觀 其他	
分類	Coeff. (S.E.)	%change ¹	Coeff. (S.E.)	%change	Coeff. (S.E.)	%change	Coeff. (S.E.)	%change
政治知識 (0-1)	1.102 ⁺ (0.610)	+41.6%	1.783*** (0.510)	+68.1%	0.267 (0.445)	+9.3%	0.272 (0.404)	+10.6%
教育程度 (1-5)	0.073 (0.109)	+2.0%	0.027 (0.091)	+1.2%	-0.142 (0.090)	-5.8%	-0.240** (0.081)	-8.9%
年齡 (20-90)	-0.017+ (0.010)	-0.4%	-0.000 (0.008)	-0.02%	-0.039*** (0.009)	-1.4%	-0.015* (0.007)	-0.73%
性別 (女性=1)	0.471* (0.230)	+11.7%	0.017 (0.198)	+1.9%	0.244 (0.208)	+5.5%	-0.072 (0.187)	-1.2%
統獨趨中 FB (0 或 1)	0.278 (0.238)	+6.7%	-0.036 (0.212)	-0.5%	0.051 (0.220)	+1.5%	0.019 (0.208)	+0.9%
雙重認同 (0 或 1)	0.663*** (0.219)	+20.9%	0.513** (0.187)	+21.0%	-0.258 (0.203)	-10.4%	-0.412* (0.187)	-15.2%
政黨認同強 度(0-4)	0.238*** (0.073)	+9.0%	0.332*** (0.061)	+13.3%	0.171** (0.073)	+8.1%	0.382*** (0.065)	+13.8%
常數	-1.88*** (0.727)	-	-2.238*** (0.621)	-	0.725 (0.604)	-	0.134 (0.541)	-
Wald chi ² Prob>chi ² log likelihood pseudo R ²	108.18 0.000 -676.901 0.074				82.51 0.000 -718.848 0.054			
Hausman Test	Omitted	Chi2 ³	df	P>Chi2	Omitted	Chi2	df	P>Chi2
	強態度	-8.439	8	-	強態度	-0.102	8	-
	弱態度	-1.025	8	-	弱態度	0.243	8	1.000
S-H Test	其他	0.796	8	0.999	其他	-3.028	8	-
	強態度	5.730	8	0.677	強態度	6.748	8	0.564
	弱態度	3.138	8	0.925	弱態度	6.783	8	0.560
說明	其他	2.507	8	0.961	其他	5.825	8	0.667
	<p>1. %change 為當自變數變動 1 單位時，在其他變數以平均數代入的情形下，依變數類別相對增加的機率值(Huang and Shields, 2000)，本研究使用 STATA10.0 中的 prchange 指令計算。 2.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3. Hausman 與 McFadden(1984)指出，在此檢測中出現負值是常見的，代表不拒絕 IIA 假設。</p>							

表 5-10 制衡觀類型及其影響因素：MNL 迴歸模型分析(統獨趨中 CL)

資料來源	TEDS2008L (2004.06-2008.01, n=703)				TEDS2008P (2008.01-2008.06, n=755)			
分類	政黨制衡觀		情境制衡觀		政黨制衡觀		情境制衡觀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Coeff. (S.E.)	%change ¹	Coeff. (S.E.)	%change	Coeff. (S.E.)	%change	Coeff. (S.E.)	%change
政治知識 (0-1)	1.103+ ² (0.609)	+42.1%	1.77*** (0.511)	+66.5%	0.264 (0.445)	+9.2%	0.270 (0.403)	+10.4%
教育程度 (1-5)	0.083 (0.108)	+2.3%	0.031 (0.091)	+1.4%	-0.136 (0.090)	-5.7%	-0.236** (0.081)	-8.8%
年齡 (20-90)	-0.018* (0.09)	-0.4%	-0.000 (0.008)	-0.04%	-0.041*** (0.009)	-1.2%	-0.016* (0.007)	-0.8%
性別 (女性=1)	0.458* (0.229)	+11.5%	0.016 (0.198)	+1.8%	0.259 (0.209)	+7.0%	-0.047 (0.037)	-0.5%
統獨趨中 CL (-5+5)	-0.028 (0.043)	-0.3%	0.041 (0.037)	+1.5%	0.080+ (0.043)	+2.5%	0.047 (0.038)	+2.0%
雙重認同 (0 或 1)	0.662*** (0.219)	+20.9%	0.523** (0.187)	+21.4%	-0.245 (0.204)	-10.0%	-0.406* (0.188)	-14.9%
政黨認同強度 (0-4)	0.239*** (0.074)	+8.8%	0.319*** (0.062)	+12.8%	0.150* (0.073)	+7.3%	0.369*** (0.065)	+13.8%
常數	-1.780*** (0.718)	-	-2.238*** (0.616)	-	0.756 (0.601)	-	0.149 (0.540)	-
Wald chi ² Prob>chi ² log likelihood pseudo R ²	108.95 0.000 -676.514 0.075				86.35 0.000 -716.924 0.057			
Hausman Test	Omitted	Chi2 ³	df	P>Chi2	Omitted	Chi2	df	P>Chi2
	強態度	-3.424	8	-	強態度	0.273	8	1.000
	弱態度 其他	-1.087 -0.053	8 8	- -	弱態度 其他	-0.070 -2.768	8 8	- -
S-H Test	強態度	5.054	8	0.752	強態度	7.671	8	0.466
	弱態度	11.672	8	0.166	弱態度	1.026	8	0.998
	其他	4.220	8	0.837	其他	4.523	8	0.807
說明	1. %change 為當自變數變動 1 單位時，在其他變數以平均數代入的情形下，依變數類別相對增加的機率值(Huang and Shields, 2000)，本研究使用 STATA10.0 中的 prchange 指令計算。 2.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3. Hausman 與 McFadden(1984)指出，在此檢測中出現負值是常見的，代表不拒絕 IIA 假設。							

首先，在兩種模型中，兩波定群資料使用 MNL 迴歸模型時的 Hausman Test 以及 Small-Hsiao Test，兩者都並不顯著，也就是並未拒絕 IIA 假設，適宜使用 MNL 進行分析，也因此本研究並不使用 MNP 來分析。本研究認為，會得到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因為本研究的依變數為民眾對於制衡觀贊成與否兩次的回答，再經事後分類而成，並且不同選項代表民眾對制衡觀的不同看法，因此相較於其他研究對於不同候選人的選擇來說，本研究資料的依變數類別間較不會有相關性的問

題。而本研究使用之模型不拒絕 IIA 假設，意謂著其模型較 Yu 等人（2010）更為適合使用 MNL 分析。

透過表 5-9 以及表 5-10 的分析，我國哪些民眾有政黨制衡觀？第一，平均而言，越年輕的選民，越可能具有政黨制衡觀，證實了本研究第三個研究假設。在四個迴歸模型中，年齡對於政黨制衡觀的機率影響都是顯著為負，意謂年紀越輕的選民，相對而言越可能落在政黨制衡觀的類別。在 TEDS2008L 資料產出的兩個模型中，在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選民每年輕 1 歲，落在政黨制衡的機率就比落在其他類高 0.4%；在 TEDS2008P 的資料中，在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選民每年輕 1 歲，落在政黨制衡觀選民類別的機率就比落在其他類高 1.4%與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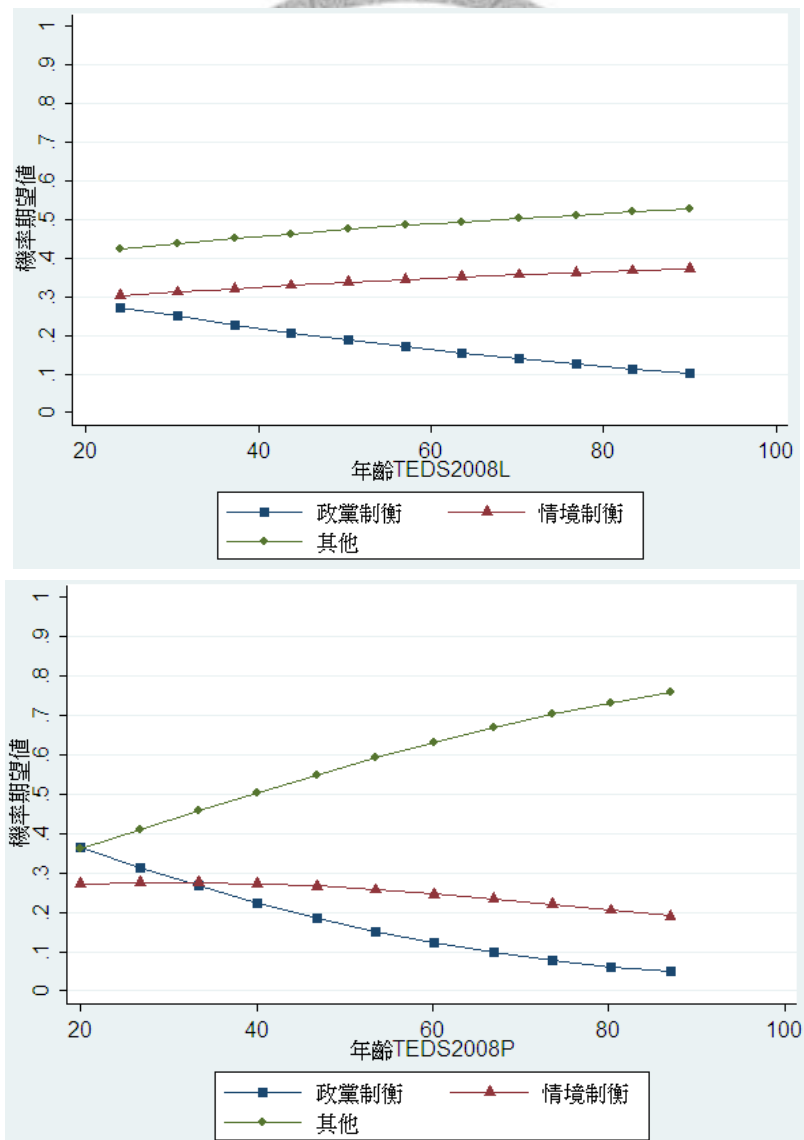


圖 5-7 選民年齡與制衡觀強度機率變化

如果使用 STATA10.0 中的 `prgen` 以及 `twoway` 的功能，則可把 MNL 迴歸模型中將其他自變數以平均數代入，觀察特定自變數改變對於依變數各類別機率的影響 (Long and Freese, 2006)。因為兩個模型在估計上並無太大的差異，圖形僅跑表 5-8 的模型，也就是統獨趨中 CL 的模型，因為其解釋力較高。

圖 5-7 為民眾年齡與制衡觀類型間的關係，可以發現 MNL 預測之後，年齡越輕的選民中，具政黨制衡觀的比例越高。這個結果呼應了徐永明 (2004)、以及游清鑫、蕭怡靖 (2007) 的研究。年輕的世代具有較高、強態度的政黨制衡觀，可能因為我國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教育與接收資訊的量改變、政經環境改變，導致年輕選民更不支持戒嚴時的一黨獨大統治，珍惜分權制衡的概念，產生政黨制衡觀。

第二，就政黨認同強度而言，政黨認同強度由高排至低依序是情境制衡者、政黨制衡者、其他類，證實本研究第七個研究假設，以及呼應本研究建立的制衡觀的類型。在四個迴歸模型中，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政黨認同強度每高 1 級，受訪者落在情境制衡觀選民的機率就比落在其他類的機率高 13% 左右。另一方面，對於政黨制衡觀的選民來說，他們並非是「沒有政黨認同，所以希望各黨互相制衡避免濫權」，平均而言具有一定強度的政黨認同，這可能是因為具政黨認同者往往具有一定的政治興趣，會收集資料、思考有利的政治體制與民主價值。但當政黨認同太高、對於政黨太過熱情，對於制衡的態度較可能是服膺政黨領袖的意見，而在受訪時隨著政黨改變，成為情境制衡觀者。

假如使用 `prgen`，來模擬政黨認同強度對於制衡觀類型的影響，如圖 5-8 中顯示，統獨趨中 CL 模型的兩波定群資料中，當民眾政黨認同強度越大時，民眾落在政黨制衡觀與情境制衡觀的機率皆會上升，落在其他類的機率下降，但很顯然情境制衡觀者的機率上升較快；當政黨認同強度是最高的 4 分時，民眾為情境制衡觀的機率是最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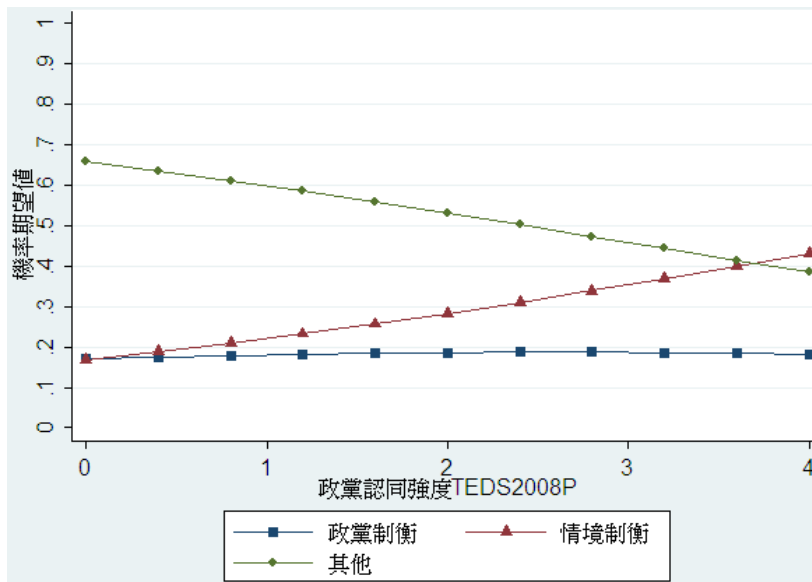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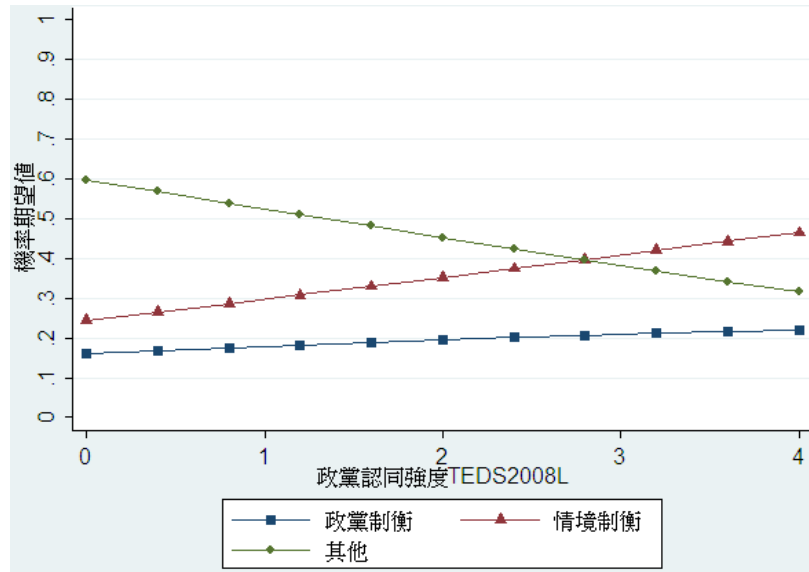


圖 5-8 選民政黨認同強度與制衡觀強度機率變化

民眾在族群認同上具有中國人、臺灣人的雙重族群認同時，是民眾成為政黨制衡觀者的原因嗎？從 TEDS2008L 的結果來看，民眾具有雙重族群認同時，相對來說，在其他變數不變的情形下，成為政黨制衡觀者的機率會提高。換句話說，當民眾具有雙重認同時，在受訪時表示「支持制衡」，越可能是真的支持此一民主價值。然而，在 TEDS2008P 的分析中，民眾具雙重族群認同者更可能成為其他類。會有這樣轉變的原因，本研究認為與我國族群認同的轉變有關。歷年來政大選舉研究調查中心對於我國民眾族群認同的研究顯示（如圖 5-9），我國民眾的臺灣人

單一認同比例不斷上升，甚至在 2009 年突破 50% 並一去不返，而雙重認同、中國人認同皆逐漸下降，儼然逐漸成為臺灣人民的新共識。在這樣的情形下，民眾具有單一臺灣人認同，並不一定會發生 Reilly (2001) 書中的北歐族群衝突、或是 Sartori (1976) 所云對相互原則的反對。因此，就弱態度與強態度制衡觀民眾相比，政黨制衡觀的選民確實具有較高比例的雙重認同者，但整體來說雙重族群認同者在整個資料中比例是不斷下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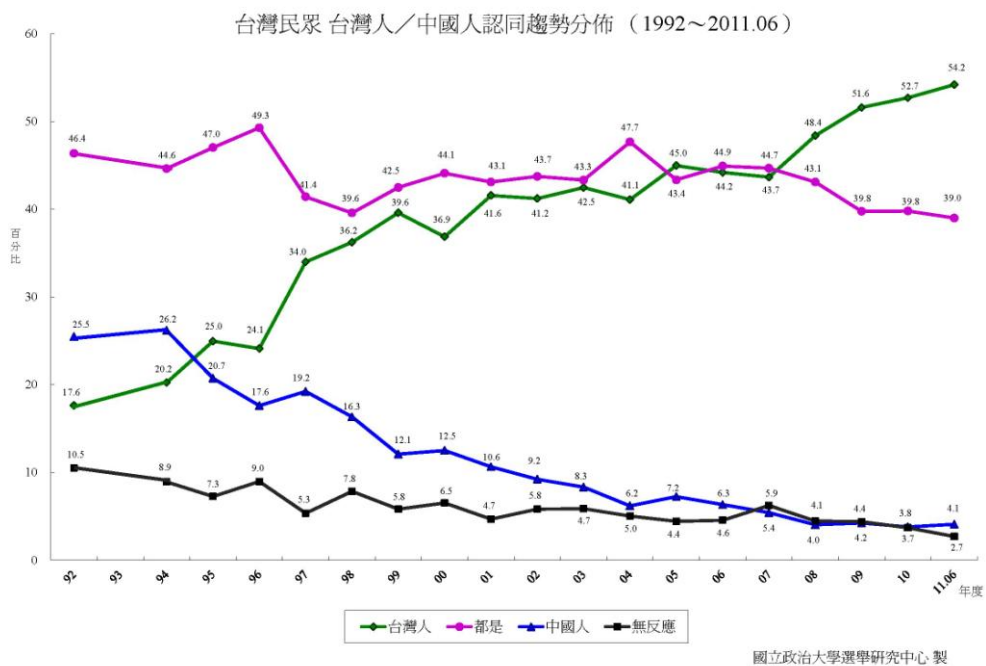


圖 5-9 臺灣人/中國人 族群認同趨勢圖 1992-2011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布趨勢圖(<http://esc.nccu.edu.tw>)

另一方面，民眾統獨立場假如比較趨中而具有政策中和的動機，如同 Fiorina 的政策中和模型，是民眾產生政黨制衡觀的原因嗎？就表 5-9 第一種模型來看，雖然顯示了這樣的趨勢 (0.278 與 0.051，分別有 6.8% 與 1.5% 機率較其他類更可能類成為政黨制衡觀類)，但並未通過顯著水準。而表 5-10 的結果來看，兩個模型得到不一樣方向的估計值，意謂著其結果並不穩定。兩者綜合來看，無法證實、也並未否證本研究第五個假設。為何民眾統獨立場接近兩大黨平均值，並無法成為民

眾具有政黨制衡觀的原因？本研究認為，一個原因可能來自於本研究測量的問題。本研究對於統獨趨中的定義，包括了 Born、Fiorina、以及 Casmev 與 Layman 的計算方式，各自仍有其缺點，最主要的缺點即為假設民眾對於制衡後的計算方式一樣，而這樣的假設可能是有問題的。另一方面，Born 與 Fiorina 建議的編碼方式，也就是表 5-8 中將民眾分類成有誘因制衡與無誘因制衡，優點在於以一個指標就提出了政策均衡理論的動機，但卻可能無法區別出兩大黨極端與否。換言之，當兩大黨距離受訪者統獨立場非常近時，民眾實際上不一定具有政策均衡的強烈要求，卻同樣會被本研究編碼成思考政策均衡理論，這是未來測量方式可以再改進之處。

就政治知識來說，平均而言政黨制衡者與情境制衡者，政治知識皆較其他類來得更高。然而，政黨制衡者的政治知識並沒有比情境制衡者高，因此並不符合本研究第一個研究假設。之所以不符合的原因，本研究在前半部已有說明，這可能與政治知識題組的測量方式有關，因為該題組大多是測量當下的政治實況，而並未測量到抽象的概念或制度，因此掌握這類題組的民眾可能具有較高的政治興趣，卻不一定具有足夠到思考政黨制衡、機關制衡的能力。同時，這樣的結果與盛治仁（2003）以及 Yu 等人（2010）的研究相反。盛治仁指出 1998 與 2001 年民眾的政治知識與支持制衡觀並無顯著關係；而 Yu 等人將民眾的制衡觀區分成穩定制衡、轉而朝向制衡、穩定反制衡、轉而朝向反制衡四種，並企圖用民眾的政治知識解釋，而迴歸模型顯示民眾的政治知識越高，相對來說越傾向穩定反制衡而非穩定制衡。總結來說，本研究的模型顯示，足夠的政治知識對於政黨制衡者來說只是充份條件，而非必要條件。

在兩波資料中，女性皆有較高的機率成為政黨制衡者，並在 TEDS2008L 的資料中達到顯著水準，也與本研究第四個研究假設以及盛治仁的研究（2003）相反。可能的原因，如前文所述，包括 Mueller（1988）指出女性參政出於公民義務感、Chodorow（1978）女性較重視人際連結、合作等，這些可能是產生女性受訪者較

支持制衡的原因。

在控制了其他變數的影響力之後，教育程度對於民眾制衡觀類型的影響似乎就沒有那麼顯著，僅能看出政黨制衡觀的選民平均而言教育程度高於情境制衡觀的選民，但整體來說也並沒有否證本研究第二個研究假設。可能的原因，在於民眾的教育程度與民眾的年齡、政治知識之間具有共變的關係，因為我國新的世代教育程度平均而言較高，而教育程度較高通常也會有較高理解與吸收政治知識的能力與管道。教育程度不顯著的結果，雖然與盛治仁（2003）的研究不同，卻與 Yu 等人（2010）的研究有接近的地方。Yu 等人將民眾的制衡觀區分成穩定制衡、轉而朝向制衡、穩定反制衡、轉而朝向反制衡四種，並企圖用民眾教育程度解釋之。結果民眾教育程度越高，除了穩定制衡的比例越高外，穩定反制衡的比例同樣越高，這在本研究的歸類中就是「其他」類。



第七章、結論

本研究欲探討我國民眾心中的制衡觀與成因。在目標上，本研究一共分成三大部分：第一，探討臺灣民眾的制衡觀在「概念上」所指的是什麼；第二，探討臺灣民眾的制衡觀在「操作上」所指為何；三，探討臺灣民眾的制衡觀在「實際上」所指為何、及其來源為何。

在文獻回顧中，本研究區分出「機關制衡」與「政黨制衡」的差異，並指出麥迪遜主義對於政黨政治的想像不足、且在現行高度政黨政治之下，機關制衡需透過政黨制衡方得以實現，故建議應以政黨制衡為民眾制衡觀討論標的。藉此分類，本研究將現行數種制衡觀調查方式與題目分類成「機關制衡」、「政黨制衡」與「現況制衡」三類，並指出以兩端點封閉的政黨制衡型題目是最適合作為探討臺灣民眾心中制衡觀的題型。接著，本研究提出三大可能的制衡觀來源，包括民眾主觀的經驗與教育（透過年齡、性別、政治知識與教育來間接推論）、Fiorina 的政策均衡模型在我國統獨立場的應用、以及我國國情下民眾特殊的雙重族群認同，建立了六個研究假設。

然而，民眾對於制衡觀的支持，從心理學來看有態度強弱之分，弱態度可能會受到政黨認同的影響而使民眾輕易改變制衡觀，使得民眾的回答與研究員原本欲探討的標的產生差異，故本研究進一步建立「政黨制衡觀」與「情境制衡觀」的兩種不同選民類型，藉由偏好排序說明兩種類型在偏好與行為上的差異，使得橫斷面資料並不可靠，需要透過定群資料、且在兩黨立場交換的情形下方能區分兩者的差異，同時出第七個研究假設。2004 至 2008 三個大選，我國第二次政黨輪替，在本研究建立的中各類型選民偏好排列中，正好會使情境制衡的選民在制衡觀上依政黨認同產生相對應的態度轉變，成為一適合觀察的標的。

本研究以 TEDS2008L 與 TEDS2008P 的定群資料分析，觀察我國民眾制衡觀實際為何、來源為何。首先，透過列聯表、卡方檢定、折線圖，本研究發現我國

民眾的制衡觀在 2004 至 2008 年間，整體來說民眾並未更加支持制衡，而反對制衡者有所上升，並有更多選民在總統選舉過後表達對制衡觀的支持或反對態度。然而，這樣的變化並非隨機的無態度：假如區分民眾的政黨認同，即可發現不同政黨認同的民眾，對於制衡觀的轉變有很大的不同，並且符合政黨領袖的態度改變立場，顯示了情境制衡的跡象。

本研究進一步以蕭怡靖（2009）提出的政黨認同強度來觀察不同政黨認同強度民眾的制衡觀態度轉變，發現政黨認同越強的民眾，越會回應該黨領袖的制衡觀立場轉換，在 2004 年立委選舉與 2008 年總統選舉皆符合遞移性，並且兩個時段斜率相反，代表大多數我國民眾在制衡觀的回答上，是弱態度的情境制衡，顯示了政黨認同影響了民眾對於制衡判斷的假設，這也意謂了傳統使用橫斷面資料研究制衡觀的不足之處。因此，從總體來看，我國民眾對於制衡觀的支持，較多是受政黨認同影響、視政黨狀況決定的情境制衡，而非強態度的政黨制衡，也並未因為在分立政府的八年期間共同經驗，而讓藍綠民眾對制衡的支持與否有共同方向的改變，但同時也並不是完全不瞭解的隨機作答。總體資料的觀察，指出了在憲政討論中認為「權力分立是民眾意志的體現」、「民眾會主動避免一黨獨大」、「無知之幕下做出憲政選擇」等假定，皆在實證資料上有其侷限。

哪些民眾有政黨制衡觀？為何有政黨制衡觀？哪些民眾會有情境制衡觀？本研究透過 ANOVA 分析以及 MNL 迴歸模型，來驗證本研究提出我國民眾制衡觀態度類型的各種解釋因素。首先，由本文建立的類型顯示，在第二次政黨輪替前後，政黨制衡觀者的比例約為 20%、情境制衡觀者的比例約為 30%、其它約為 50%。進一步的研究結果顯示，平均而言，年紀較輕、具有一定的政治知識、教育程度較高、具中國人與臺灣人認同的雙重認同比例較高、女性、具有一定的政黨認同但並不強烈的民眾，較可能具有政黨制衡觀。相較之下，相對來說擁有最強烈的政黨認同、政治知識高的選民，較可能具有情境制衡觀。

其中，政黨制衡觀選民的年齡較輕、教育程度較高、雙重族群認同、不強烈

的政黨認同等變數，可視為預測未來我國強態度的政黨制衡觀分布的指標。隨著我國教育日益普及、十二年國教落實、世代交替、族群認同逐漸取得共識、以及政黨認同強度逐漸消退等現象，加上 2012 年以後，未來我國總統、立委皆合併選舉，使得選舉重要性提升，可以預見的是，未來我國具有政黨制衡觀的選民可能會越來越多，更多的選民珍惜革命、立憲過後憲法所賦予的分權制衡民主價值，並實際透過政黨制衡的方式來落實。舉例來說，2012 年總統大選，執政的國民黨從 81 席大降為 64 席、民進黨從 27 席增加至 40 席、臺灣團結聯盟與親民黨各跨過選舉門檻獲得 3 席，一部分原因即被視為是民眾追求制衡的結果（中國時報，2012 年 1 月 18 日，版 A14²³；自由時報，2012 年 2 月 6 日，版 A4²⁴）。未來我國民眾制衡觀類型分佈會如何演變？民眾的制衡觀如何影響到民眾的投票行為？政黨制衡觀、情境制衡觀的差異，對投票行為是否會有不同的影響？是否造成現有相關研究在估計上的偏誤？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議題。

我國民眾很大一部分並不支持制衡，部分政黨認同強烈的民眾對制衡的看法會隨著支持政黨轉變，僅有少部分是政黨制衡觀，這樣的研究結果呼應了 Diamond（1999）、Reilly（2007）、Lin（2012）等人對於我國選民的研究。這些研究認為我國的政治文化更追求政治穩定、團結、效率，而較不強調權力間的互相制衡。

礙於資料限制，本研究使用的研究資料範圍僅於 2005 年至 2008 年，缺乏第一次政黨輪替的 2000 年，也尚未包含可能有大量分裂投票的 2012 年總統與立委合併選舉²⁵。本研究希望可以透過四年的兩波定群資料分析來預測未來民眾的制衡觀轉變，但民眾在這四年體會到的選戰、分立政府經驗與統獨立場認知，可能僅是我國長期民主發展中的一個特例，以此結果來預測未來可能會產生推論上的錯誤而不自知。同時，因為本研究範圍內的三次選舉，皆是單一的選舉，而無合併選舉發生，因此尚不能分析政黨制衡觀對於分裂投票的影響。2012 年總統、立委

²³ 徐維遠，2012，〈分裂投票 小黨冒出頭了〉，《中國時報》，1 月 18 日，版 A14。

²⁴ 顧忠華，2012，〈新內閣像拼裝車〉，《自由時報》，2 月 6 日，版 A4。

²⁵ 由 2012 年總統、立委合併選舉之總體資料來看，確實出現大量分裂投票的情形，例如未提名總統與區域立委的台灣團結聯盟，在不分區政黨票獲得 118 萬張選票，得票率 8.95%。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www.cec.gov.tw/bin/home.php>，查詢日期：2012 年 5 月 15 日。

合併選舉後，應可使用相關資料進行分析，驗證本文對於不同制衡觀的區分，對於解釋分裂投票是否更具有解釋力。但另一方面，由於 2012 年是合併選舉，因此相較於之前總統、立法院分開選舉來說，分開選舉讓選民更能掌握當下的政治環境，知道怎麼樣投票叫作制衡；而合併選舉之後，選民不知道贏家為何的情況下，制衡在投票解釋上即會更為複雜。另外一個潛在的研究限制，在於本文在推論假設上，是認為情境制衡觀的選民之所以出現，是政治人物有意的操弄、或是民眾因政黨認同而產生的自我合理化。然而，要檢測這因果邏輯的話，理論上需進一步觀察政黨認同者是否確實收到了政治人物提供的訊息，使之改變態度；或是民眾是否真的為了認同的政黨好，而自發性的改變了態度。對於原因更細緻的區分，現有資料也是無法測量的。

最後，對於我國民眾制衡觀的測量上，本研究認為現階段對於我國民眾制衡觀的調查，考量到我國高度政黨政治、機關制衡需透過政黨制衡實現之下，應以政黨制衡的題目為主。然而，本研究使用政黨制衡的題目，「下列兩種說法，你比較同意哪一個？一、總統與立法院的多數立委最好是不同政黨，才能互相制衡。二、總統與立法院的多數立委最好是同一政黨，才能貫徹政策。」，即使這已經是兩端點封閉的題目，降低了題意不清或民眾心中可能的條件式作答（盛治仁，2005），亦發現民眾的政黨制衡會受到民眾政黨認同強度的影響干擾。因此，在題目上是否有更好的修正方式？

本研究認為，假如需要測量之標的，是民眾心中的政黨制衡觀，則政黨制衡觀與情境制衡觀最大的差異，就在於情境制衡觀的選民，會隨著支持政黨的興替，接受政黨領袖的呼籲而改變對於制衡觀的支持。因此，假如要避免這樣的情況，可以參考 TEDS 題組中其他對於民主價值的題目及選項。在 TEDS 的其他題目與選項中，常出現提示來消去現實條件，讓民眾抽象思考的敘述句，例如「不管什麼情況，民主政治都是最好的體制」、「不管立法委員選舉結果為何，總統都有決定行政院長的權力」。加上「不管」兩字，即是對現況條件的消去；在本研究分類

的三種制衡觀題目中，這種修詞方式正好是現況制衡型題目的相反。現況制衡型的題目，是給民眾現實政治運作的實況，例如特定候選人當選總統或特定政黨在國會過半，觀察民眾的條件式制衡支持；而本研究原採用的政黨制衡型題目，沒有提供特定條件，「給民眾抽象思考的空間」，但問題也在於民眾不一定會抽象思考，而有時會納入當下政治現況考量，導致了情境制衡的出現。當加上「不管」的用字，則是讓民眾消去對現況思考的空間，增加民眾抽象思考的機會與比例。而這樣的提醒（或可稱之為限制），或許可以更準確的測到民眾心中的政黨制衡。除此之外，加上未來總統、立委合併選舉，在調查上必然是兩次選舉合一。

因此，本研究建議相關制衡觀研究未來在測量上，題目可修正為：「下列兩種說法，你比較同意哪一個？一、不管哪一黨總統候選人當選，總統與立法院的多數立委最好是不同政黨，才能互相制衡。二、不管哪一黨總統候選人當選，總統與立法院的多數立委最好是同一政黨，才能貫徹政策。」對於原題目的制衡或效率的選擇，假如加上消除現實考量的條件，或許更能夠在僅有橫斷面資料的限制下，測到原理論預期研究的政黨制衡觀。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 王鼎銘，2012，〈類別依變項的迴歸模型〉，瞿海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資料分析（三）》，台北：東華書局，85-131。
- 李少軍、杜麗燕、張虹譯，2006，《正義論》，台北：桂冠出版社。譯自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71.
- 林聰吉、王淑華，〈臺灣民眾政治知識的變遷與來源〉，《東吳政治學報》，25(3): 93-129。
- 周陽山，2010，〈「善治」與五權憲法的制度運作：以監察權為軸心的分析〉，《孫學研究》，8: 1-20。
- 吳重禮，2000，〈美國「分立性政府」研究文獻之評析：兼論臺灣地區的政治發展〉，《問題與研究》，39(3): 75-101。
- 吳宜芳，2004，〈國小學童政治態度之研究—以台南市高年級學童為例〉，台南：國立台南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重禮、王宏忠，2003，〈我國選民「分立政府」心理認知與投票穩定度：以 2000 年總統大選與 2001 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選舉研究》，10(1): 81-114。
- 吳重禮，2008，〈政黨偏好、制衡認知與分裂投票—2006 年北高市長暨議員選舉的實證分析〉，《臺灣民主季刊》，5(2): 27-58。
- 胡佛，1998，《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二）：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活》，台北：三民書局。
- 張佑宗，2011，〈選舉結果、政治學習與民主支持—兩次政黨輪替後臺灣公民在民主態度與價值的變遷〉，《臺灣民主季刊》，8(2): 99-137。
- 許增如，1999，〈一九九六年美國大選中的分裂投票行為：兩個議題模式的探討〉，《歐美研究》，29(1): 83-126。
- 許勝懋，2000，〈台北市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一九九八年市長選舉之分析〉，台

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勝懋，2009，〈台北市選民具有制衡觀嗎？一九九八年及二〇〇二年市長選舉之比較研究〉，《選舉評論》，7: 69-96。

徐火炎，1995，〈選民的政治認知與投票行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7(1): 247-288。

徐火炎，2005，〈認知動員、文化動員與臺灣 2004 年總統大選的選民投票行為——選舉動員類型的初步探討〉，《臺灣民主季刊》，2(4): 31-66。

徐永明，2004，〈公投民主與代議民主的關係——以臺灣經驗為例〉，《臺灣民主季刊》，1(2): 1-25。

張卿卿，2010，〈競選廣告與議題／特質所有權認知〉，《傳播與社會學刊》，11(1): 31-70。

陳文政，2001，〈近代政治分權理論及其在憲法上的應用：以洛克、孟德斯鳩、孫中山分權理論為例〉，《三民主義學報》，23: 69-103。

陳光輝，2010，〈民主經驗與民主價值——兩個世代臺灣大學生之比較〉，《臺灣民主季刊》，7(4): 1-45。

陳宏銘、梁元棟，2007，〈半總統制的形成和演化——台灣、法國、波蘭與芬蘭比較研究〉，《臺灣民主季刊》，4(4): 27-69。

陳陸輝、周應龍，2004，〈臺灣民眾統獨立場的持續與變遷〉，《東亞研究》，35(2): 143-186。

陳陸輝、游清鑫，2002，〈民眾眼中的分立政府：政黨的府會互動與首長施政滿意度〉，《理論與政策》，15(3): 61-78。

楊泰順，2008，〈分權制衡——民主的守護或虛幻的理想？〉，《臺灣民主季刊》，5(1): 171-180。

黃秀端，1998，〈我國大學生對政治權力態度之分析〉，《東吳政治學報》，9: 171-202。

黃秀端，2006，〈兩大黨對決局面儼然成形〉，《臺灣民主季刊》，3(4): 181-190。

黃紀、王德育，2009，〈立委選舉對總統選舉的影響：鐘擺效應？西瓜效應？〉，

-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編），《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9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27。
- 盛杏媛、黃士豪，2006，〈臺灣民眾為什麼討厭立法院？〉，《臺灣民主季刊》，3(3): 85-128。
- 盛杏媛，2010，〈臺灣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定群追蹤資料的應用〉，《選舉研究》，17(2): 1-33。
- 盛治仁，2003，〈臺灣民眾民主價值及政治信任感研究—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選舉研究》，10(1): 115-169。
- 盛治仁，2005，〈用調查研究法測量受訪者價值的限制—以臺灣民眾民主價值題目為例〉，《東吳政治學報》，20: 47-81。
- 蕭怡靖，2009，〈「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之政黨認同測量的探討〉，《選舉研究》，16(1): 67-93。
- 游清鑫，2004，〈分裂投票解釋觀點與臺灣選舉之應用：以 2002 年高雄市長與市議員選舉為例〉，《臺灣政治學刊》，8(1): 47-98。
- 游清鑫，蕭怡靖，2007，〈以新選民的政治態度論臺灣民主政治的未來〉，《臺灣民主季刊》，4(3): 191-151。
- 劉嘉薇、耿曙、陳陸輝，2009，〈務實也是一種選擇—臺灣民眾統獨立場的測量及商榷〉，《臺灣民主季刊》，6(4): 141-168。
- 謝復生，2011，〈分歧社會與憲政選擇〉，「歐美憲政制度與變革研討會論文」（11月2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傅恆德，2005，〈政治知識、政治評價與投票選擇：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研究〉，《選舉研究》，12(1): 39-68。
- 蘇子喬，2011，〈憲政體制、國會選制與總統選制的配套組合〉，「歐美憲政制度與變革研討會論文」（11月2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貳、西文部分

- Achen, Christopher H., and Larry M. Bartels. 2011. "It Feels Like We're Thinking: The Rationalizing Voter and Electoral Democracy." Paper presented at Academia Sinica, June 14, Taipei, Taiwan.
- Aldrich, John H. 1995. *Why Parties?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Americ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llport, Gordon W. 1935. "Attitudes." In *A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eds. Carl Murchison. Worcester, Massachusetts: Clark University Press, 798-844.
- Alvarez, R. M., and Matthew M. Soberg-Shousen. 1993. "Policy Moderation or Conflicting Expectation? Testing the Intentional Models of Split-Ticket Voting."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21(4): 410-438.
- Boudreau, Cheryl, and Arthur Lupia. 2011. "Political Knowledge." In *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eds. James N. Druckman, Donald P. Green, James H. Kuklinski, and Arthur Lup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1-186.
- Born, Richard. 1994. "Split-Ticket Voters, Divided Government, and Fiorina Policy-Balancing Model."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19: 95-115.
- Born, Richard. 2000. "Policy Balancing Models and the Split-Ticket Voter: 1972-1996."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28(2): 131-162.
- Brady, David W. 1993.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Divided Government: Toward A New Theory Of America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1): 189-194.
- Campbell, A., P. E. Converse, W. E. Miller, and 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 Cantril, Hadley. 1934. "Attitudes in the Making." *Understanding the Child* 4: 13-15.

- Carsey, Thomas M., and Geoffrey C. Layman. 2004. "Policy Balancing and Preferences for Party Control of Governmen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7(4): 541-550.
- Cassel, Carol A. 1984. "Issue in Measurement: The Levels of Conceptualization Index of Ideological Sophist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2): 418-429.
- Chodorow, Nancy.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hen, J. 1960. "A Coefficient of Agreement For Nominal Scales." *Educational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20: 37-46.
- Converse, P. E. 1964.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 In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eds. D. E. Apter. New York: Free Press, 206-261.
- Converse, P. E. 1970. "Attitudes and Non-Attitudes: Continuation of a Dialogue." I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Problems*, eds. E. R. Tuft.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168-189.
- Dahl, R. A. 1956.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amond, Larry.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ow, Jay K., and James W. Endersby. 2004. "Multinomial Probit and Multinomial Logit: a Comparison of Choice Models for Voting Research." *Electoral Studies* 23: 107-122.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Eagly, Alice H., and Chaiken Shelly. 1993. *The Psychology of Attitudes*. Texas: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Everitt, Brian S. 1992. *The Analysis Of Contingency Table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 Feigert, Frank B. 1979. "Illusions of Ticket-Splitting."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7(4): 470-488.
- Fiorina, Morris P. 1990. *Divided Government*. Boston: Allyn & Bacon 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 Fiorina, Morris P. 1994. "Response to Born."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19, 1: 117-125.
- Freese, Jemery, and J. Scott Long. 2006. "Test for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http://www.indiana.edu/~jslsoc/spost.htm>.
- Garand, James C., and Marci Glascock Lichtl. 2000. "Explaining Divided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esting and Intentional Model of Split Ticket Voting."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1): 173-191.
- Geer, John G., Amy Carter, James McHenry, Ryan Teten, and Jennifer Hoef. 2004. "Experimenting With the Balancing Hypothesis." *Political Psychology* 25(1): 49-63.
- Gerber, A., and D. Green. 1999. "Misperceptions about Perceptual Bia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190-210.
- Hausman, J. A., and D. McFadden. 1984. "Specification Tests for the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Econometrica* 52: 1219-1240.
- Hovland, Carl I. 1959. "Reconciling Conflicting Results Derived from Experimental and Survey Studies of Attitude Change." *American Psychologist* 14(1): 8-17.
- Hsieh, John Fuh-sheng, and Emerson M. S. Niou. 1996. "Salient Issues in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Electoral Studies* 15(2): 219-235.
- Huang, Chi, and Todd G. Shields. 2000. "Interpretation of Interaction Effects in Logit

- and Probit Analysis: Re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stration Laws, Education, and Voter Turnout.”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28(1): 80-95.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Jacobson, Gary C. 1990. *The Electoral Origins of Divided Governmen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Krosnick, Jon A., and Richard E. Petty. 1995. “Attitude Strength: An Overview.” In *Attitude Strength: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eds. Richard E. Petty and Jon A. Krosnick.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24.
- Lacy, Dean, and Philip Paolino. 1998. “Voting 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4: 1180-1199.
- Ladd, Everett C. 1990.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ngress Problem.’” *The Public Interest* 100: 1-11.
- Landis, J. R., and G. G. Koch. 1977. “The Measurements of Observer Agreement For Categorical Data.” *Biometrics* 33: 159-174.
- Levinson, Daryl J., and Richard H. Pildes. 2006. “Separation of Parties, Not Powers.” *Harvard Law Review* 119(8): 2312-2385.
- Lewis-Beck, Michael S., and Richard Nadeau. “Split-Ticket Voting: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Madisonianism.” *Journal of Politics* 66(1): 94-112.
- Lijphart, Arend. 1977.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v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n, Jih-wen. 2012. “Positioning Taiwan on the Global Map of Electoral Systems.” Paper presented for Lecture Series at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Apr. 12, Taipei, Taiwan.
- Lin, Tse-min, Yun-han Chu, and Melvin J. Hinich. 1996. “Conflict Displacement and

- Regime Transition in Taiwan: A Spati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48(4): 453-481.
- Long, J. Scott, and Jemery Freese. 2006. *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Dependent Variables Using Stata*, 2nd. College Station: A Stata Press Publication.
- Marcus, Geroge E. 1988. “Democratic Theories and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Polity* 21(1): 25-44.
- Mueller, Carol M. 1988. *The Politics of the Gender Gap: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Influence*. Newbury Park: Sage.
- Nicholson, Stephen P. 2005. “The Jeffords Switch and Public Support for Divided Gover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2): 343-356.
- Nie, Norman H., Sidney Verba, and John R Patrick. 1979.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trocik, John R. 1974. “An Analysis of Intransitivities in the Index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Political Methodology* 1(1): 31-47.
- Petrocik, John R. 1991. “Divided Government: Is It All In the Campaigns?” In *The Politics of Divided Government*, eds. Gary W. Cox and Samuel Kernell.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3-38.
- Petrocik, John R., and Joseph Doherty. 1996. “The Road to Divided Government: Paved without Intention.” In *Divided Government: Change, Uncertainty, and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eds. Peter F. Galderisi and Roberta Q. Herzberg.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Petrocik, John. R. 1996. “Issue Ownership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th a 1980 Case Stud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0, No. 3: 825-850.
- Petrocik, John R., William L. Benoit, Glenn J. Hansen. 2003. “Issue Ownership and Presidential Campaigning.”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8, 4: 599-626.
- Reilly, Benjamin. 2001. *Democracy In Divided Societies: Electoral Engineering For*

- Conflict Man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illy, Benjamin. 2007. "Political Engineering i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Democracy* 18(1): 58-72.
- Riker, William H. 1985.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A Confront Between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Choice*.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 Sartori, Giovanni. 1976.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attschneider, E. E. 1942.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Sigelman, L., Paul J. Wahlbeck, and Emmett H. Buell Jr. 1997. "Vote Choice and the Preference for Divided Government: Lessons of 1992."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3): 879-894.
- Small, K. A., and C. Hsiao. 1985. "Multinomial Logit Specification Tes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6: 619-627.
- Smith, Charles E. Jr., Robert D. Brown, John M. Bruce, and L. Marvin Overby. 1999. "Party Balancing and Voting for Congress in the 1996 National Ele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3(3): 737-764.
- Smith, Eric R. A. N. 1980. "The Level of Conceptualization: False Measures of Ideological Sophistic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3): 685-696.
- Straw, Christopher M. 2008. "The Role of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Madisonian Machine." *Legislation and Public Policy* 11: 321-364.
- Stewart III, Charles H. 1991. "Lessons From the Post-Civil War Era." In *The Politics of Divided Government*, eds. Gary W. Cox and Samuel Kernell.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3-238.
- Wyckoff, Mikel L. 1987. "Issues of Measuring Ideological Sophistication: Level of Conceptualization, Attitudinal Consistency, and Attitudinal Stability." *Political*

Behavior 9(3): 193-224.

Yu, Ching-hsin. 2004. "Direction and Strength of Voter's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Taiwan after 2000."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39-70.

Yu, Eric Chen-hua, Chi Huang, and Yi-Ching Hsiao. 2010. "Who Wants Checks and Balances? Endogeneity of the Balancing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Conference Group of Taiwan Studies at the 2010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p. 1-4, Washington DC.

